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

## 第三辑 目 录

- 
- |         |  |
|---------|--|
| ( 1 )   | 回忆阿拉善旗起义时的前前后后<br>..... 罗永寿                          |
| ( 63 )  | 日寇侵占大余太的罪恶史略<br>..... 董玉奇                            |
| ( 98 )  | 日本特务“衣司格迭勒图”在乌拉<br>特后旗的活动..... 巴图乌力吉 忠来撰写<br>达瓦桑布 整理 |
| ( 124 ) | 陕坝中美合作所概况<br>..... 张启高 整理                            |
| ( 133 ) | 陕坝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罪行纪略<br>..... 王兴亚                         |
| ( 136 ) | 中美合作所霸占大顺城天主教堂<br>..... 樊永业 口述<br>朱永丰 整理             |
| ( 139 ) | 我在绥远省战时青年训练团的日子<br>..... 柴如璧                         |

- (153) 傅作义搞的“救民先锋队”纪实  
.....徐寿泉
- 
- (158) 旧社会匪患无宁日  
——解放前五十年间绥远地区  
匪祸见闻  
.....刘锦魁原著  
张世杰改写
- (190) 忆述白马连进套剿匪的经过  
.....李财 口述  
刘培荣整理
- 

封面：阴山岩画

(说明见第一辑)

# 回忆阿拉善旗起义时 的前前后后

罗永寿

阿拉善旗原为四卫拉特（额鲁特）之一的和硕特部，称为套西蒙古。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和硕特部首领和罗里，因避准噶尔部之乱，率部来到贺兰山地方，上表清廷，愿乞归顺，并请指拨牧地，以便驻牧。当蒙清圣祖将贺兰山以西的地区划为和硕特部牧地，并按编制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将和硕特部编为阿拉善和（霍）硕特旗。按阿拉善系贺兰山的音转。阿拉善和硕特之定名，则系地方名与部落名的合一。

阿拉善和硕特旗建旗后，定为特别旗，直隶于中央政府管辖，不受地方盟（以及后来的省）的节制。从康熙二十五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686—1949）的二百六十三年中，先隶属于清朝的理藩院，后归属于民初的蒙藏院，及至国民党时

期，则由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直接管辖。

全旗最高行政长官称为札萨克（即旗长，俗称王爷）。在解放时，阿拉善和硕特旗的札萨克是该旗第九代世袭亲王爵位的达理札雅。

达理札雅号锐荪，在北京阿拉善王宅邸罗王府出生并长大，曾受过较好的教育，因此，他的生活习惯完全趋于城市化，平时讲话，也以汉语为主。福晋（夫人）金允诚，系清皇室近支爱新觉罗载涛之女。生有格格（王女的尊称）六人（其中三女夭亡），阿哥（王子的尊称）一人。达理札雅二十八岁（1931）时，回旗袭爵执政，就任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

阿拉善和硕特旗（以下简称阿拉善旗，它包括现在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和磴口县）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牧业地区，位于祖国的西北边疆，东及东北部，与伊盟杭锦旗、乌盟的乌拉特三公旗为邻，西与额济纳土尔扈特旗接壤，南及西南部，与伊盟鄂托克旗及东起石嘴山，西至山丹、张掖等宁夏、甘肃两省的各县毗连，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分界。全旗总面积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大。境内多沙漠、盐湖，

闻名于世的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大沙漠以及吉兰太、雅布赖等盐池，都分布在旗内的东、西、南部。解放前共有六万三千人，其中蒙、汉民族各占一半，其他民族约有一千余人。

全旗划分为三十六个巴格（相当于乡），管理牧区的地方行政事务。并在边境地方设立了三个总管公署（磴口、四坝、奴尔盖三处，位在巴格之上，相当于区），用以处理境内汉族居民的行政事宜。旗治设在定远营，即现在的巴彦浩特。

阿拉善旗地处边陲，位置重要，物产丰富，区域辽阔，人烟稀少，从而，引起了宁夏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垂涎和觊觎。他们采取羁縻、拉拢、欺压、强迫等手段，对阿拉善旗进行蚕食与鲸吞。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们强行割去阿拉善旗磴口等巴格的大片土地，设立了磴口县。其后，又打算在定远营附近的紫泥湖，设立紫湖设治局，为设立紫湖县作准备。民国二十七年（1938），马鸿逵攻打定远营，曾将达理札雅软禁在兰州达七年之久，企图占领阿拉善旗，使甘、宁、青连成一片，以达到西北三马的势力畅

通无阻。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却接二连三地任命达理札雅为中央委员，中将銜区防司令部司令等职务。所有这些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手法，目的是一个，这就是消灭阿拉善旗，将阿拉善旗的地盘纳入马家军阀的势力范围之内。

解放前夕，阿拉善旗定远营的情况异常复杂，在这里不仅存在着各种反动势力，同时，也有着许多反动统治机构，它们除抢权、抢地盘，并大力进行反共外，还虎视眈眈地监视着阿拉善旗官员的动向，使旗内人员不敢轻举妄动，有所作为。

定远营原为小市镇，当时仅有人口七千人。但在这弹丸之地内，除建立了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及三青团等组织外，国民党政府还设立了军事专员办事处，派遣了军事专员驻在这里；蒙藏委员会也派来协赞专员，就近监督。至于军统、中统等特务分子，则混杂于各组织之中，秘密进行活动。而宁夏军阀马鸿逵自一九三八年攻占定远营后，经常派有一营兵力驻守镇压并强行成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接管市镇的行政工作，在市区内建保甲，编户口，为马家军

调征兵、收税。接着又设银行，派特务，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控制阿拉善旗。

一九四九年夏，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带同一些王公、喇嘛、政客、官僚以及由东北西窜的蒙古军队，来定远营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这更给定远营增添了混乱彩色。当时，大街之上到处可见花翎顶戴，红紫袈裟，奇装异服，南腔北调之人，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他们招摇过市，横冲直撞，并自然而然的参加到蒋马反动派在定远营组织的反共大合唱中来。

面对全国即将解放，而定远营还处在群魔乱舞的情况下，阿拉善旗何去何从？出路在哪里，这是摆在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及旗府官员面前的重要课题，当时他们都在认真地进行思考、研究、探讨、寻找阿拉善旗各族人民的出路。

## 一、北平和平解放，对阿拉善旗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起义了。傅将军的行动，给愿意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希望弃暗投明的人们，指明了正

确的方向。

当时，全国的形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事上的有生力量，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全国进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迫使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向广州、台湾方面逃跑。

在这风云变化异常迅速，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之际，国内各阶层有识之士，逐渐地看清了国民党丧失军心，丧失民心，失败已成定局，而全国解放，早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候。对于当前局势所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每个人无不认真地在进行思考。

但是，国民党残存在西北的反动势力，他们坚持反动立场，企图进行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宁夏军阀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就是其中的一个。马敦静将他指挥下的十万兵力，分布在宁夏境内黄河两岸，妄想抗拒宁夏省的解放。同时，他还加强了驻在阿拉善旗定远营的兵力，由过去的一个工兵营，重新部署为加强特务营。这个营配备了具有新式装备的五个整连，还附属一个小炮



排。这部分兵力，在营长孙明楼的指挥下，执行着防备阿拉善旗人民在他们后方发动游击战的任务。

面对当前形势，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将如何办？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他率同全旗各族人民起义，站到人民这方面来；一条是自己携眷外逃，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到底，走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何去何从？在选择上他感到犹豫、徬徨，有些举棋不定。但在思想上，他倾向于前一条道路。

一九四九年刚过春节后，达理札雅与本旗协理罗巴图孟柯、章京（官名，在札萨克下负责管理旗务）陈爱尔德呢巴图三人，在对时局交换意见之后，决定召集本旗军政人员，共同商讨阿拉善旗的前途和命运。农历正月二十日（二月十七日），他们召集了达穆林旺楚克（达的三弟）、罗瑞光、段巴图尔、左甲木英、罗永寿、白诚禧、陈那笋巴图等旗府官员在王府里开了一次会。

会上，达理札雅说：“当前国共两党的战争，越打越明显。总的来说，国军失利，共军胜利，

国民党最后逃往台湾的趋势，已了如指掌了。

“今年北平的和平解放，这是人们意料不到的变化，同时也给人们指明了今后该走的方向。

“近据我旗驻北平联络员徐厚田托人向我汇报，北平解放后，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和起义将领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很多的人，是我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具有远见卓识，既然他们拥护共产党，自动地站到共产党那方面去，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共产党的作为是深得人心的。从这里，我们多少也能了解到一些共产党的情况。

“面对当前的局势，我旗究竟应该怎么办？走哪条路好？请大家谈一谈”。

接着陈爱尔德呢巴图说：“我旗自从一九三八年被马鸿逵占领后，始终处于受军事管制的地位。目前的形势虽然对国民党十分不利，但在宁夏地区，马家军利用贺兰山这道天然防线，进行挣扎的可能性大，这样一来，我旗人民恐怕要遭受涂炭，我们不能不早作防备。

“其次，我旗的官府和人民，一向没有和共产党作过对，也不是什么反共势力。至于李志远

与胡开科（二人均系共产党嫌疑）被捕事件，完全是在国民党军事专员办事处的指示下，由特务们下手干的。此事不仅有案可查，而且活人俱在，足可证明我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再说，我旗一向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的侦察人员，经常进入我旗探听情况，我们始终都在保护他们，使他们胜利完成任务。

“另外，马鸿逵军事占领定远营，并将我旗札萨克软禁在兰州达七年之久，致使我旗旗政陷于瘫痪状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想共产党不会不知道这些历史吧。

“因此，我认为共产党来了，对我旗的军政人员不会有什么伤害，我们应该准备迎接共产党”。

罗巴图孟柯除表示赞成陈章京的意见外，并说：“现在怕就怕马家军在贺兰山以北拉开战场。要是那样的话，我旗的老百姓就要被军队吃光、抢光了。至于共产党来的话，我们怕也不行，跑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共产党投降，热烈地欢迎人家，只有这样，才能不使人民

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他又说：“据从山西和北平来的买卖人说，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说的那样可怕”。

最后他提出：“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有两手准备：一方面要不事声张地作好迎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记取马家军突然袭击定远营的教训，要严密的监视马家军的动向，作好防范工作。当务之亟，应该把旗府的财产、粮食、武器弹药、历史档案等重要物品，立即向巴丹吉林大沙漠内转移。

“估计马敦静的队伍由黄河沿线败退下来，一定窜入贺兰山作垂死挣扎，这样以来，定远营就是他们的当然司令部了。现在马家军以换防的名义，把原来驻在定远营的工兵营换成特务营，这个营管辖着五个整连，相当于一个团的建制。在他们阴谋诡计面前，我们绝对不能丧失警惕。当前，对付好马家军，就是保护了阿拉善旗”。

紧接着达穆林旺楚克发言。由于他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毒害较深，对共产党心存疑惑，因而始终主张逃走。他说：“我看能走的话，我们还是早些走嘛；不要等共产党来了，谁也走不出

去，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最后，左甲木英表示：“在我们牧区，除了牲畜以外，再没有什么财产，想走也没有地方可走。我们和从东北来的蒙古人不同，他们同共产党对立打仗，惹下了人家，结下了冤仇，人家进来那能不收拾他们呢。我看过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凡与成吉思汗为敌的国家，战败后都要遭到杀戮；但向成吉思汗投降的国家，不仅原封不动地保持了疆土，还受到大汗的封赏。

“北平和平解放了，听说傅作义仍然是傅作义，仍不失为上宾之位。这说明，只要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起义，就会有出路的。因此我主张，我们阿拉善旗争取和平解放。至于打仗一节，那是马家军的事情，我们不去管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尽量设法避免使全旗人民大众遭受灾难，以等待人民解放军的来临。能做好这些事，就是我们给全旗人民立下的功劳”。

会议结束时，由达理札雅归纳出四项意见，请大家遵守。第一、要努力保持稳定，旗政府、旗区防司令部绝对不能迁动，必须坚守定远营；

第二，关于迎接共产党的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如走漏了风声，国民党特务机关和马家军是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我们的；第三，要想法与北平的载涛联系，听一听北平方面的动静；第四，要紧密地观察形势的发展，绝不能轻举妄动。

在这次王府召开的商讨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都是不愿意离开家园，抱有死也愿死在故土的信念。共同的希望是，阿拉善旗能够早日得到和平解放，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就算万幸了。但由于对共产党了解不深，对共产党的政策也不清楚，究竟共产党来了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大家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在表情上，都流露出一种惶惑、迷惘的神态。其中只有达穆林旺楚克坚持怀疑态度，他始终认为走为上策。

## 二、坚定的与反动势力作斗争，走弃暗投明的道路

从王府会议后，阿拉善旗政府的官员们，心里都有了主心骨，从而，沉着冷静地应付各种事物，这不能不引起驻在定远营的国民党人员的怀

疑。他们看到阿拉善旗政府对共产党的态度非常沉默，既不造反共声势，也不作反共准备，感到其中大有文章。乖滑一些的，如蒙古自治政府部分官员德古来、乌古廷、扎奇斯钦、吴鹤龄等人，预感到大事不妙，乘机飞往兰州一带逃跑。一些死心踏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特务分子，则企图阻止阿拉善旗起义，他们大造谣言，蛊惑人心。说什么：“蒋介石在重庆重整军事力量，三个月以内反攻回来”。“美国要出兵了。英国军舰已经开到了吴淞口”。还有个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曾出面召集阿拉善旗军政人员训话。在训话中，他指天发誓，痛哭流涕地说：“你们不能动摇，坚持就是胜利。蒋总统绝有神策……”。

随同德穆楚克棟鲁普来定远营搞蒙古自治活动的反共分子敖木巴特尔等人，到处张贴反共标语，并歇斯底里地狂喊：“戡乱必胜”等陈词滥调。这些反共活动，造成的影响极坏。后来达理札雅通过白海风向他们提出警告，才制止了这种反共行动。

美蒋特务达瓦敖斯尔，携带电台若干部，经常与美国新闻处联系，大搞情报活动，及至在定

远营立脚不住时，他又跑到阿拉善旗边界上，企图在牧民中间煽动反共情绪。但由于旗府控制的严密，他的活动未能得逞，最后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去了。

甚至在阿拉善旗起义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六日，还有特务分子将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的文件、档案全部烧毁，企图给阿拉善旗和平起义抹黑。

尽管一小撮反共分子在定远营街头声嘶力竭地制造反共气氛，张贴反共标语，但在阿拉善旗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反共谣言止于市区，没有散布到牧区去。因而，广大牧民听不到反共宣传，仍然安安静静地从事着畜牧业生产。

控制了城镇，稳定了牧区，这是一件好事，对为阿拉善旗和平解放作准备，不能不说十分有利。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阿拉善旗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仍然处在被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上下左右的反共势力不断地纷至沓来，以达理札雅札萨克为首的旗府官员们，无时无刻不在竭尽全力与之周旋、应付，甚至开展斗争。举其大者约有：



(一)、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打来电话，请达理札雅去银川，面商要事。对此，达理札雅当即召集协理罗巴图孟柯、章京陈爱尔德呢巴图，以及段巴图尔等旗府官员十余人开会，会上大家共同研究和分析了马敦静的意图。

最后，达理札雅表示：“马鸿逵要到兰州接任甘肃省省长或者西北副长官的职务。老子走了，儿子继位，马敦静当然要执掌宁夏省的军政大权了。现在马家军在三边失利，已退回宁夏。这次准是重新作军事部署，估计找我去，一定是在阿拉善旗身上打主意，现在我去抗住他”。

考虑到马敦静与达理札雅会谈时，一定涉及到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因此，他带上旗区防司令部参谋主任李文钦、骑兵保安总队附罗永寿二人去银川。及至抵达银川时，马敦静因去吴忠不在，由省政府交际处李处长出面接待。

第二天下午，马敦静来会见了达理札雅。见面时，他很谦虚，寒暄过后，他说：“主席（指马鸿逵）已经到了广州，不久即将去兰州接任。关于宁夏的军政事务，仍然按照主席原来的部署

进行。今天请阿叔（达与马鸿逵为盟兄弟，故称阿叔）来银川，主要是商议两件事：一件是，请贵旗给我们支援军马三百匹。因为胡宗南部队在关中一带失利，派马继援的兵力去支援还不够，又要调宁夏兵团的两个师增援关中地区。由于部队马不够用，请予支援。另一件是，请贵旗给我们支援骆驼一千峰。我们准备在贺兰山里构筑防御设施，为了使军用物资预先向阿拉善旗的三关、南寺、北寺、代开、定远营等处输送，要求贵旗承担起这项紧急运输任务，支援全副鞍具的骆驼一千峰”。接着他又说：“由于战线太长，运输工具奇缺，为保证战争顺利进行，贵旗有责任，也有义务派出驼马支援前线，以便取得最后胜利。”

达理札雅在听了马敦静的谈话后，经过半天的思索，才答复说：“关于军长的要求，我个人不便作主，等我用电话与旗府人员商量以后再行答复”。随后，达理札雅与罗巴图孟柯通了电话。在电话中，罗巴图孟柯说：“这事情我看不能完全拒绝马敦静的要求，因为怕事情闹僵了，双方都不好下台，也许给我们招致更大的压力。

我认为现在只有采取应付和拖延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咱们可以先答应给他们支援军马一百匹，其余的事，慢慢再说”。

第二天，马敦静带上他的辎重团长马文炳一块来拜会达理札雅。一阵客套过后，达理札雅对马敦静说：“关于军长要求我旗支援驼马一事，昨天我在电话中已经和旗里人员商量过了。现在从牧区征集骆驼和马子，确实有困难。因为天旱，大畜膘情奇乏，拉不回来。再说，目前正在放场抓膘季节，骆驼也不好收集。我们的意见，等秋后牲畜膘情好转时，当尽量给以解决。为了支援当前的战事，我们设法先从旗骑兵保安总队部的军马场里，给支援军马一百匹，以应急需”。

听了达理札雅的话后，马敦静思索了半天才说：

“既然如此，暂时也只好这样吧”。后来，在交付马匹时，保安总队部只交给他们七十匹战马，不足之数，说明到秋后予以补齐。

为了给在贺兰山搞防御设施作准备，马家军使用了自己的运输骆驼，断断续续地向阿拉善旗南寺、北寺，运来了军粮四十余石。其后，由于运输力缺乏，没有再运。这样以来，马敦静企图

在贺兰山修筑防御设施，负隅顽抗的计划，在阿拉善旗应付、拖延下，没有能够实现。同时，也使广大牧民避免了一千峰骆驼与二百三十匹马子的损失。

（二）一九四九年七月份，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副部长徐永昌，由广州飞到宁夏地区活动。他来到银川后，用电话请达理札雅去银川和他见面。当时，达理札雅和白海风、达穆林旺楚克等人去银川与徐永昌会晤。

见面后，徐永昌首先谈了一下当前国内的形势和他视察宁夏地区军事部署的情况后，便向达理札雅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马家军在贺兰山的设防问题。这事至关重要，阿拉善旗必须予以大力支持，以便使贺兰山的防御设施早日建成。第二，关于阿拉善旗保安部队与新一旅的配合问题。此事必须抓紧进行，以期在贺兰山以北开展草原游击战。至于武器弹药以及一切军用物资，可以空运补给。只要坚持三年，国军便能反攻回来。最后的一个问题则是，徐永昌再三拉拢达理札雅去台湾，并强调，住在大陆上有危险，人身、财产都不安全。

当时，达理札雅除表示谢绝去台湾外，并分别答复了另外的两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他说：“贺兰山里没有人家，而且饮水奇缺，大军入山，吃水问题无法解决。依我看军事设施不易建立，如若建立，必先开发水源。可是即便军事设施建立起来了，假如黄河防线失守，贺兰山也无法把守。在第二个问题上，他说：“贺兰山以北，那是一望无垠的戈壁、沙漠，吃粮、饮水万分困难，绝对开展不了什么游击战”。

会见时，马敦静和宁夏省的一些要人也在座。对于达理札雅的发言，马敦静也发表了意见。他说：“你们蒙古人在生产和生活上流动性很大，不象农民稳定。假如牧民搬走了，留下来四无人烟的草原和滚滚不断的沙漠，这对军事行动大有阻碍。再说，沙漠中的地理条件复杂，气候变化无常，首先是交通不便，这对开展游击战争极为不利。此事要从长计议，不能贸然从事”。

徐永昌在听到这些不利因素后，默默沉思，没有作出什么反应来。同时，对于宁夏地区的军事部署，也没有再提什么新的意见。他只是劝告宁夏省的军政大员们要坚持信心，不要动摇，把

“戡乱”大业进行到底，坚持三年，就是胜利。

经过这次商讨，关于在贺兰山里设防和开展草原游击战等问题，便被搁置起来，以后没有再提。

九月十九日，徐永昌由绥远回到了宁夏。达理札雅又去银川拜会了徐永昌。他们这次见面没有谈政治和军事问题，徐永昌只是一个劲地拉拢达理札雅去广州，但都被达理札雅婉言谢绝了。可是达理札雅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却被徐永昌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表示愿去台湾。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达穆林旺楚克带上小老婆与徐永昌同机飞走。达理札雅在送走徐永昌后，仍然回到旗里。

（三）一九四九年春末夏初，德穆楚克栋鲁普来到了定远营。随之，一些蒙旗的王公、喇嘛以及在国民党地区的蒙古知名人士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人，也都接踵而来。他们来阿拉善旗的目的，主要是利用当时在西北各蒙旗具有崇高威望的达理札雅地位，和当时尚称平静，而地位又适中的阿拉善旗定远营，继续搞蒙古自治活动。

四月中旬，这些人在定远营正式举行了内蒙各旗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建立后，经过多方活动，七月间，才由蒙藏委员会转来由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签署的准予召开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命令。于是，他们在八月五日至十日，召开了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并选举了德穆楚克栋鲁普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吴鹤龄为参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为副议长，正式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与参议会。出席代表一百七十五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宁夏省主席等西北军政机关都派来代表，以来宾身份参加了大会。

关于德王在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这件事，达理札雅曾向旗府官员们表示：“他们（指德王一伙）没有地盘了，才跑到我们阿拉善旗来搞蒙古自治。在这里，需要我向大家说明的是，德王来我旗，不是我请来的，是他们自己自动来的。由于他们是搞蒙古民族的自治运动，题目光明正大，对我们来说，支援他们的活动，也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但

必须指出的是，在我们支持蒙古自治活动的同时，要绝对保持阿拉善旗的独立性，不能让他们插手或参与我们的旗政”。基于上述论点，当时阿拉善旗只派出达穆林旺楚克充当全权代表，参加了蒙古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其他人员没有参与这件事。

实际对于德王一伙的到来，确实给达理札雅添了两种心病：一种是，在全国行将解放之际，他怕以反共出名的德王在定远营把事情闹大了，搞坏了，影响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这对全旗人民不好交待；再一种是，他怕德王喧宾夺主，用兵力强占阿拉善旗地盘，使之沦为战场。为此，他只好与德王虚与委蛇，并告诫属下提高警惕。

德穆楚克栋鲁普原是一个野心极大的大蒙古主义者。他一向仇视共产党，反对解放军，对当时在中国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意孤行，顽固到底。及至处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跑到阿拉善旗来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妄想利用达理札雅在人民中的威望，企图最后在阿拉善旗境内的西北戈壁中，开展游击战争，与人民为敌到底。



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观点与达理札雅所持的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观点格格不入。由于看法不同，认识不一致，他们中间常常发生激烈地争论。争论的双方，以德王等人为一派，与达理札雅、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人为一派，各持己见，互不让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向兰州进军，西北地区的局势趋于紧张之时，蒙古自治政府人员出现了三种去向，开始分道扬镳。这就是：德古来、吴鹤龄、扎奇斯钦等人，搭机飞往台湾逃离大陆；德王一伙奔赴图克木庙，企图在沙漠中负隅顽抗；达理札雅则坐镇定远营，准备全旗起义。

九月二十日下午五时，德穆楚克栋鲁普亲自走到达理札雅母亲的住宅，向太福晋（太夫人）请安并告别，然后，从定远营东城出走。走时带走了“蒙古自治政府”的木质印章和木制机关招牌。对于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出走，达理札雅并未表示挽留。

德穆楚克栋鲁普出走后，蒙古自治政府的人员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追随德穆楚克栋鲁普去拐子湖，在沙窝里打起了蒙古自治政府的招牌；

另一部分留在定远营，在新改换成的“西蒙自治政府”（德王出走后，经白海风等人 与达理札雅商量，把蒙古自治政府改为“西蒙自治政府”）里工作。

关于这个“西蒙自治政府”，西北野战军和宁夏军管会一直没有承认，宁夏省领导人，也未对“西蒙自治政府”表态，后来只好把牌子摘掉了。至于“西蒙自治政府”的负责人员，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他们不仅是达理札雅的老朋友，私人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在抗战时期，对阿拉善旗有过帮助，这时，又积极支持达理札雅所持的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立场。因此，在解放以后，达理札雅分别推荐他们担任阿拉善旗人民政府委员和秘书长。

（四）、一九四九年九月初，李守信属下的新一旅，由宁夏省陶乐县败退到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九月中旬，他们强渡黄河，进入了阿拉善旗的宗别立、乌达、磴口等地区，并向北寺、水磨沟、定远营的方向移动。企图利用这块有利地形，与人民解放军继续顽抗。

当达理札雅得知此事后，立即派总管杨宝山

(大虎藏武)去新一旅驻地，向旅长苏和巴特尔表明阿拉善旗的态度。杨宝山说：“阿拉善旗已决定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早派出代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去了。因此，不容许你们在我旗境内打仗，要求你们离开此地”。杨又劝告他们说：“希望你们睁大眼睛，认清形势，早些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乃是正路一条。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们阿拉善旗绝不会与你们妥协，你们休想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便宜”。

但新一旅的头头们，并没有听从杨宝山的话。九月二十日，该旅参谋长白广卿亲自跑到了距定远营不远的水磨沟、薛家佃一带，并打发人到定远营来向德穆楚克栋鲁普请示：“部队已渡过黄河，打算向阿拉善旗北部地区移动，可否？请指示。”

当天晚上，达理札雅派罗永寿为阿拉善旗代表，刘桐轩、洛布登为西蒙自治区政府代表，连夜赶到水磨沟，会见了白广卿。见面时，代表们首先表明了阿拉善旗坚持和平解放，反对在旗境内作战的立场后，又告诉他们，德穆楚克栋鲁普已于今天下午由定远营出走，奔赴图克木庙去了。

白广卿答复说：“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德王的指示。至于阿拉善旗政府不同意在旗境内打仗一事，我们也保证不了突然发生的情况。”代表们又劝告他，说：“阿拉善旗札萨克已经派出代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我旗，你们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希早作抉择。”

最后，白广卿表示：“德王既然去了图克木庙，那么，我们部队也只好向图克木庙一带集中。至于最后的决定嘛，也只能听德王的，我们作不了主。”第二天，白广卿带上队伍向言兰太方向出发，奔往图克木庙一带去了。

随着，新一旅的部队也全部向图克木庙一带移动。此时，宗别立、乌达、磴口等地区解除了新一旅部队的扰害，而阿拉善旗北部地区的十个巴格，却又遭受到他们的骚扰。为此，阿拉善旗地方保安队经常与之发生小规模的战斗，以阻止他们的扰民行为。这样以来，新一旅的士兵称旗保安队为：“阿拉善八路”。

（五）、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宁夏马敦静派驻定远营的特务营的士兵发生了哗变。当时，阿拉善旗的骑兵保安总队第二中队、第三中

队、勤务分队、通讯分队以及总队部的全体官兵，共有六百多人（全为蒙古族），立即进入阵地，严阵以待，保卫了旗府、王府和定远营市区七千多居民与商号的安全。

原来在那天的下午，旗区防司令部少校参谋魏文锦侦察特务营的动向后，立即向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报告说：“据住在西花园一带居民反映，特务营的士兵今天十分忙乱。有的兵公开地说：要回家的时机已到等语。看来特务营的士兵要发生哗变”。对此情报，达、罗非常重视，当即命令旗骑兵保安总队部组织人员，部署兵力，要切实保卫定远营市区内机关、单位和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根据上述命令，旗骑兵保安总队部部署兵力如下：

（1）、命令通讯队上尉队长张元尉，立即把各个电话联系线重新进行检查，通讯兵要坚守岗位；

（2）、勤务分队由上尉队长王振华，少尉分队长杨宪忠指挥，占领营盘山要害点；

（3）、第三中队由少校中队长范乌图那笋、

上尉副中队长陶恩克那笋、中尉分队长张宏达指挥，全部兵力部署在西关至双山一带，扼制特务营的背后；

(4)、第二中队由上尉副中队长马怀章指挥，部署在城墙上的各个掩蔽部内，以防特务营攻城；

(5)、派出上尉参谋范立宪带队占领南大街至三道桥一带的据点，阻止敌人进入市中心；

(6)、总队部的官兵，由上尉副官王励德上尉军需主任任春林和中尉分队长魏昭福指挥，保卫旗政府、王府和骑兵保安队部；

(7)警察局的全部武装警察，由上尉队长聂正书指挥，按居民区进行分配，执行保卫居民、商号的任务。

当晚九时，在二更炮响过之后，驻在定远营西花园的特务营开始鸣枪哗变。他们原打算在哗变后，先抢掠商号、居民，然后再四散逃跑。及至哗变以后，他们感觉到气氛不对，似乎蒙古兵有所准备，为了不惹麻烦，他们没敢向市区、城里进攻，只在附近稍事掠夺，就分头逃跑了。

当特务营鸣枪哗变之际，该营营长孙明楼曾

打电话向达理札雅告急。他说：“我的特务营已经哗变了，请求派兵来帮助稳定局势”。达理札雅答复说：“这件事需要你们自己先作工作，劝告士兵稳定下来。至于别的事，明天我们共同商量解决”。从此，孙明楼再没有来电话。因为士兵要杀死他，他不得不找地方躲藏起来了。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又有人给达理札雅打电话说：“特务营士兵已经哗变了，他们要求旗政府当夜给每个人发点路费回家”。当时，达理札雅的答复是：“告诉你们的士兵，他们要回家我们不阻拦，尽管放心走好了。但有一点必须说明，他们不能乱打枪，否则，我就派蒙古兵出城打他们。至于发放路费的问题嘛，那好办，我保证明天给他们解决”。

及至午夜时分，枪声疏稀，人声消失，西花园一带逐渐趋于寂静。这时总队部派出少尉侦察员范老地带领侦察小组，化装成特务营散兵模样，走进西花园的特务营房内进行侦察，然后回来报告说：“在特务营的五个营房内，士兵们绝大部分都逃走了；只有外省籍的士兵，因无处可走，现在还在忙乱着，不知所措。在院内、屋

里，枪支弹药丢的遍地，如不及时前去接管，怕被坏人抢去为非作歹”。

据此情况，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个紧急会议。在会上，他们分析特务营里的宁夏籍士兵都跑光了，虽剩下些外省籍兵丁，但也自顾不暇，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为此决定，派区防司令部副官处上校主任张元忻、骑兵保安总队部军械室上尉主任胡萼业，带领保安队士兵，坐上汽车去特务营收集散兵丢弃的武器弹药。计共收回：水连珠步枪二百余支，六零小炮六门，轻机枪二十余挺，另有手榴弹、子弹一汽车。这部分武器弹药，交由区防司令部上尉军需科长谢文彬负责保管，以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移交。

自从特务营哗变，马家军纷纷逃离了定远营之后，从而，结束了自一九三八年马鸿逵攻占阿拉善旗定远营长达十年之久的屈辱地位，人人无不喜气洋洋，拍手称快！

这次特务营的哗变，由于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部事前部署周到，防范严密，致使变兵们的企图没有得逞，只是乱打枪，瞎哄闹，给定远营



市区造成一派恐怖气氛，人心惶惶不安，但没有受到损失。

（六）当阿拉善旗解放前夕，它仍处在被反动势力包围之中，由于形势复杂，处境险恶，旗府当局时刻都在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在坏环境中周旋，与恶势力斗争，以致放松了对牧区人民的安抚工作。

一九四九年秋季，阿拉善旗北部境内，在坏人的煽动下，发生了牧民驱赶着牲畜投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事件。

原来在阿拉善旗尚未和平解放之际，有些思想倾向于外蒙古的人，在外蒙派来的巴图吉尔嘎朗等人，与德王联系活动下，鼓动黄孟和乌力吉和朝格乌其日勒二人出面煽动牧民离旗投奔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计：古鲁乃、拐子、巴丹吉林三个巴格，共走了三十余户，一百多人，赶走了大小牲畜三千多头。

当达理札雅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气愤。他立即召集协理、章京以及旗府官员开会。会上他很难过地说：“由于我们安抚工作作得不够，以致牧区各巴格的人心还是惶惶不安。近来

北部一些巴格的负责人员，在外人的煽动下，未经旗府的同意，竟把一部分牧民和牲畜迁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这完全是不应该的。旗府应立即下令制止，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这个办法，随即由旗府拟出训令，发往各巴格、防卡，并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从而制止了牧民的外流，稳定了牧区局势。

训令的大意如下：

“各巴格、各防卡达木尔(达木尔即边官)：

“值此非常时期，本旗礼萨克与旗政府以及骑兵保安总队部仍在坚守定远营，照常办理旗务，等待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到来，以期实现本旗和平解放。

“近据报告，本旗边区牧民，轻信谣言，盲目搬迁外流，赶走大批牲畜投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此种行为实属破坏活动，小则对牧民生产、生活，大则对本旗和平解放，均有不良影响，害处甚大，亟应制止。

“为此，飭令各巴格、各防卡达木尔，除在牧区广泛辟谣外，并望切实防止牧民搬家外逃。切切！”

### 三、阿拉善旗在迎接和平解放前的准备和部署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达理札雅在王府会议后，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经过一个阶段的观察与思考，他的思想认识逐渐得到提高，而政治态度，也日益趋于明朗化。特别是，当他听到老朋友张治中将军脱离国民党政府，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的时候，这对他思想认识启发更大。

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达理札雅曾向旗府主要官员们，发表过这样的议论：

“根据现在的局势来看，无论走到那里也是要解放的。目前，西北的大军阀胡宗南已经失掉西安，向汉中一带撤退；西北长官马步芳也准备向酒泉转移；宁夏的马鸿逵正在搬家，准备逃跑；其子马敦静外表上虚张声势，扬言确保宁夏，其实他早已作好了逃跑的打算。现在时局形势瞬息万变，根据形势的发展，将来恐怕任何人想走也走不了啦”。

“我们阿拉善旗的情况，与西北军阀们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与共产党仇深似海，不共戴天，所以怕共产党、怕解放军，其实他们怕的是，在解放后，共产党清算他们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和共产党无接触，无冤仇，没有什么可怕的。西北军阀可以逃跑，我们是跑不掉的。因为阿拉善旗是我们祖祖辈辈世守的基业，假如我们弃之而去，试问那里是我们的归宿呢？好在傅作义将军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要稳住全旗的局势，争取来一个和平解放”。

达理札雅的看法，博得了全体官员的赞成。他们一致认为：“搬家逃跑，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能使全旗陷于混乱，人民受害更深，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愚蠢的行为，是西北军阀们干的事，我们绝不去干。当前我们必须保持全旗的稳定，要做到不能轻举妄动”。达理札雅看见他的意见受到众人的支持，当时高兴地说：“为了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事业，我们来一个风雨同舟吧”。

达理札雅的议论，更加印证了春节后王府会议所作决定的正确，争取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

已成旗府官员们的共同信念。为了将希望变成行动，在旧历六月二十日（七月十五日）达理札雅提议由旗札萨克、协理、章京和军政官员们秘密成立一个阿拉善旗和平解放指挥部。其任务是，分头分片稳住全旗局势，为有步骤、有秩序的和解放作好各种准备。其组成人员为：总指挥达理札雅、副总指挥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呢巴图。指挥部成员有：陈那笋巴图、罗瑞光、左甲木英、段巴图尔、李树德、罗恩凯巴图、白诚禧、张仁、罗永寿、金巴图道尔吉等。

指挥部成立之后，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派遣旗骑兵保安总队第一中队长杨富存和副中队长罗福禧负责领导磴口、巴音套海、道兰素海、沙金套海四个巴格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并防备散兵、游勇以及不法分子的袭扰和破坏。中队部配备无线电台一部，随时与旗指挥部保持联系。

（二）阿拉善旗西部的雅布来、艾力布盖、巴丹吉林等巴格，由总管乔英、达木尔（边官）、希日布、布拉兑等人负责加强各防卡的防范工作，并作好所属各巴格牧民的安抚工作。没有旗

政府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搬家迁移。一有情况，要及时用无线电与旗府联系。

（三）位于定远营以南的十个巴格，由罗恩凯巴图、陶赛尔布吉、马巴图毕立格，后于九月初，又加派骑兵保安总队二中队少校队长陶光锐，分别负责十个巴格的安定民心工作和加强民防工作。同时，要切实注意加强与甘肃、宁夏两省毗邻各县的防范工作。

（四）陈爱尔德呢巴图、金巴图道尔吉，负责加强克白尔以北八个巴格的民防治安工作。并和第一中队配合，作好磴口、巴音套海、道兰素海、沙金套海四个巴格的治安防范工作。

（五）白诚禧、图布忻孟柯、苏门地等人，负责吉兰太、宗别立等七个巴格的民防治安工作。

（六）段巴图尔、巴格尔、孟和等人，负责巴彦诺洛公等四个巴格的民防治安工作。

（七）左甲木英总负责，指挥西部古鲁乃、拐子、巴丹吉林、艾力布盖、雅布来等五个巴格的民防治安工作。

（八）指派金对岱（财政负责人）和达希端

都市等人，负责将阿拉善旗库存的银洋三万元和旗府的历史档案，以及其它财产、枪支弹药、粮秣补给，全部运到库列图庙保存，以防马家军的袭击抢掠。并派骑兵保安总队部所属的金藏伍少尉分队长，带领一个分队，坚守这个沙漠古刹——库列图庙。

（九）由于马家军的驻在定远营，因此，将保卫定远营列为重点，全旗精锐部队都部署在这里，以防马敦静新派来的特务营的突然袭击。当时，抽调骑兵保安总队中的第二、第三两个中队，勤务分队，通讯分队，总兵力约为六百余人，驻守定远营，以加强防务。

此外，并紧急通知驻在牧区的各保安中队充实人员，备足枪支弹药，严阵待命，听候调遣。还命令全旗四十二个防卡的士兵，暂不换班（阿拉善旗保安队士兵为义务制，由青壮年牧民轮换，每两月换班一次），以加强民防工作。与此同时，还通知各寺庙青壮年喇嘛，待命服兵役。

经过布置，当时在定远营的兵力，已具有完全能够压倒马家驻军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防守在定远营的两个骑兵保安中队的士兵训练素质好，

善于各自为战，他们都是本旗的蒙古族士兵，能够坚守战斗岗位，不会出现逃兵现象。至于驻守定远营保安部队的装备方面，虽然没有重型武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称得上比较精良。计有：步枪六百支、马克沁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二十六挺，七九步枪子弹五万五千余发。

（十）由旗警察局长李树德，负责定远营地区的民防工作。当时驻在定远营的各族居民有二千多户，七千多人，设立了十三个保，一百二十个甲。为了保卫定远营居民的生命财产，旗府给警察部队发了枪支弹药，使他们时刻处在戒备之中。

另外，在各保甲组织里，定了民防规定，并建立了情报组，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向警察局报告。还派司令部上尉政工干事达林和上尉参谋辛文秀负责监视伪国防部军事专员办事处、宁夏驻定远营办事处，以及德李人员和国民党在定远营的特务机构。严禁一切反共标语的出现，并动员各保甲居民，涂抹掉原来书写在墙壁上的反共标语。

（十一）派第五中队少校中队长罗步云，专门



负责监视从三关至定远营公路线上马家军的军事动态。如发现有紧急情况，除命令第五中队出动阻击外，还可以集合南寺的青壮年喇嘛兵出来拦截敌人。他们是保卫定远营的前哨。

(十二)第四中队，由少校中队长罗都古尔扎布指挥，以吉兰太盐池、北寺为中心，防范新一旅向阿拉善旗中部窜犯，必要时，从北面支援、保卫定远营的战斗。

(十三)在天水、宝鸡等地已被解放，马继援部队全线溃退，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向兰州进军之际，达理札雅派旗区防司令部正、副主任陈那笋巴图、朱门二人，代表阿拉善旗和达理札雅本人，去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解放兰州，并向彭德怀司令员递到达理札雅的亲笔信。当时，旗财政上拨给他们银元五百元，供他们公出使用。

朱门在七月中旬先期到达兰州，陈那笋巴图因事晚走了一步，及至八月中旬上路时，兰宁公路已被散兵游勇所干扰，交通中断，汽车不通，陈那笋巴图未能及时赶到。为此，达理札雅又重新派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驻兰州办事处的官员代替陈那笋巴图会同朱门欢迎了西北野战军。关于

他们的工作的进展情况，随时用无线电与达理札雅联系。

#### 四、阿拉善旗向北平及西北野战军发出的致敬电与和平解放的经过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阿拉善旗代表朱门等人，随同兰州的各界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在兰州欢迎了西北野战军，并晋见了彭德怀总司令，递交了达理札雅的手书。彭总见了很高兴，当时说：“对达理札雅先生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的行动，我们表示欢迎。”随后，彭总又指示他的联络部长范明，让他转告朱门等人跟随十九兵团赴宁夏，以便早日返回定远营。

在朱门他们临行前，彭总又让范明部长向他们转告以下指示，让回去向达理札雅转达。彭总说：“对于达理札雅先生提出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革命行动，我们感到十分满意。现经研究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向阿拉善旗进军”。等语。朱门他们在接受指示后，于九月二十七日随

同十九兵团来到银川，然后连夜返回了定远营。

九月二十八日，朱门把在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的情况和彭总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向达理札雅及旗府官员作了详细汇报。大家都是头一次听见共产党的声音，感到亲切、温暖，从此，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消除了疑虑。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际，达理札雅于九月二十三日，以阿拉善旗札萨克的名义，向会议主席毛泽东发去了致敬电。电报的内容大意是：“我谨代表阿拉善旗各族人民向您致敬。并热忱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现在，我郑重宣布，我旗各族人民从此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束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电报发出后，过了两天，收到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名义，邀请达理札雅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复电。当时，尽管达理札雅没能出席会议，但对此确实感到无比的欣慰、高兴。

后来查明，全国政协是在接到达理札雅的电报后，立即发电邀请达理札雅参加会议的。因阿

拉善旗电报局长尤剑秋是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分子，他收到电报后，为了破坏阿拉善旗的起义，曾勾结其他特务，有意将电报扣压了两天。

与此同时，阿拉善旗政府又分别向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和解放宁夏的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发出了电报。电报中表示：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阿拉善旗。

电报发出后不久，就接到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的复电。现按来电原样，照抄如下：

交通部第八区电信管理局

抄报时间 发报局名 字数 日期 时间

3/10 宁夏 85 3/10 09.00

备注 定远营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来电敬悉对阿拉善旗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表欣愉望努力维持阿拉善旗秩序共同建立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中国新宁夏杨得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九月二十二日，阿拉善旗政府派出代表罗瑞

光（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鹤鸣（司乌图那笋）译员蒙太，星夜前往银川迎接解放宁夏的十九兵团。为了让代表们顺利完成任务，临行前，达理札雅给他们签发了一六四号的通行护照。护照上写有：“兹有本旗代表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乌图那笋等三人，因公前往宁夏，携带行李等件，希沿途军警关卡验照放行，毋得留难，致滞行程”。等语。同时，又给宁夏省的马鸿宾（子寅）致电：“兹派罗曹格图盖立格等三人于申（九月）漾（二十三日）赴宁转往前方代表本旗与人民解放军会晤一切请烦转电解放军知照为感”

二十三日，阿拉善旗三代表，会同宁夏地区的起义人员，一同前往任春渡，欢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和司令员杨得志。当时，由十九兵团联络处处长甄华出面接待了阿拉善旗代表，并由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带领他们晋见了杨司令员。

在晋见杨司令员时，罗瑞光等向杨司令员当面呈递了由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署名的阿拉善旗政府代电。代电原文如下（电稿存阿拉善左旗

档案馆)：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代电(善秘字第120号)为派代表罗曹格图盖立勒等前往宁夏欢迎解放军由。

西北区人民解放军代表先生勋鉴并转呈彭司令员毛主席钧鉴蒙旗荒漠地方瘠苦并以年来灾侵迭见人民生活愈益艰困渴望解放已久今幸我人民解放军神武鹰扬所向无敌解放西北万众腾欢而本旗亦同沾雨露无任忭慰特电致敬并申贺忱兹谨派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乌图那笋等三人代表本旗政府及全旗人民前来谨致敬意并面陈一切敬请惠予延接指导为祷阿拉善特别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协理罗巴图孟柯暨全旗仕官率全旗人民叩申(九月)漾(二十三日)

罗瑞光等在迎接十九兵团后，于九月二十六日，发回来电报详细报告了他们欢迎十九兵团和会见杨司令员的情况。他们说：“杨司令员对阿拉善旗的行动，甚表满意。并又重申了不向阿拉善旗进军的决定。同时，他要求蒙旗的地方部队，当前在确保地方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方面，要起到积极作用。最后，杨司令员希望在适

当的时候，请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先生来银川会面，以便晤谈”。

对于杨得志司令员的邀请，达理札雅未能及时应邀前往。这是由于：一方面，在旗境内，马家军散兵，游勇的滋扰和新一旅在北部地区的盘踞，需要达理札雅坐镇指挥，安定人心；另一方面，达理札雅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对共产党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党的方针、政策知道的不多，了解的不深，加之和共产党人员没有亲自接触过，关于他们的举止行动如何？心里不托底。因而，顾虑重重，不敢贸然前往。

九月二十四日，解放军十九兵团的一个团在团长徐成功的率领下，为追击马敦静兵团的散兵进入了阿拉善旗境内。在行抵腰坝时，罗步云中队长代表阿拉善旗政府和札萨克达理札雅，向解放军和徐团长表示欢迎，并汇报了旗里的情况。这个团在到达腰坝后，再未前进。他们此行的任务是，除了追击散兵，收缴枪支以外，还负责接收马家军在阿拉善旗南、北寺的军粮库。

罗步云在接待解放军的同时，派专人向达理札雅报告解放军来腰坝的情况。当天下午，达理

札雅派西蒙自治政府代表何兆麟、旗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中校副主任胡爱立佐巴依尔、政工室上校主任戚涛、上校参谋主任李文钦、警察局长李树德等人为代表，带上达理札雅的慰问信，去腰坝向徐团长和解放军全团战士进行慰问。旗骑兵保安总队部也派上尉副官王励德，在巴伦别立巴格收购绵羊数十只，以旗政府的名义，送给了解放军，表示慰问。旗区防司令部派出上尉军需谢文彬，将马家军特务营哗变后丢下的枪炮弹药，用汽车运到腰坝，如数移交给解放军。

徐团长也于九月二十五日，派出三名代表到定远营拜会了达理札雅，并了解马家军在定远营哗变时的情况。由于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来定远营，当三位代表到来时，达理札雅与军政官员、部队、学校、商会、喇嘛等一千多人列队在城门外欢迎，并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晚上由旗政府举行宴会，学校演出了新排练的革命话剧，用以招待解放军代表。事后，派人协同解放军到南、北两寺交接了马家军的粮库。

接着，达理札雅派汽车去腰坝接徐团长来定



远营会面。及至徐团长到时，除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外，达理札雅还给以热情招待，并向他介绍了马家军哗变的情况，以及国民党中央和宁夏省马家军阀在定远营设立的机构、人员情况。临分别时，徐团长与达理札雅互相赠送了手枪。作为纪念礼物。徐团长回到腰坝后，不久，即带领部队回银川去了。

有关阿拉善旗和平解放事宜，达理札雅与各巴格、防卡以及驻在下面的保安中队官员，随时用无线电进行通报、联系，作到上下通气，互相了解，虽在偏僻遥远之处，也能及时得知全旗情况。现举达理札雅答复陈爱尔德呢巴图的申艳电报，便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电报原文如下：

磴口陈章京来电悉（一）此间安定如常（二）朱主任（门）返定曾代表我旗向解放军接洽并见彭副总司令对我旗甚表好感（三）解放军一营从石空抵腰坝由徐团长率领任务为搜索马家队伍徐团长经余邀进城洽谈今晨返腰一切甚好（四）派赴宁代表罗瑞光等三人约明日返定（五）现一切待商望速回返为盼锐荪申（九月）艳（二十九日）

在解放军驻在腰坝期间，阿拉善旗政府曾接

到宁夏省军管会的电话，通知旗政府迅速把国民党中央和宁夏省驻定远营各机关的头目，押送宁夏省军管会。接电后，旗政府责成警察局长李树德派出股员马怀诚带警察，搜查、传讯了蒋、马派驻定远营的军政人员和特务分子。午夜时分，这些人被集中在旗警察局。他们是：“伪国防部军事专员罗大燧，伪国防部二厅情报组长李海平和马家驹，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驻阿拉善旗调查专员王君惠，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主任马丽山，马敦静派驻定远营特务营营长孙明楼，原宁夏工兵营营长冯大庆，宁夏省驻定远营银行行长邢椿年等。当夜除将罗大燧、李海平、马家驹连夜送往腰坝，交与解放军带走外，其余王君惠等五人，则于次日由阿拉善旗派人送交宁夏省军管会。

在此期间，名义上充任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少校参谋，但为国民党军统特务负责人的魏文锦，从阿拉善旗解放后，即自动携带电台、武器，去银川宁夏军管会自首投诚。

为了清除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阿拉善旗所属各机关、部队、学校以及居民、商号，

銷毀了國民黨的國旗，扯掉了國民黨的帽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連夜趕製了五星國旗，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家家門前懸掛國旗，處處牆壁張貼標語，大街上舞龍燈，耍獅子、踩高蹺、跑旱船，以及接連不斷地秧歌隊，載歌載舞地熱烈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在新中國成立的當天，阿拉善旗政府，給毛主席和國家領導人發去了致敬電。電文如下：

毛主席暨各位副主席鈞鑒：我們在定遠營邊疆，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不勝慶幸。謹電慶賀，並申竭誠擁護之忱，恭請鑒察。

阿拉善旗政府

十月一日

（原載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內蒙古日報頭版）

為了使牧區人民深入地瞭解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重大意義，並安心從事牧業生產起見，在十月二日，達理札雅派出巴得瑪道爾格、善巴却得爾、曹格札雅、巴圖巴依爾等四人，分赴各防卡向牧民大眾宣布阿拉善旗脫離廣州國民黨反動政

府，服从毛主席领导的起义经过，并又给各防卡发出了第三次训令。训令的原文如下（原稿现存阿拉善左旗档案馆）：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训令

195

定秘字第196号

197

事由：为派该员等前往各防卡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服从毛主席领导，以安地方闾阎由。

巴得玛道尔格 善巴却得尔

令蒙员

曹格扎雅 巴图巴依尔

查本府为安定地方，早日促进民主建设起见，业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并已指派代表与解放军当局进行接洽，结果甚为圆满。现解放军业已开抵旗境，清除逃入本旗之散兵游勇。该军纪律严明，爱护人民，对于地方秋毫无犯。仰该员至各防卡，转达各边官、卡长，应严守岗位，密切协助，以靖地方，而安闾阎。并希转知蒙胞，各安生业，勿相惊扰，是

为至要。切切此令！

札萨克 达理札雅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

早在庆祝国庆之前，达理札雅曾在九月二十九日召集阿拉善旗和平解放指挥部成员开会。当时除在牧区执行任务者外，参加会议的有：罗巴图孟柯、罗瑞光、段巴图尔、左甲木英、李树德、白图布巴依尔（白诚禧）、张仁、罗永寿。会上讨论决定事项如下：

（一）同意达理札雅去银川，拜会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宁夏省党政首长潘自力，邢肇棠，并代表阿拉善旗各族人民、向党、政、军首长献旗致敬。

（二）听取了罗瑞光在银川欢迎十九兵团和杨得志总司令员热情接见的情况。

（三）决定再次向各防卡发出命令，命他们进一步做好民防和安定民心工作，并大力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清除散兵游勇的扰害。

（四）由于李守信残部盘踞在图克木庙一带，以致造成克白尔、磴口等巴格人心惶惶不安，情况混乱。决定由陈爱尔德呢巴图前往进行

安抚，稳定局面。

会后，关于随同达理札雅去银川的人选问题，曾有过一番争执。原来在会上没有讨论到这件事，会后，达理札雅在与白海风等人闲谈中，竟确定了由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戚涛、李文钦等人作为随员去银川。这五人都是外籍人。这种做法，惹得旗府官员大为不满。他们认为，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是在当地人民、政府、军队一致努力下取得的，功劳属于阿拉善旗人民。但现在到了出头露面，享受荣誉的时候，不相干的人物纷纷出场，却把本旗人员排斥在外，这是不公平的。对此，达理札雅感到两难。他只有叫李树德等人出面向旗府官员解释，说：“在这五个人中，有的人代表西蒙自治政府，有的人交游广，神通大，应对有方，带他们去，对我们有利”。等等。经过多方解释，旗府官员才算勉强同意。

十月十一日，达理札雅一行携同随员赵之华到达银川，受到了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宁夏省党政军领导人的热情迎接和盛情款待，达理札雅等人深受鼓舞，从此，彻底消除了疑虑心理，

内心感到无比的温暖。在银川期间，他们多次同省委书记潘自力，省主席邢肇棠进行会谈和个别谈话。据达理札雅返旗后，向旗里军政人员传达会谈内容，大致如下：

（一）关于阿拉善旗和平起义，宁夏省领导人表示全盘接受。

（二）阿拉善旗的行政机构暂不变。

（三）阿拉善旗的军队建制暂不变。

（四）尊重阿拉善旗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五）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阿拉善旗逐步实行民主建政。

（六）保护阿拉善旗各族人民的财产、牲畜不受侵犯。

（七）阿拉善旗原有的军政人员，一律按革命干部对待。

（八）达理札雅继续主持阿拉善旗的军政事务，直至民主建政以后。

在会谈中，宁夏省党政军领导人，对留在定远营的西蒙自治政府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对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的军队与政府却非常注

意。他们主张采取用和平的方法把德、李争取过来。为此，当时研究决定，由达理札雅负责争取德、李早些回来，宁夏方面不派军队进攻。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宁夏省派省军区曹友参副司令员来阿拉善旗协助工作。

达理札雅返旗后，选派左甲木英为阿拉善旗代表，负责与德穆楚克栋鲁普接触，争取他们弃暗投明，早些与宁夏军区对话。

左甲木英十月间到达图克木庙会见了德穆楚克栋鲁普，当即向他转达了宁夏省党政军领导人的意见和要求，并交给达理札雅写给他的信件。不想处在日暮途穷，无路可走的德穆楚克栋鲁普，竟不正视现实，认清形势，反而狂妄地说什么：“我宁愿投降苏俄，也不投降毛泽东”。又说：“宁愿与北平对话，也不跟宁夏和谈”。气焰非常嚣张。对宁夏方面提出来的和平争取意见，一点也听不进耳内。后来，他虽然派出陶布新为代表，会同彭总派到阿拉善旗的和谈人员张钦武（达的长婿），在宁夏进行和谈，但他本人却跑进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蒙古派来的巴图吉尔嘎朗积极联系。与此同时，他的部队也向西北方



向移动。

为了争取德李早日投诚起义，达理札雅由银川回来后不久，曾接到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主任打来的欢迎李（守信）、包（宝贵廷）和德王参加新宁夏之建设，并准予自新的酉（十月）铎（十六日）电报。电文如下（原电现存阿拉善左旗档案馆）：

定远营达理札雅（锐菽）先生对前宁陕边区游击司令李包等欢迎其自动前来参加新宁夏之建设请速派人接洽一事已经函达近闻德穆楚克栋鲁普先生现在乌盟亦请派人前往转告如德先生能与李包部队同来亦欢迎准予自新万勿自误杨得志李志民酉铎。

十月底，德李部队与政府人员由图克木庙动身，途经准沙尔扎庙、巴伦沙尔扎庙，到达了拐子湖，并在那里驻扎了下来。在他们西窜途中，有些散兵流窜出来，抢掠牧民的财产、牲畜，扰乱了阿拉善旗北部六个巴格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据统计当时被抢掠破产的牧民达二百余户。在他们驻扎拐子湖期间，由于无粮可食，不得不大量宰杀骆驼，用以充饥。事后统计，他们共宰

杀骆驼五千余峰。

为了保护牧民的生命财产，阿拉善旗的地方卡兵在段塔拉腾岱、爱尔德呢比立格、赛钦别立格、帕拉嘎代等人的率领下，和流窜出来的散兵打过三次仗：第一次在哈拉木嘎太，第二次在库库尔太，第三次在塔本阿拉德。计在三次交锋中，共打死散兵十余人。

对盘踞在拐子湖的德李部队，根据宁夏省委“政治争取，妥善解决，防止流窜，保护人民”的指示精神，经达理札雅召集协理、章京和旗府官员研究决定，指定由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瑞光为北部地区前线指挥员，段巴图尔、左甲木英、罗都古尔扎布为辅助指挥，以骑兵保安总队第四中队为主力（队长罗都古尔扎布），并召集沙拉布尔都、吉兰太、克白尔、红古尔玉林、巴音诺尔公、雅布来等巴格的民兵，和沙尔扎庙、图克木庙、库列图庙的喇嘛，共计五百余人的民防队，对拐子湖部署了半月形的防御包围圈。以后，又从杨富存指挥下的第一中队里抽出两个分队，协助民防队，加强包围体系。

保安队和民防队的任务是：“大造声势，加

紧包围，避免接触，防止伤亡”。对敌的口号是：停止抵抗，放下武器。

经过左甲木英和陶布新双方代表穿梭般地奔走，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一九四九年底，驻在阿拉善旗拐子湖的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议会的全体官员，在政府秘书长吉尔格朗（吉致祥）、物资统筹委员会主任王亲扎布、议会副议长诺尔布，副秘书长阿穆恩和（张世杰）等人的倡导下，宣布起义；而部队中的绝大多数官兵，也在指挥官孙明海等人的率领下，宣告起义。其中除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特尔、都固仍仓，敖木巴特尔，达喜等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韩沙格拉扎布，葛万拉希反对起义，率部逃往额济纳旗和乌兰察布盟流窜外，全体人员一致表示愿意起义投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由于天寒地冻，人饥驼乏，起义后，他们当时无法成行。延至一九五〇年二月间，天气转暖，才由拐子湖动身，向定远营进发。一路上走走停停，进度不快。行至中途，当他们接到军粮，吃饱肚子后，这才加快了步伐，于四月初来到了定远营。

多  
一  
作

当这部分部队在孙明海、塔力巴、吉利占太等人率领进入定远营时，受到了阿拉善旗前线指挥部的热烈欢迎。接着，在曹友参副司令员的具体指导下，将部队进行了整编。塔力巴所属的一百八十多人，大部分安排到阿拉善旗努尔盖各防卡里，有的在那里落了户。孙明海等人带来的九百多人，有四百多人编为两个保安中队，受阿拉善旗保安总队部的领导，其余四百人要求回家，由宁夏军区送到内蒙，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予以妥善安置。对于蒙古自治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都作了适当的安排。这次缴获的武器弹药无数，全部移交给宁夏军区接收了。

从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达理札雅以宁夏省委处理阿拉善旗问题的八条意见为准则，着手积极作好政府体制改革和军队整编工作。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知识作好革命工作，首先指定由巴文峻负责组织定远营地区军政干部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毛主席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使大家受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以提高思想认识。

一九四九年十月间，宁夏省委派了以云祥生

为领导的工作组，到阿拉善旗工作。工作组的成员有：郭全德、王彦、马鸿彪等人。云祥生等同志，性情温和，平易近人，来阿拉善旗工作后，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面，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方面，深受人们的称赞，在人民中间，留下良好印响。

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由曹动之任书记，从此，阿拉善旗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民主建政和民主改革工作。

在宁夏省委的亲切关怀下，在旗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在一九五〇年五月间，将原阿拉善旗政府，改组为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达理札雅为主席，云祥生为第一副主席、罗巴图孟柯为第二副主席，陈爱尔德呢巴图为第三副主席。委员有：曹动之、左甲木英、白诚禧、段巴图尔、胡爱立佐巴依尔、陈那笋巴图、金巴图道尔吉、李树德、罗瑞光、巴文峻、何兆麟、白海风、张仁、罗恩凯巴图、齐文魁、罗永寿，秘书长由巴文峻兼任，副秘书长为李文钦、朱门。

在旗人民政府下，设置的职能机构有政务处，处长胡爱立佐巴依尔；财政处，处长左甲木英；文教处，处长齐文魁；秘书处，处长谢尚德；生产事业处，处长张仁；公安局，局长李树德。原有的三十六个巴格，也都建立了巴格人民政府。

阿拉善旗原有的骑兵保安总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归宁夏军区直接指挥，总队长为罗巴图孟柯，政委朱子春，副总队长罗瑞光，参谋长罗永寿。

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诞生，它标志着统治阿拉善旗已有二百六十三年历史的封建制度的结束。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全旗各族人民充分地享受着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从阿拉善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旗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顺利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有：（一）在旗与巴格之间，建立了区一级的六个苏木公署，成立了苏木工委，加强了党对牧区的领导；（二）在牧工、牧主两利的原则下，规定了牧工的合理报酬，促使牧区牲畜

的总头数，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万头，迅猛增加。

（三）调整了定远营市区的房租，并承认了汉族居民有房屋所有权；（四）配合宁夏土改，将旗属半农半牧区的磴口等四个巴格的旗地、庙地二万八千亩土地，分配给了农民；（五）八大寺的大喇嘛、僧官，由寺庙自由选举，政府不再任命；（六）开展抗美援朝的捐献活动，全旗各族人民共捐献人民币一百六十多万元；（七）召开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旗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八）动员全旗牧民，支援修建青藏公路骆驼八千多峰。

此外，在人民生产发展，生活提高的基础上，又于一九五二年七月间，召开了全旗那达慕大会，用以庆祝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会上除有民族形式的运动项目外，还有球类及田径赛。参加大会的共一万五千余人，其中牧民八千多人，占牧区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参加大会人数的一半还多。宁夏省党政领导对此也非常重视，副主席孙殿才、马腾蒿都来大会参观，还带来省歌舞团、电影队为大会助兴。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可以说是阿拉善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盛会。

今年，建国三十五周年了。三十五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下，阿拉善旗山河巨变，面貌一新，现在，正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中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为开创未来的美好前景奠定基础。面对这种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我们当时参加过阿拉善和平起义的人员们，从内心里引以为荣，感到自豪。

回想三十五年前，阿拉善旗在大兵压境，特务横行的恶劣环境里，达理札雅以沉着的态度，刚毅的魄力，机智的手法，坚定的信念，带领我们与蒋马反动势力斗，与德李一伙斗，费尽心机，竭尽全力，终于战胜了一切反动派，使阿拉善旗秩序井然，完整无缺的得到和平解放，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以致有了今天的繁荣、幸福的生活。这段历史是光荣的，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 日寇侵占大余太的罪恶史略

董玉奇

## (一) 简介重镇大余太

1903年(清光绪29年),在大余太设置五原厅(后移置于兴盛旺,又移置于隆兴长即五原),管辖莎拉齐之西部后套地,在五原厅设置时,大余太设置“分司巡检”,进入民国以后五原厅改为五原县,“分司巡检”同时撤消。1925年(民国14年)5月1日,设置了大余太设治局,由垦务分局长张锡余兼任局长,以后实行委放制,由王佑、孙起凤、田思诏、李成励、魏治馨、杨承愉等继任局长。1929年8月,大余太设治局改为安北设治局,局长为邱文彬。以后由郑桓武、齐寿康、陈国祯等继任局长。1939年12月,大余太筹备并成立了日伪“安北县公署”(归巴彦塔拉盟管辖),安北县公署县长布和巴雅尔;安北设治局长、县长分别为张龙祥、乔学曾、张玉璞、薛佩印、陈质

文等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余太地区重归安北县政府管辖，设置了区公所。

在安北设治局时期，管辖地区极为辽阔。西起蔡家地（五原附近），东至后口子（包头附近），北连中公旗的交错地带，南临大黄河。东西长达三百余华里，南北宽将近一百华里。在大余太设立第一区公所，在贾泉湾设立第二区公所，在桥湾设立第三区公所。每个区各设十个乡。到敌伪统治时期，其辖境大为缩小，名义上是：西濒乌梁素海，东接包头、固阳，北邻中公旗，南界西公旗，东西长约二百华里，南北宽约六十华里。而实际上，敌人仅可控制乌梁素海东岸一带，以及大安镇（今大余太）、余仁乡（今明安）、余智乡（今朝阳）、余忠乡（今小余太）等乡镇和交通要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大余太地区归安北县管辖时，除乌拉山前后归西公旗隶属外，其余辖域与安北设治局相同。一九五四年，大余太划归乌拉特前旗管辖。一九五八年，撤销安北县的建制并入乌拉特前旗以后，在大余太、明安成立了人民公社。

大余太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盛，矿产也

很丰富。目前大余太乡是乌拉特前旗农业亩产最高、总产最多、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乡。但在旧社会，大余太地区在农业上，沿用落后的耕作工具和粗放的经营方法，种植小麦、糜子、莜麦、荞麦、亩产一二百斤，遇有蝗、旱等自然灾害，收成更低；牧业上，以放牧牛、马、羊、驼等牲畜为主，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榨，加之缺乏用科学方法饲养繁殖，以致发展缓慢，每年除农牧民少量食用外，可向外地出售一些皮毛，换取些生产生活资料；工业上，仅有些小手工业，无任何现代化工业，尽管当地蕴藏着煤、云母、石棉、沙金、白矾等轻重工业原料，但在日伪时期，仅有数十人挖掘石棉，此外，再无开办任何矿山工厂。

清末以后，归绥（今呼市）、包头两地商贾云集，大宗皮毛、药材运往京、津销售或出口。这些物资产于新、甘、青、宁等地，绝大部分是由骆驼驮载而来，因而开辟了绥新驼路。大余太是归、包通向宁、甘、青、新等地的主要经过地点。由包头经后口子到大余太，然后再经乌兰脑包、义太魁、磴口到宁夏平罗为北路；由大余太经四

柜、隆兴长（五原）公中庙、磴口、抵宁夏平罗为中路；由大余太经大有公、西槐木、邬家地、强油房（今临河）、头道桥、老磴口、石咀山到宁夏平罗为南路。安北设治局时期，大余太可向包头通电话、汽车，但运输物资仍以骆驼为主。在日伪统治时期，大余太可向南昌、台梁、后口子、包头通电话，向包头通汽车。虽然由大余太向阿拉奔（现为额尔登布拉格）、小余太等地修公路，但无专人维修管理，也没有使用过多少次。

大余太成为绥新驼队来往住宿休息的地点以后，逐渐形成城市货物与农牧区产品交易的场所。民国十八年，安北设治局局长郑桓武在任时，为了平靖地面，防治匪患，发展商业，活跃经济，于是大兴工程，修筑土城，其办法是：强迫民众，外侧挖土成壕，内侧堆土筑墙，简便易行，一举两得。故其进展甚快，于民国十九年竣工。城壕深一丈、宽三丈，城墙高二丈、顶宽六尺、周长共六里，直径一里半见方，东西开门，南北设水闸，从此，人称“余太城”。

余太城在抗战前夕，已逐渐发展成为余太地

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聚集的中心。城里除设有政权机构和学校之外，还开设了几家规模不大的京货店、皮毛店、杂货店、车马店、肉铺、饭铺、剃头铺、药铺、磨坊、碾坊、缸坊、豆腐坊以及木匠、铁匠等手工业。农牧民经常进城购买生产生活等用品也还方便。到了日伪统治时期，余太城骤然起了大变化：插上“红膏药旗”，驻上日军司令部、日伪军队，成立了伪县公署、警察大队、宪兵队、维持会、日本小学。此外，还开设了大蒙公司、照相馆、富士食堂、载歌楼、随军妓院。至于余太城里的人口，抗战时期有七百多人，连同其它各乡的人口达七千多人。而今单大余太的人口就达二万三千多人，连同明安、小余太、朝阳等乡在内，共达五万八千多人。

夫余太，不仅是通往包头、固阳、中后、五原等地的交通枢纽，而且是包头与后套之间的要隘。它是守护后套的重要门户，收复归、包的必经大道，向东进军的军事重地。日寇若占领了这里以后，则成为凭借乌梁素海与八战区军队对峙的前沿基地，构成了护卫包头的外围据点，进犯

后套的跳板。无怪乎日寇占领包头之后，虎视眈眈，迭出重兵，侵占大余太城七年有余。

## （二）日伪夺城战 人民遭涂炭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沿平绥路向西侵犯，张家口、大同、丰镇、归绥、包头相继失陷，敌人对占领区烧杀掠夺、奸淫妇女，穷凶极恶、无所不为。包头附近及绥西一带的城乡人民耳闻目睹日寇的残酷暴行，个个咬牙切齿，忿恨万分，终日人心惶惶，忧虑重重。但是就在固阳县落入敌手以后，战火灾难迅速蔓延到余太城。

在固阳县失守时，杨德三拢络了旧社会保安队兰瑞、薛义、周志聪等所带的团伙，同时收罗了一些散兵游荡者共约四五百人，背叛祖国投靠日寇，被改编为保安团（老乡称“杨团”）。日寇占领包头不久，需要布防修整，无力立即向西侵犯，于是派杨德三率保安团人马占领并驻防余太城给他们效劳卖命。杨德三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地让其主子驱使。

一九三七年阴历九月十五日，“杨团”带领其全部人马，由后口子经明安等地，突然占领了余太城。他们穿上日军服，骑上中国马，打上“膏药旗”，学说日本话。他们为虎作伥、抢劫民财、欺女打男。闹得家家不宁、户户不安，后来日寇从包头把张官的人马派归杨德三指挥。东公旗的贺得功、吕子新，当地的武俊峰等人马，也投归杨德三率领。从此，日寇加封杨德三为保安司令，升为少将。

一九三七年腊月二十九日，绥西部队在门炳岳师长的主谋下，由门的骑七师、石玉山的骑四师和乔占海（代理）的游击师，各抽调部分人马，周密部署、互相配合，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收复了余太城，消灭了伪军。其具体分工任务是：骑七师的十九团攻打西门、西南城角；游击师乔占海率一个团，骑四师田占海率一个连共同攻打城南一带；游击师的王国祥率第二连，并指挥第三连攻打东门一带；游击师的张汉山率第一连，罗永胜率第四连攻打西北门。此外，还在日寇可能从固阳、包头增援的险要地区，严加戒备，以防意外。

是夜“杨团”的人马，正在剥葱、捣蒜、剁肉、和面，准备包饺子过年，万万没有预料到绥西的军队攻城。他们在四面八方围攻冲锋的密集枪弹中晕头转向，一片骚乱。尽管仓仓惶惶也进行了还击，但由于他们乃是乌合之众，再加实力不足且无接应，所以余太城很快被攻破，全军复没。杨德三的人马企图由东门突围，遭到负责攻城部队狠狠打击。结果杨德三只身化装逃脱，其手下随从四五人被击毙，另有三十多名士兵也被打死。杨德三逃到固阳以后，又收拾残兵败将，招兵买马，企图重张旗鼓，死灰复燃。岂知手下心腹人弓得胜举旗投降绥西部队，亲手杀掉了这个罪魁祸首。

余太城这场战斗结束以后，门炳岳师长欲委派乔占海担任旅长，统率所有攻城部队，仍然驻防大余太，乔占海一再推辞没有接任。后来在所有军官中，共同推荐武俊峰担任了旅长，由骑七师委派了一位乔付旅长，由骑四师委派了一位何参谋，组成新的部队，驻防大余太。从此，余太城的乡亲们满以为可以安居乐业，不再受鬼子的蹂躏了。谁想不久以后，日寇为了报复



消灭“杨团”之仇，在追击马占山部队时，又出重兵攻陷了余太城，使城内外的军民遭到难以形容的惨酷屠杀。

日寇为什么要追击马占山部呢？原来在平津沦陷以后，他们沿平绥线大举西犯时，马占山部尽管装备实力极其低劣，但在张家口一带曾有力地抵抗阻击过日寇，因而激怒了他们，紧紧尾追马部不放，企图全歼该部而后快。随着战局的发展，于是形成日寇边打边追，马部边退边打的趋势。当固阳失守以后，马部向余太方向撤来，日寇出动飞机、大炮，装备精良的部队，也向余太方向追来。

马占山部来到余太城附近时，与城防司令武俊峰联络，要求入城修整迎战日寇，但遭到武俊峰的拒绝。马部想派士兵进城买些烟火之类的用品，也未蒙许可。后经一再交涉才用长绳拴上筐子，把钱吊上城墙，然后买上东西再吊下城去。马部在如此情况下，离开余太西去。武俊峰为何如此绝情呢？其中也有缘由。原来余太城来了三位带有关防印信文件的上司大员，当马占山要求入城时，这三人以上司派员的身份，坚决不许武

俊峰放入，武俊峰只好遵命照办。谁想后来日寇占了余太城以后，这三位大员，竟坐上了日寇的汽车，说明他们乃是特务人员，而武俊峰却竟懵懵懂懂受了欺骗。

一九三八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的早晨，日寇出动了汽车、装甲车，由固阳县沿小余太川向西推进，余太城内军民毫无半点觉察。接着余太城上空出现日机三架，低飞侦察了一番之后向东飞去，大家也不以为然。过了不久，日机三架又在余太城上空盘旋，这时城北煤窑沟口，出现了头戴钢盔身穿草黄色军装的日寇，并把大炮架在沟口东侧，居高临下，威胁着余太城及其附近地区。就在日机向城内街道上、我军阵地上低飞投弹扫射时，大炮也向飞机轰炸过的目标接连轰击而来。与此同时，敌人隐蔽在煤窑沟内的汽车、装甲车，摆成“钳”形阵，包围了余太城，一路由西向南，一路由东绕南而西，迂回汇合。在日寇的战车奔驰，机枪扫射下，烟硝弥漫、黄土滚滚，其攻势十分凶猛。

当时在城内外驻防的部队实力，计有武俊峰的第一、五团二百多人，安华庭旅的第十团约六

百人，门炳岳师的一个参谋，带两个连约三百人，共计一千人，虽然在仓惶中分别奋起迎战，但在对方陆空配合及用当时比较精良的武器攻击下，难以取胜。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向石纳干、阿力奔等方向突围。

在这次突围中，曾抽出兵力阻击日寇，有两处打得英勇顽强。其一是骑七师的十七名士兵，在十七份子村的一个圈套里隐蔽，日寇的汽车横冲直撞，以为所向无敌，不料在这里受到阻击，牵制住二十多辆汽车不能前进，到天快黑时，派来援兵，骑七师的士兵才撤去。他们只好拖走被打坏的汽车以及被击毙的二三十具尸体。另一处是岳升团下属三连连长敖腾（蒙人），奉令在西门上掩护，他英勇沉着指挥战斗，后来干脆由他一个人，时而在城内射击，时而又从水闸钻出城外射击，直到子弹打完连其护兵的子弹也打完，才从水闸里钻出城墙，向山上逃去，鬼子追赶不上，只好罢休。日寇清扫战场时，在西门附近用三辆汽车装了数十具尸体拉去，然后连同骑七师击毙的二三十具尸体一并火焚。

这次突围，武俊峰在紧急关头，从南城墙上只

身逃出，后来遇上张汉山，送给他一头骡子才骑上。余太城里的老百姓，一片混乱，有的人藏在家里，听天由命，有的人扶老携幼挤出西门或者跳出城墙，向西及西南方向逃避。军民在城西和西南一带开阔地区，遭到日寇战车的疯狂追击，牺牲十分惨重。

余太城里的邬三来红（今年八十二岁），当时他也逃出城外，日寇汽车追击军民时，他藏在一堆沙蓬下窥视，见鬼子在城南回回坟附近追上十几个老百姓，除留下一个穿红袄的闺女外，其余全用机枪射死。横七竖八的，倒在血泊里，库贵宝、库太宝、吴富小等三人，跑到三贵人的房后藏起，但也没逃脱追击被杀害。有些买卖人拉的一百多峰骆驼，逃到毛窑子一带，也在一阵扫射之后，躺了下来，留下了它们的遗体；田地生的父亲跑到城外遇上敌人追击，他在急忙中藏在一个塌毁的圈里。敌人追到这里，并未仔细搜索，而田老汉在惊恐气愤下，不久与世长辞。在城内大街小巷，也到处有倒卧在血泊里的尸体，惨不忍睹。有个在王满元房里做买卖的掌柜，藏在窖里，他死活都不出来，而鬼子又不敢

下窖去，便开枪把他打死在窖内。一个军人换了便服，军帽还没换过，他碰见一位毡匠，戴着便帽，便乘其不注意互换了帽子，恰在这时鬼子赶来，发现毡匠带着军帽，认为是反抗他们的军人，于是拔出战刀狠狠地向这位毡匠砍了一刀。另外，当飞机向城内大街十字口投弹时，殷老汉正在做小买卖，被炸弹夺走了性命。剃头铺的高师傅听到飞机低飞时，急忙出铺逃躲，结果被炸弹炸得骨肉横飞，一只手臂飞上房檐，墙壁上沾满了鲜血和脑浆。

### （三）“三·二五”日寇大屠杀

一九三八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阳光暗淡，山川变色。日寇攻陷余太城以后，在城墙上、城门上戒备森严，杀气腾腾，气氛可畏。整个城池变成一所监狱，中国人民成了他们任意宰割的羔羊。日寇宣传的所谓“中日友善”“睦邻相处”乃是一派鬼话。他们张牙舞爪、耀武扬威，用刺刀机枪把城里的男女老少赶到后街一带，分片集中起来，准备澄清每个人的身份以后，下毒手

大惨杀，其目的无非是彻底消灭中国人的反抗力量，长期奴役统治这块地区而已。

当时城内居民陈虎，以开碾磨坊为业，本人好管事有威信，众人推他当维持会长，宋德富河北人，贫苦家庭出身，日寇进城以后，逼着他跑前走后，也被选为付会长，日寇强迫维持会长和镇长徐士威，对集中起来的人逐一细认，并把认识与不认识者分开看管。在被包围的当地人、探亲的人、拉骆驼的商人、化装了的军人以及担架队（骑七师准备攻打固阳，从五原、临河征集的担架队，三月二十四住到余太城三百多人）虽然愤怒万分，但无可奈何，有的心惊胆颤，面面相觑，谁也预料不到自己如何结局。

在认人的当中，人们不清楚敌人的企图何在，有的急于想叫陈虎认出他来，以便逃脱虎口，有的怕被陈虎认出之后不利。而陈虎在敌人刺刀逼迫之下，不得不如实认人，不过他对城内的人、对面孔熟悉但叫不出名字的城外人、他不认识而对方喊他“陈虎哥”、“陈虎叔”的人，都认为是认识的余太人。鄂三来红的两个内弟来余太探亲，陈虎不认识，被列在不认识的人群

内，邬三来红向陈虎说明情况，陈虎向日本翻译说明原委，于是把这二人又列为余太人的范围以内。

在陈虎等不认识的一批人中，还有不愿叫认识者、受敌人欺骗者、兄代弟死者等等情况，如王满库之子王治歧，躲在众人身后，逃过陈虎目光，致被陈虎漏认，列为不相识者范围之内；又如敌人狡猾地高喊：“给军队做过饭的、喂过马的，统统地出来干活！”有些朴实的马伕、伙伕果然站出一部分，被列入不相识者范围之内；还有杨四是个军人，其兄杨大，不忍心其弟受害，强行换上杨四的军衣，结果也列为不相识者范围之内，凡陈虎等所有不相识的人完全拉到另一个圈套里，严加监视，都成了屠宰的对象。

邬三来红当时以小商贩为生，日寇进城以后，对他搜身只搜出一把钥匙，再没发现其它可疑之处。鬼子诡计多端，叫邬三来红用这把钥匙开门，以试虚实。结果邬三来红用这把钥匙开了自己的房门，鬼子消除了怀疑。便逼上他去挑水。当时余太的井有十几丈深，要用辘轳绞水，他精疲力竭，而鬼子嫌太慢，打了邬三来红几把掌。当

邬三来红勉强打满一担水后，鬼子逼他挑到西门外城壕旁洗手洗刀之用。邬三来红惊呆了，原来这里开了屠杀场！

日寇把那些所谓不认识的“危险分子”、“嫌疑犯”五花大绑一批一批拉到西门外城壕旁，对每个人任砍或任捅一刀，在一刀之下，没死和半死的人，都推到城壕里，让后来被杀死的人压死或闷死。鬼子们的双手和屠刀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军衣上到处是血迹斑斑。就在邬三来红看得惨痛之际，被一个鬼子踹了他一脚，用不中不日的話，比比划划，意思是说：“不杀你的头就够好了，你还不快快开路！”邬三来红会意，赶快离开这里。

“三·二五”这天，邬三来红在西门外亲眼看到鬼子惨杀了约三百余人；王国祥在突围中，也亲眼看到牺牲者约一百余人。总共达四五百人。死尸成山，血流成河！成群成群的狗，大啃大嚼死人肉。直吃得眼睛发红，凶残可怕，后来见了活人也敢乱扑乱咬。阴历三四月，天气渐热，西门外一带的死尸很快腐烂，那种臭不可闻，惨不忍睹的情景，如今七八十岁的老人深深烙在



心头上，犹如就在昨天一般。

日寇进行了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之后，修整了十几天，自动龟缩回包头。武俊峰又收罗其部下返回余太城。

#### （四）在日寇七年多的统治之下

1.假仁假义怀柔手段。一九三九年阴历二月二十六日，日寇由包头出动了六十多辆汽车、装甲车，在小林一男大佐指挥和飞机掩护下，经由后口子、明安等地，肆无忌惮地向余太城进犯。这次余太城没有抵抗，于是“膏药旗”又插在这块土地的上空。他们为了达到长期统治下去的目的，首先施张了假仁假义的伎俩，玩弄怀柔手段。他们组织宣传宣抚队，坐上汽车，带上饼干、糖块、香烟，在城内和各乡村散发。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日友善”、“皇军保护良民”等花言巧语，迷惑欺骗群众。

2.戒备练兵意在占领。小林一男为了长期统治大余太，为了他率领的联队(团)安全，于是用刺刀皮鞭强迫民工，修筑城防工事和军营，他们

在城门上，城墙上，修起碉堡掩体，在城西四周深挖护城壕，架上铁丝网，在城内后街以北，划为军营司令部，操场，华人不得逾越一步，在军营的西北方向，建起两栋大兵房（每栋可容一二百人），还盖起司令部、办公室、军官宿舍、两个伙房（一在西北、一在东南）。另外给派驻台梁、南昌、后口子及石纳干的伪军警盖起三角碉堡。还于一九四二年仿照筑余太城的办法，给南昌修筑了一座周长四里的方土城。被征用的民工，在毒打下劳动，无合理的报酬。有时他们为了买好民心，劳动终日发几盒火柴，有时也发些低微的工资，但被工头从中揩了油，民工们苦不敢言。

日寇在余太城的城门口、城墙上，在南昌、台梁、后口子、石纳干等外围据点上，设立岗哨、严加警戒、盘查行人、进行镇压，中国人进出城门通过岗哨必须向鬼子鞠躬，否则按反抗“皇军”论处，他们对俊俏的妇女进行调戏，对其认为有怀疑，不顺眼的人，立即扣押起来，审讯追究，另外经常派兵在乌梁素海东岸一带侦察，监视八战区的军事动态，严防遭到奇袭。有

时在“讨伐”中与八战区军队接了火，便马上关闭城门防守，以防发生意外。

小林一男是个地地道道的天皇走卒，武士道的信徒。他每天黎明集合全体官兵，向东方遥拜（向他们的天照大神及天皇遥拜）而且念念有词，大意是“祝天皇万寿无疆”“武运长久”。另外他对训练士兵，严格认真，经常让士兵戴上护面、护胸练习拼刺，还经常打靶和实弹（橡皮弹头）射击，他们随时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而准备。

3.精心设置傀儡政权。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寇着手筹建傀儡政权，派山田恒为“安北县公署”筹备处顾问，派东北蒙人布和巴雅尔（汉名马成明）担任筹备处处长。下设总务、警务二科，进行具体筹备事宜。在各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全部结束之后，“安北县公署”正式成立，地址设在现在粮库院内，由山田恒担任顾问，布和巴雅尔担任县长。其下设主要机构和职权是：民政科，设会计、财务、实业三股。会计股掌管各项用度和经费开支等事宜；财务股掌管财政收入，税务等事宜；实业股掌管丈量土

地、征收粮款、大烟等事宜，另外还设专人，管理学校教育等事宜。总务科，掌管行政、人事、粮饷、生活等事宜。警察大队，设警务、警备二股；警务股掌管人事、装备、被服等事宜；警备股掌管军械、弹药、情报、发良民证等事宜（本股下设看守所，监押人犯）。在大队部之下，管辖警察署及第一、二、三中队：警察署负责训练警察，维持城内治安。各中队负责对派驻地区的警戒和维持治安等任务。第一中队派驻后口子，第二中队派驻台梁，第三中队派驻南昌。

总括县公署五十多人，警察署四十多人，警察大队三百多人，都受日本人统治。县公署顾问（后改为参事）山田恒、林宽忠、高桥良泽、钱川正，警察大队首席指导官冈部正好，警察署指导官莺初真美。警务股指导官五丁未光，警备股指导官小池猛，民政总务二科辅佐官松本义春，第三中队指导官高桥信雄等均归日本司令官小林一男和以后接任的石桥指挥。而县长、科长、股长、署长，大、中队长等，均归同级的日本指导官定夺一切。

顾问山田恒系简任级官衔，由上级派来安

北第一线“开辟政权”。他说一不二，当地需要多少经费，上级如数照拨。林宽忠、高桥良泽、钱川正等人，虽不如山田恒官衔高，但同样说话算数，都能随意进出日本司令部，是“安北县公署”真正的掌权者。县长布和巴雅尔系大学毕业生，他处处得依照顾问、参事的意见办事，形同虚设。至于警察大队长高谷赐，相当于上校，但他处处得听从相当于中校的日本首席指导官冈部正好指挥。

警察大队的人马，一部分由萨县、东北一带调拨而来，另一部份由当地乡村保甲抽派而来，除少数好人外，大部份是烟鬼，赌棍、流氓、土匪。他们用的是汉阳造步枪和六五、七九步枪，这帮人靠向老百姓征粮要款过活，反而任意欺压老百姓。

在县公署的基层，设立乡、镇、保、甲，余太附近为大安镇，设镇长一人，文书一人，跑腿者二三人。其余余仁、余智、余忠等乡，也各设一名乡长、一名文书及跑乡者二三人。他们执行县公署的命令，推派征收粮款，收购大烟，发放良民证，支应杂差等事宜。

4. 奴化教育毒害心灵。日寇在余太城里，开办了一所小学校，其地址设在县公署院内，有四五个教师、四五十名学生。以后校址移到前街路东，有五六名教师、五六十名学生。这个学校完全按日本帝国主义教育方针教学。学生每日以学日语、算术、汉语为主，也开设唱歌、图画、体操等课。他们着重灌输天皇至上思想，武士道精神以及法西斯式的服从观念。每天朝会时，要“向东遥拜”。平时和上体操课时，完全要按军事化的要求动作，根本不让儿童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许有丝毫民族主义感，更不许对日有不满情绪。

5. 毒化政策摧残健康。日寇占领余太以后，实行毒化政策，强制农民大量种植大烟。除上缴公家外，可以自己抽用。每年在春耕季节下种烟籽。烟苗出土以后，经过锄薅抚育，到六月份收割奶浆。然后把奶浆晒成烟膏，再晒成烟板子。由于地质好坏不同，经营管理技术有高有底，所以收获烟土也多寡不一。一般每亩地可以收烟膏七八十两，约可晒成干板子三十多两，每亩地交公家十两。

为了做好收交烟土工作，巴彦塔拉盟成立了“清查權运局”办理此事。每年由县公署把各乡村种植大烟亩数、土质好坏加以登记造册，报到清查權运局”备案。收大烟前，仍然要由各乡保甲长会同县公署的官员，清丈种植亩数，估计可产烟土数，确定上交烟土数，汇总造册，上报“清查權运局”。在清丈烟地时，承办人员乘机敲诈勒索，凡对他们招待殷勤或塞上腰包者，就少丈少交烟土，反之，则多丈多交烟土。县公署实业股长李文源在清丈烟地中大吃贿赂，遭到群众不满和反对。傀儡县公署不得不作作样子把他撤职，委派他人办理此事。

在“清查權运局”的管制下，实行对大烟统一配给制，供应社会上销售。私人向公家买上压有“验讫”金字的“官烟”可以携带或开烟馆零售，不压金字的“私烟”不准携带贩销，违者按往“敌区”（指八战区）贩运烟土治罪。大余太是产烟区，家家户户都有“私烟”，尽管稽查得很严，但在这种伪政令下，却给特务、狗腿子造成可乘之机，贫苦农民带上三五两烟土外出经常被他们恫吓勒索一光。距大余太较远的明安、

小余太一带的贫苦农民遭受这种损害者，不计其数。

在毒化政策下，不仅日伪人员、地主特务、狗腿子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小帮土匪也蜂起不绝。每年在收割烟土时，小帮土匪携带武器，假装“抗日部队”探听日伪军情，在烟农家里又吃又喝又住，临走时敲诈上烟土而去。接着又来了一帮土匪，假装日伪军，侦察八战区的军事动态，同样要吃要喝要住，勒索上烟土而去。烟农两头受气，苦不堪言。九份子村一个单身汉烟农刘二，气愤之极，忍无可忍，一次乘土匪喝水时抢去土匪的手枪，击毙二匪，抛弃了他的一切家当而逃。

由于当时广泛种植和出售烟土，所以吸食大烟者与日俱增。男的、女的、老的、年青的都有，他们抽大烟抽得面色铁青，萎靡不振，烟瘾发作时，又打哈欠又流泪，浑身没劲动不得。大大摧残了同胞们的身体健康，消磨了斗志和气魄。

6. 身份证件束缚手脚。日寇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安全，长久统治余太地区的人民，所以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成年人必须持有“良民证”（身份证



明书)，有证者，行动方便，不受阻拦，反之，则按“坏人”、“嫌疑分子”论处，有杀头的危险。发良民证的办法是，每人照一张胸前戴上编列号码的一吋半身象片，由保甲长开上证明，领到警备股审查办理填发手续。以身份证号与照片号相符为准，在贴照片处轧上发证机关钢印，在空格里压上本人的两个食指印纹。由于这是生命安全与否的“要命证”，所以承办单位可以借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凡给他们送礼行贿者，则顺利发证，相反，则故意刁难，甚至借口陷害。群众怨声载道，怀恨在心，终于向承办手续的警备股长、日本指导官告发。敌人为了收买民心，巩固政权，不得不把承办人警尉高奎之、警尉辅王汉成、警长李端、警士赵记泽四人撤了职，另派刘班和其它四个警长警士办理此事。

自从发了良民证以后，无证者成了怀疑杀害的对象，一经抓获，由宪兵队审讯处治，在非刑拷打下，其后果不堪设想。有一次抓了个来城里探亲的毛毛匠，此人身着长衫，头留长发，日寇怀疑是个“探子”，于是把他拉到东门外距城壕偏西二百米处，捆在柱子上，当活靶子，由十二个

鬼子轮流向毛毛匠任刺一刀。又一次逮住牛六、牛五弟兄二人和另外的一个人，也把他们拉到东门外，捆在柱子上，一刀一刀地刺死。

7. 宪兵机构残酷无比。日寇占领余太城以后，就建立了宪兵队，由曹长岸熙担任队长，王雁五任翻译。宪兵的服装与一般士兵相同，唯在臂上佩戴“宪兵”二字袖章，他们不但管中国人，也管日本兵。部队设在现在的派出所院内，在队部三间牢房里用粗椽子筑成栅栏，一旦把人关了进去要想出来，难如上天。在宪兵队长岸熙手下，豢养了若干本地人当特务，他们遵照岸熙的命令办事。用打军棍、灌冷水、“过电”等手段审讯折磨人，是一帮侦察、扣捕、毒打、杀害同胞的刽子手。宪兵队附近的居民，或过路人，经常听到队部里传出的审问声，拷打声，尤其在深夜，被审讯的人犯受刑不过时，其惨痛呼叫声，更令人毛骨悚然，凄不忍闻。

有一次，一个人叫张国兵，按“嫌疑犯”拉出东门，到头份子、三份子等地游村，然后返回西门外二堰壕被鬼子一刀砍死，另一次又逮住“嫌疑犯”三十多人，他们觉得砍头刺杀都不过

癩、采取了另外一种残暴手段，即事前在东门外，挖了长三十米、宽一米多的一道壕，把挖出的土堆到西面，形成一道长坝，然后把这三十多人拉到坝上，站成一字队形，接着鬼子头目一声令下，只听哒……机枪由北向南扫射，三十多人中，有的死去栽到壕内，有的受伤未死，有的屹立不动，他们记了数字，然后把未死的人都推进壕里完全埋掉。

8. 派遣特务进行活动。随着日伪政权的建立，日本的特务机构也建立并活动起来，当时由包头特务机关，派来日本人小林，在安北县地区搞特务活动，由蒙人巴兵青当翻译。此外，还有日本人小仓、汉人范××两名特务，也来安北县活动。小仓本人于一九三七年前即潜伏于东北蒙区，他刻苦学习蒙语，熟悉蒙古人的风俗习惯，穿上蒙古袍，蹬上三角头靴子以后，其举止言行，与蒙古人不差分毫。

可能是出于军事需要，小仓、范××二人化装成“蒙民商人”拉上骆驼，载了些火柴、布匹，经中后旗一带绕到陕坝，当时陕坝是八战区的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的所在地，为了联络蒙古

人，搞好蒙汉关系，长官部和省政府对这两位“蒙民商人”不但没有刁难，反而受到欢迎，就这样被他俩钻了空子，完成了他们的特殊任务。

此外，有个日本人叫田中休山，他在包头成立了“水印公司”，利用中国哥老会组织，进行特务活动，后来在余太城成立了“唐公馆分会”是他向安北县派出的特务机构，于是余太在关帝庙后面也成立了哥老会，有个叫魏××的三龙头，被发展成“唐公馆分会”的会员。这个组织扩充了不少人，还组成武装力量，由于生活困难，有二十多人到坝湾打鱼维持生活。

9.大蒙公司盘剥民众。在日本的傀儡政权建立以后，余太城成立了“大蒙公司”设有批发部、零售部，经营皮毛、碱盐、布匹。日本人佐佐木担任顾问，一个汉人担任经理。公司里有十几名雇员，大部分是山西岱县和包头人。他们还在南昌设立了“出張所”（展销的意思），因为南昌位于乌梁素海东海畔，是入海的关口，是向后套推销货物的场所，也是后套商人以皮毛、粮食换取必需品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市场很活跃，“大蒙公司”每年赚得巨额利润，佐佐木等一帮人从中

捞到不少油水。

为了防止在进出货物中发生意外，由伪政府人员、特务、宪兵等组成检验机构，对出口的货物要经过许可，对入口的货物要经过检验，否则，不能随便交易，其地点设在宪兵队附近，一旦发现问题就近由宪兵队处理。

10. 食堂妓院生意兴隆。日寇占领余太城以后，在前街西头开设了富士食堂和载歌楼饭店，载歌楼的东家，是日本人，名叫八木，性格非常暴躁，他的女人却极为温柔贤慧。他们雇了三个姑娘，接待顾客，后来雇上中国工人开设缸坊，大获其利。至于富士食堂，则是一个朝鲜人开设，也雇了三个朝鲜姑娘当招待，由于这两家都有美妙俊俏的花姑娘，殷勤接客，笑脸待人，所以经常招来顾客光临。

这两家饭店，以接待日本人为主，也接待当官的汉人，不接待老百姓。顾客们大吃二喝，十分欢畅，加上女招待斟酒劝饮，更是云里雾里忘乎所以。日本人带了醉意以后，往往敲盘击碗而歌。女招待也随之和唱，到极其欢乐时翩翩起舞。当女招待者为奴婢地位不能与客人平起平

坐，但在客人们酒酣兴发之时，身不由己，任其蹂躏不一而足，狂呼乱叫直到深夜而散。

在这两家饭店的后面，开设了随军妓院。这里有近二十个妓女，专门接待日本人，妓女的装束与已婚的妇女不同，如顾问林宽忠首席指导官冈部正好、指导官小池猛等人的女人，均穿着仿效我国古时的“吴服”，而妓女们则穿一般“和服”。

妓院的房间特异，进了大间套小间，出了这间进那间，不熟悉情况者，进了妓院找不见出口，日本人在酗酒以后，三三俩俩钻进妓院，过上一定时间以后，他们对这些妓女玩弄腻了，于是来一个换班，去旧迎新，这些法西斯狂徒，自知来日无多，只不过是借酒色来麻醉身心，聊以自慰而已。

### （五）同仇敌忾怒杀高桥信雄

余太城被日寇长期统治以后，八战区的军队经常以游击战术，袭击小股日军和伪警察部队，致使他们顾此失彼感到不安，特别在四四年以后接近胜利之际，游击活动更频繁起来，八战区32

师95团派一个连在袭击南昌据点时，尽管牺牲了一位连长，但大大地打击并震惊了日寇。

当时八战区还成立了游击大队、游击别动队，在三公旗、安北县一带，打击骚扰敌人，大队司令苟子成与支队长王国祥互相配合下，袭击过石纳干的伪军，伏击过日寇的汽车队，（击毁汽车一辆，活抓了一个日本人）。别动队的人马袭击过警察中队在陶来口设立的警察所、后口子的警察中队和谢俊圪卜石绵厂，在乌兰胡洞，拦截过由包头开往余太的七八辆汽车。

此外，南昌是大蒙公司与后套商人交易的所在，各式各样的人，来来往往十分复杂，表面看是商人穿戴，实际上都是暗带武器，有身份有职衔的人，这里派一个警察中队、由日本指导官高桥信雄指挥。其任务是维持管理这个场所，防止八战区渡海奇袭。

南昌的警察中队，住在三角土围内，以求安全，指导官高桥信雄在这里说一不二，任何人不敢违抗，而且他性格凶暴傲慢，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开口骂人举手打人，是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所有警察都挨过他的毒打责骂。这些警

察气愤之极，密谋已久，准备干掉这个坏蛋。

一九四三年春，在乌梁素海，大家认为时机已到，准备杀死高桥信雄，于是王六十二，高有宽等十几个人，把这个罪大恶极的高桥信雄击毙。正在准备过海投奔八战区之时，被日寇发觉，紧急命令追捕暴动人员，王六十二、高有宽二人逃脱，其余的人见事不妙，急忙装成追捕凶犯人员，把罪责全推到王、高二人身上。这下捅了弥天大祸，城里的日本司令官，立即派人清查这二人的来历，并命令立刻捉拿家属偿命。

王六十二家住台梁七份子，高有宽家住在台梁牛场沟，都是地方上抽派的警察。于是首席指导官冈部正好，大队长李玉昆带领警察三十多名，坐上汽车，飞驰台梁，把王六十二的母亲和他十二岁的弟弟抓到城内。（高有宽的家属没有抓上）日本司令官石桥，立即批示由地方上把这母子二人枪决。

这事应由警备股负责执行，警备股长郝先桥和文书刘班等人认为：司令官的命令谁敢违抗，但杀王母还则罢了，若再杀死十几岁的小弟弟，感到太残忍，于是由郝先桥向日本指导官小池猛



求情，希望饶这个孩子不死。小池猛也怕司令官追究责任，不敢违令也不表态。后来郝先桥提出个主意是先把王母杀死，把小孩押起再说，小池猛暗示同意。于是城里杀气腾腾，彰明昭著地把王六十二的母亲在西门外杀死。把王的小弟弟王占山关了起来。

事后大家怕出事，由郝先桥把镇长武正荣，维持会长陈虎找来，让他们写了个证明，由刘班盖了个警备股办良民证的印章，这个印章守城的人，甚至日本人都熟悉，有它就可以通行。就这样，把这个孩子王占山送出城外，到其亲戚家居住而得救。

## （六）敌人的可耻失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傅作义指挥所属部队攻打包头时，曾派32师94团（团长杨新钊）一营营长鲁乐山带一个营的兵力，在后口子阻击余太日军增援包头。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该营驻到后口子的第二天夜里，鲁乐山查哨时，发现余太日军司令小林一男的增援部队，于是立即展开战斗，在距后口子十五里处，昆独仑沙坝子附

近，把小林一男击毙（小林的翻译朝鲜人，日语名叫曾子亚谷腿部受伤）这个镇压屠杀了多少中国人民的罪魁祸首，终于死在中国人的枪弹之下。事后余太的日军开“慰灵祭”（即追悼的意思）由部队中两个士兵穿上袈裟，念经超渡。接着由石桥（日语依西哈希）继任司令官之职。

一九四〇年元月，日寇由山西、河北调兵遣将，分三路大军进犯河套，直至陕坝等地。二月份又退撤到永济渠以东。日寇水川中将，前往五原慰问，并带领一批指导官准备分配工作，长期统治后套，结果三月二十五日五原战役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水川中将被杀死在二驴弯一带。事后日寇出动直升飞机侦察，还由余太派兵过乌加河到二驴弯一带，找寻水川的尸体，结果杳无音信，水川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四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由余太抽了不少日本人，去参加作战，留守余太者无几，于是把伪军乔二成收容的四五百人马，编成西北挺进军当炮灰，他们大部是山西人，身穿黑衣服，派一个连到石纳干驻防。但这一切根本挽救不了日寇的最后灭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腾鼓舞，扬眉吐气，而日寇却灰眉留眼，咳声叹气，当余太城里的鬼子接到命令以后，立即关闭城门，以防非接受的部队，缴了他们的械。不久32师奉令东进在经过余太城时，杨镇田营长与城内日寇司令部留守人联系，宣布他们集中投降交械地点在包头，日寇狼狈不堪，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命令。然后32师浩浩荡荡向东开去。这时，伪警察中有三十多人偷偷跳出城墙，与32师联系要求投诚，遭到拒绝，让他们按规定地点受降，只把精通日语的苏长河带去当翻译。

在日寇按规定去包头集中交械的途中，遭到八战区杂牌军郭堂团在乌兰胡洞的截击，这时他们只求侥幸不死，不敢开枪还击，后经负责送鬼子去包头的杨镇田营长，向郭堂团联系说明上级的指示精神以后才停止了战斗。

32师杨镇田营长离开余太东进以后，大余太由绥西官员赵炽昌接管整顿，从此，余太城归到八战区的管辖范围。

（乌拉特前旗政协供稿）

# 日本特务“衣司格迭勒图”在 乌拉特后旗的活动

巴图乌力吉 忠 来撰写

达瓦桑布 整理

这里所说的“衣司格迭勒图”，并不是什么人的名字，而是人们送给身披行脚僧外衣，实为日本特务的仁沁喇嘛的外号。衣司格迭勒图蒙语意为毡服，即对毛呢制品的称呼。仁沁喇嘛由青藏高原来到查干高勒庙时，身穿毡服，故被该庙喇嘛送此“美”称。以后，衣司格迭勒图，就成了仁沁的代名词。

仁沁原系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人，自幼出家为僧，在本旗汗塔本庙上当喇嘛。他十六岁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攻占了热河省，因而，阿鲁科尔沁旗也随之沦陷，成为日本人的殖民地。

日寇在侵占东北蒙旗后，为了巩固和扩大在

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侵略，它的特务机关竟在蒙古青少年中大打主意。在狗强盗们的精心猎取下，收罗了一些蒙古族青少年，经过特务机构的培养与训练，使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鹰犬。这些民族败类，摇身一变，公然忘掉祖国，出卖灵魂，甘心在日本人的驱使下，为虎作伥，为渊驱鱼，残害同胞，杀戮人民，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仁沁便是其中的一个。

十六岁的小喇嘛仁沁，被日本特务机关选中后，立即离开了汗塔本庙门。经过十来年的军国主义教育和专门特务训练后，这个出生在蒙古草原上的小喇嘛，终于背叛了祖国，背叛了民族，变成一条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忠实走狗，死心踏地紧跟侵略者的步伐，向蒙古人民——特别是乌拉特三公旗的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与血腥的镇压。

## 一、仁沁两次去青藏高原，为日寇收集和刺探情报

日本帝国主义者野心勃勃，在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窥伺我国的西北边疆及青藏高原，企图亡

我祖国。此时，身为日本特务的民族败类仁钦喇嘛、竟不惜出卖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使下，曾两次潜往祖国的西北边疆青藏高原进行特务活动，为日寇收集和刺探了大量情报，充当了日寇侵华的急先锋。

### （1）、仁沁第一次去青藏活动

一九三七年，仁沁担负着日本特务机关交付给他的特殊使命，以去青海、西藏拜佛磕头为理由，以化缘喇嘛身份为掩护，带着一头小毛驴，驮着干肉、食品，以及日用工具和锅碗等物，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阿鲁科尔沁草原，跟在毛驴后边，一步一步向西行来。

由本旗出来，他一直向绥远省所属的各蒙旗流窜，凡是名胜的大寺庙和巴音富户居住的大村庄，他都一一走到。遇到重要的地区，他借口旅途困顿或毛驴疲乏，歇上几天或十来天，直到情况了解后，再继续前进。

路经乌拉特中旗境内时（本文所称的乌拉特中旗，现归乌拉特后旗管辖），他曾经过乌力吉河地区的玛拉吐尔苏木（苏木相当于区）、西拉套勒盖（现在的乌力吉公社）和西部的大寺庙巴

音桑达庙。他曾在巴音桑达庙里住了一段时间，认识了很多喇嘛，特别是与司库喇嘛，管事喇嘛关系都很好。

出了乌拉特中旗境后，经过阿拉善旗、兰州市和青海各地，到达了塔尔寺。不久，他又以磕头拜佛为借口，去拉卜楞住了一个时期，然后，又潜往青藏高原到处流窜，进行了特务活动。

一九三八年末，他在完成任务后，取道阿拉善旗西部地区的各大寺庙，于一九三九年春，回到了阿拉善旗与乌拉特中旗的两旗交界处，住在劳本钦布庙休息了几个月。及至进入夏天后，他又继续东行，最后到了乌拉特中旗的查干高勒庙（现在的杭盖戈壁公社）住了下来。他的“衣司格迭勒图”的外号，就是查干高勒庙喇嘛们送给他的。

衣司格迭勒图（即仁沁，以下同），在查干高勒庙上住了很久，并且经常给庙里喇嘛干活做营生，认识了很多喇嘛，交结了一些朋友，并且还认识了日寇设在杭盖努齐（现在杭盖戈壁公社境内）特务机关的一名蒙族特务。

杭盖努齐距查干高勒庙仅十华里，特务机关

里的特务们经常来庙里游玩。一天，一个叫达喜拉布坦（其原籍可能是东北哲里木或察哈尔的）的蒙族特务，在庙里与衣司格迭勒图交谈后，立即成为好友。他们来往一个阶段之后，达喜拉布坦即将衣司格迭勒图介绍给特务机关的日本人沙拿卡拉（日语发音）。从此，衣司格迭勒图就成为杭盖努齐特务机关的座上客，并进入特务机关，任重要职务，公开地暴露了他的特务身分，在乌拉特地区开始了他的罪恶活动。

## （2）、仁沁第二次去青藏活动

衣司格迭勒图进入杭盖努齐特务机关以后，为了侵略者的需要，一九三九年冬，他和日本特务头子沙拿卡拉，以去青海塔尔寺磕头拜佛为名，又第二次向青藏高原出发。

临走时，衣司格迭勒图身穿褐红色的喇嘛服装，日本特务头子沙拿卡拉，也改换成蒙古族牧民的打扮，头上装上假发辫，身上穿上黑蓝色蒙古长袍，装成牧区富户的模样，准备了蒙古包以及日用吃喝物品，带上了路费，领上了几个跟随人，牵上从牧区抢劫来的十几峰骆驼作为骑驼和运驼，从乌拉特地区出发。



他们经过了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阿拉善旗，宁夏省各县的城市、农村、牧区和寺庙，一路上边走边休息，以便了解各地的情况，最后，过了兰州市和西宁市，到了位于西宁市西南的湟中县鲁沙尔镇的塔尔寺。

到塔尔寺后，他们住在一个原籍是东蒙科尔沁旗的喇嘛家里。这个喇嘛在塔尔寺居住多年，熟人很多，家里的居住条件也很方便，他们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青海地区进行了各种特务活动。及至一九四〇年春末之际，他们完成了特务使命，于是，返回了乌拉特中旗的杭盖努齐特务机关。

关于衣司格迭勒图为日本特务头头作向导，潜往塔尔寺的消息，被驻在乌拉特中旗西部地区的傅作义部队得知后，曾在乌拉特和阿拉善两旗交界处，布置下军队，准备拦截捉拿这两个人。但这两个特务很狡猾，想方设法避开了军队的耳目，平安地去了塔尔寺，又太平地返回了乌拉特。

他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逃过关卡，来去自如，主要原因在于：衣司格迭勒图第一次西行

时，交结了很多朋友，认识了不少熟人，因此，在紧急关头，处处有人作掩护，时时有人充向导；再加上他本人留心地区情况，注意人事关系，同时，凭借他多年搞特务活动的经验，所以能够化险为夷，无往不利。

如：衣司格迭勒图第一次西行时，途经乌拉特中旗的巴音桑达庙、阿拉善旗的图克木庙，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的喇嘛与仆人。所以在第二次西行时借助他们的地方不少。这些人能在关键的时刻，给通风报信，带路逃避，使两个特务能够在祖国土地上来来去去，如入无人之境。其中巴音桑达庙的小喇嘛温都尔老来，图克木庙上的小喇嘛尼玛桑布等人，都为衣司格迭勒图的特务活动，出了大力，帮了大忙。

## **二、衣司格迭勒图抢掠、屠杀广大人民群众的罪行**

衣司格迭勒图从走进杭盖努齐特务机关后，不久，他便脱去了“衣司格迭勒图”的服装，换穿上漂亮的绸缎衣服，顿改磕头拜佛时的慈善面

孔，用一副狰狞凶狠的面目，在乌拉特草原上，干着奸淫抢掠，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

(1)、衣司格迭勒图在第一次西行时，曾到过乌拉特中旗玛拉吐尔苏木的富户古力格喇嘛家里，和西拉套勒盖包头商人套高的家里住宿。尽管古力格喇嘛不在家，其家人东日布和商人套高对来自东北去往西方的虔诚拜佛的喇嘛，都怀着崇敬的心情，给予了盛情接待。

受到热情款待的衣司格迭勒图，对主人家的深情厚谊，不仅不加感激，反而得寸进尺地分别向东日布、套高二人提出来不合理的要求：他向东日布提出以驴易驼的要求。理由是毛驴是不耐远行，请给掉换一峰骆驼；他向套高提出施舍布料的要求。理由是他要做一身衣服。

衣司格迭勒图的无理要求，东日布和套高都婉言予以谢绝。东日布说：“家主不在，不敢作主”。套高说：“本小利簿，不能施舍”。其实他们说的话，都是合乎情理的。但衣司格迭勒图因要求未遂，认为是奇耻大辱。竟恼羞成怒，狠狠地说：“好吧，以后见吧！”说罢，不辞而别。

及至衣司格迭勒图进入杭盖努齐特务机关

后，仍把此事耿耿于怀。他不断地打听富户古力格喇嘛和包头商人套高的去向和住处，并假惺惺地向人表示：“从前我去塔尔寺磕头时，在他们家里受到过恩惠和帮助，我要报答他们。”

等到他打听清楚后，马上骑骆驼找到富户古力格喇嘛的家中。当时，他找来东日布问道：“你认识我吗？我就是那个用毛驴换骆驼的化缘喇嘛”。东日布答复说：“此事我知道”。衣司格迭勒图说：“你既然知道，那好。我现在不是求你施舍的僧人，而是为大日本皇军效劳的军官。如今，我命令你交出好骆驼两峰，并且都要备上驼鞍；还要拿出两身绸缎衣服，两条丝绸腰带和两双马靴，供我应用。

当时，东日布感到事情不妙，不敢违抗，遵命办理。随后，又受到衣司格迭勒图的一番教训。他说：“以前你不认识我，怠慢了我，现在能按着我的话做，这很好。希望以后要好好地为大日本皇军效劳。”说罢，他穿戴上东日布给他准备的衣物，打扮成牧民的样子，骑上东日布的骆驼返回了杭盖努齐特务机关。

回去后，他向特务头头沙拿卡拉报告：“富

户古力格喇嘛和商人套高同地方上的土匪（指傅作义部队）有联系，必须除掉。”沙拿卡拉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亲率伪军二十来人，直奔乌拉特中旗的巴拉贡（现在乌力吉公社的巴音努如队）而来。

那时，古力格喇嘛的家人都外出了，只有古力格喇嘛一人在家。沙拿卡拉一伙到后，抓住古力格喇嘛，用非刑打他，恶语骂他，并命令伪军，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搜查了房屋院落。凡是值钱的金银器皿、银元、首饰、头戴及贵重衣物，均被一抢而光。临走的时候，又牵走了古力格喇嘛的骆驼十几峰。

这伙强盗由古力格喇嘛家出来后，又向西拉套勒盖的方向出发。及至到达商人套高家时，他们立即开始大掠。计抢掠的东西和物资，是用二十多峰运输驼驮运回来的。与此同时，他们还把掌柜的套高带到中途予以枪杀。

这次行动，衣司格迭勒图感到十分满意，既报了夙怨，又为特务机关搞特务活动，积聚了经费。

（2）一九三九年冬季，衣司格迭勒图亲自

带领杭盖努齐特务机关的护兵那顺吉日嘎拉、敖门吉日嘎拉等人，扬言去检查监督地方军队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运粮问题，来到了戈壁庙（此庙现在乌盖公社呼和温都尔队）。

他们来到戈壁庙后，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给这个庙上当差的汉族佣人常胜、华江二人抓起来，硬说他二人是土匪（指国民党部队）的奸细。并把他们给庙上运回来的粮食和物品，全部予以抢劫，运回杭盖努齐特务机关供特务们享受。然后，把常胜、华江二人带至中途予以枪杀。

（3）一九四〇年，衣司格迭勒图同日本特务头子沙拿卡拉，从青海塔尔寺返回乌拉特中旗后，由于此行“胜利”而归，衣司格迭勒图的功劳很大，因此，杭盖努齐特务机关任命他为乌拉特中旗日本特务机关的警察头子，并在杭盖努齐的特务机关里，专门设立了一个科，作为衣司格迭勒图的办事机构。从此，他的权限大了，横行霸道，糟蹋人民的行为，也就更加厉害了。

他选择了斯日崩朝格雅（现潮克温都尔公社汉乌拉队）为他的居住地，强迫查干高勒庙上给他搭起了设备齐全的几座蒙古包。又把抢劫来的

古力格喇嘛、套高商人，常胜、华江等人的物品和牲畜，拿来一部分，作为他个人的财产，供他享受使用。

日本特务机关，为了保护衣司格迭勒图的安全，又从特务机关中选拔出比较能干的护兵桑巴、桑布达格登、敖门吉日嘎拉等人，作为衣司格迭勒图的卫队，日常跟随在他的身边。另外，还从乌拉特中旗专门给他派来炊事员和通讯员，供他役使。此时，建立在斯日崩朝格雅的衣服司格迭勒图住所，其气派几乎和乌拉特中旗公爷衙门等同起来，好不威风！

(4) 一九四〇年十月间，衣司格迭勒图在住所里听到报告说：“有四个青海人和另外的四名汉人，拉着三十多头骆驼，从西往东运送物资”。这个消息，使衣司格迭勒图起了歹念，他马上从杭盖努齐特务机关里，派出了阿斯尔瓦呢等人，拦路抢劫，并把八名货主和驼工统统带回杭盖努齐特务机关里，全部予以枪杀。

(5) 一九四〇年冬天，衣司格迭勒图带上从杭盖努齐特务机关抽调来的伪军嘎拉图等人，来到了居住在牛顿(现在的宝音图公社)的策仁的

家里。当时，他以策仁私通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罪名，没收了策仁的全部财产和牲畜。临走时，还把策仁和策仁的妹妹敖门朱拉以及住在策仁家里的外籍人巴拉吉尔三人，抓到杭盖努齐的特务机关里。

这三个人被关押了将近一个月。结果衣司格迭勒图硬把巴拉吉尔说成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派遣来的奸细，拿到呼和嘎查当众杀掉。然后，释放了策仁和他的妹妹敖门朱拉。策仁他们虽然获得了释放，但被没收的财产没有发还，只给了一点眼前能够生活的东西，就被赶出了特务机关的门外。

（6）乌拉特中旗梅尔苏木的依尔塔并（公爷的随从兵）与其妻子其其格居住在巴伦道鲁干胡都格（现在的乌力吉公社乌兰图克队）。一九四一年春初之际，衣司格迭勒图领着几个带枪的人，突然闯入依尔塔并的家里，硬把其其格的女儿齐伯旺巴拉同她的小孩，一并抢到他居住的斯日崩朝格雅，并专门为他们母子安排好一顶蒙古包，使之居住。对外，声称齐伯旺巴拉是他的妻子，日夜任他奸淫玩弄，谁也不敢奈何。



齐伯旺巴拉姑娘原是乌拉特草原上远近闻名的美人儿，几年前，她与古力格喇嘛的外甥尼玛贡楚格订婚。当时，虽未正式结婚，但俩人已在一块同居，并生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在衣司格迭勒图抢走齐伯旺巴拉的那天，恰好尼玛贡楚格不在家。如果在家的话，恐怕尼玛贡楚格一定性命难保。

齐伯旺巴拉姑娘被衣司格迭勒图抢来后，每天同自己的小儿子被幽禁在蒙古包之中，过着苦闷、烦恼的日子，只有以泪洗面。这样整整过了两个月。一日，衣司格迭勒图外出，齐伯旺巴拉姑娘决心趁机逃跑，于是，她走出衣司格迭勒图的家门，背上小孩，骑上骆驼，由斯日崩朝格雅逃了出来。

时值隆冬，天气寒冷，齐伯旺巴拉不顾迎面刺骨的寒风，和脊背上小孩的哭闹，一天一夜，狂奔了一百多里路，终于在第二天清早逃到了自己的家门。归后，立即收拾东西和归拢牲畜，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向西部地区一绥远省傅作义部队占领区一拼命逃跑了。

当衣司格迭勒图得知齐伯旺巴拉姑娘逃走的

消息后，他暴跳如雷，大发脾气，立即率领护兵从后边拼命追赶。及至追到达兰策日勒格（现在乌力吉公社境内）时才追上。但齐伯旺巴拉不在，只有其母其其格住在那里。

衣司格迭勒图为了泄愤，除将其其格加以毒打外，还把她的蒙古包两顶，骆驼一百多峰，羊三百多只，以及其它财产，全部予以洗劫。由于齐伯旺巴拉已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很深，他们没敢再追，只好恨恨而归。

在齐伯旺巴拉向西逃跑的途中，遇见了熟人希日布，齐伯旺巴拉请他给在巴嘎毛都庙的未婚夫尼玛贡楚格带去了口信，告诉自己已经外逃，并让尼玛贡楚格速来会面。尼玛贡楚格在听信以后，立即赶来与齐伯旺巴拉一同逃走。

留在家乡的其其格，因牲畜遭劫，财产损失，家贫如洗，一无所有，她和七十岁的老人，十多岁的女儿，饥寒交迫地流浪在乌拉特大草原中。为了生存下去，这老弱三口，边走边要饭，半饥半饱的到了布和太（现在的巴音戈壁公社前德门队）她叔叔敖特根拉喜的家里。这时，齐伯旺巴拉与她的未婚夫也早已来到。敖特根拉喜从

自己的财产中，分出一部分日用品、牲畜，给其其格一家及其女婿尼玛贡楚格重新建立了家庭。一直到日本人投降后，她们才迁回原籍。

(7) 对于衣司格迭勒图霸占齐伯旺巴拉为妻，抢劫其其格财产一事，给乌拉特中旗人民的震动很大。人人对此都感不安，认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生产、生活甚至人身生命，都没有保障，必须远走高飞，才能安居乐业。

为此，居住在乌拉特中旗哈那庙以西或以北的古恩、胡勒格尔和巴嘎毛都以南的大多数富户和小康人家，都先后搬到查干德日素和西部巴音桑达庙附近的齐鲁格高勒、乌宝力格，莫林河等地区，用以躲避衣司格迭勒图匪徒们的扰害。

这个消息被衣司格迭勒图听到后，他连忙跑到特务机关报告说：“那些巴音富户思想不良，反对大日本皇军，都投奔国民党去了。如不给予惩罚，以后将不好办”。当时，特务机关派宝音贺喜格带领四十余名伪军，突然袭击了齐鲁格高勒地区。

在袭击中，特务们把富户巴吐敖其尔一家抢劫一空，然后，又到呼和敖包以北的朱扎嘎尔商

人家里抢了很多的東西，并把掌柜的蒙古族呼、汉族一人，抓起来当场杀掉。

### 三、利用喀尔喀部分青年充当特务、杀害人民群众

喀尔喀原系外蒙喀尔喀部蒙古人，三十年代，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时期，一部分喀尔喀富户和反对蒙古革命的人，由蒙古人民共和国逃跑出来，进入了乌拉特大草原。

这部分人，在管辖扎木苏荣道尔吉，梅林（官名）元登、宰桑（即汉语宰相之音转，实为管事人员）宝尼雅的率领下，来到了乌拉特中旗。一九四二年，他们向乌拉特中旗公爷呈送了稟帖，请求准予居住。稟帖中说：“我们从喀尔喀逃出来，原想在你旗暂住一时，不久便可回家。不料事与愿违，长时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回家的希望。为此，请求归属你旗，愿为你们管理的属民（纳贡者）”。

乌拉特中旗公爷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指定玛拉吐尔苏木为他们的居住区。其游牧范围为

阿布日拉图以北，宝音吐河、楚力格尔胡都格、红古尔套勒盖、嘎西贡（现在的前达门公社、宝音吐公社、明星牧场）等地。并从喀尔喀人当中专门委任了一名章京（官名）拉宝，由他负责管理这部分人的事务。

日寇侵入后，杭盖努齐特务机关和衣司格迭勒图，网罗了喀尔喀人中的部分青年，如乌日吐乌兰、哈拉迭布勒图、道尔吉、官其格、敖德扎布、桑吉梅吐等人，到呼鲁斯太的日本特务机关里充当特务，使之迫害与屠杀乌拉特、喀尔喀人民。他们的主要罪行是：

（1）一九四一年春，杭盖努齐的特务机关人员，会同衣司格迭勒图、敖德扎布等人，带上特务机关护兵头子宝音贺喜格及伪军，以检查边境为借口，到了巴嘎毛都庙住了三、四天，然后把居住在巴音努如以北的温都尔道布登、贡嘎高优、巴雅尔等三位老牧民，说成是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秘密联系，立即予以逮捕，以后带到呼鲁斯太特务机关内全部杀掉。

接着，喀尔喀青年特务道尔吉，又把金巴、孟克兄弟二人和呼日乐的女人，先后抓到呼鲁斯

太特务机关里，非刑吊打，百般折磨，关押了几个月后，才被释放。孟克被释放后，在特务们的教唆下，又被巴音桑达庙上的两个小喇嘛杀死。

(2) 一九四二年农历腊月末，乌拉特中旗西部地区部队的军官，梅林(官名)达尔扎回家过春节。因达尔扎素具爱国思想，不满日伪统治，从而，触怒了日本特务，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杭盖努齐特务机关和衣司格迭勒图的精心策划下，派遣出喀尔喀青年特务敖德扎布、桑吉梅图等人，埋伏到扎嘎力庙西坡一个叫宝日敖包的地方，等候达尔扎的到来。

腊月二十九日清晨，达尔扎梅林路过此地，当即被喀尔喀青年特务逮捕。他们在绑架达尔扎梅林后，马上带回呼鲁斯太特务机关里，将他秘密处死。

(3) 一九四三年春末，居住在乌拉特中旗玛拉吐尔苏木的喀尔喀牧民，不断地遭受到日寇及其帮凶者的压迫、剥削、打骂、凌辱和刁难，实在无法生活。经首领管辖扎木苏荣、道尔吉、梅林元登，宰桑宝尼雅商议决定，为躲避日寇的迫害、压榨，他们决定全部迁往国民党统治区的

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等地居住。

在这部分人逃走四、五天以后，衣司格迭勒图才听到消息。当时，他从哈那庙里，带上道尔吉等喀尔喀青年特务和一部分伪兵，亲自向西追赶逃走的喀尔喀人。及至追到楚伦呼日业时，最后的一批逃走者被他们追上了。这些可怜的喀尔喀牧民的牲畜、财产，立即遭到特务的抢劫，直至一无所有。

特务们在抢劫了这部分人的财物后，又在衣司格迭勒图的指挥下，继续向西前进。在一个名叫买卖公的地方，他们追上了首批外逃的喀尔喀牧民。当时，他们除将管辖扎木苏荣道尔吉、宰桑宝尼雅及宝尼雅之子巴宝等三人当场杀掉外，又抢劫了这部分人的全部财产，然后，才返回特务机关。

那些被抢劫一空的喀尔喀牧民们扶老携幼，忍饥挨饿，继续西行。最后，分散居住在阿拉善旗北部的东、西沙尔扎、西部的巴丹吉林、阿拉坦特布西等沙漠、山区一带。至于他们在西行途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受到了什么样的损失？那就无从查考了。

#### 四、日本特务衣司格迭勒图的下场

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的夜晚，衣司格迭勒图正在斯日崩朝格雅强迫牧民给他擀毡子的时候，突然被绥远省傅作义的部队包围住。这只狡猾的狐狸看到事情不好，他连衣服也没有穿，伺机溜了出来。在逃跑中，他的手被打伤了，但侥幸保住了狗命，连夜狂奔到查干朝鲁吐（现在的明星牧场），在朝鲁台吉（台吉为贵族的尊称）家住了一个阶段。

等到傅作义部队撤退后，衣司格迭勒图觉得原住地斯日崩朝格雅再不是他的安乐窝了，如继续居住下去，将会招致杀身大祸。于是，他决定从乌拉特中旗北部，搬到比较保险的达茂旗百灵庙附近的巴音哈拉山一带居住。

随同他一块搬走的，有他的老婆达喜（喀尔喀人），男青年丹巴永日布（喀尔喀人），还有两名老仆人（鄂尔多斯人）。一行共计五口，携带着遭受损失后，留下来的蒙古包、骑马、骑驼和运输骆驼，以及一群小畜，走向了新住地。



有几户过去在哈那特务机关当过特务的喀尔喀人，和几户喀尔喀牧民，愿意跟着衣司格迭勒图走。如官其格的儿子和常达（外号叫达玛尔吐小喇嘛）等人，就是跟着他出来的。

豺狼成性的衣司格迭勒图，他虽然搬到了达茂旗，但威风不倒，神气十足，依然干着迫害和奴役人民的勾当。

如：一九四四年秋季，日本人主办的乌兰察布盟百灵庙兴蒙运动中学放了假，有乌拉特中旗的两名学生塞音吉雅、洛布生道尔吉，因家境贫寒，无钱回家；但住在校中又无吃无喝，生活困难。为此，曾请求正在那里的中旗协理巴图毕力格帮助。

当时，巴图毕力格因事忙，把这件事委托衣司格迭勒图负责妥为办理。不想在巴图毕力格走后，衣司格迭勒图竟把这两名学生领回家中，给他当了奴仆。每天不仅给衣司格迭勒图家无偿劳动，而且还让他们去那些喀尔喀人家中干重体力活，不使他们有空闲时间。

进入一九四五年后，衣司格迭勒图预感到日本鬼子快要完蛋，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为了保

存狗命，他又开始搬家。三月间，他们全家带上二名学生以及几户喀尔喀人家，越过了四子王旗西部，顺图克木庙以东进入西苏尼特旗西部的乌日吐赫庙附近，在那里寻找一块地方居住下来。在这里居住期间，衣司格迭勒图还经常与乌日吐赫庙和图克木庙上的喇嘛互相来往，友谊甚厚。

这年秋天，四子王旗图克木庙上的呼毕勒罕（活佛）喇嘛，来到了西苏尼特旗的乌日吐赫庙。衣司格迭勒图请呼毕勒罕喇嘛到他家中念古里穆经，祭祀佛祖，祈求消灾免祸，保佑吉祥如意。

这时，衣司格迭勒图因事去了毛都庙。他走后不久，突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骑兵部队来到了他家。当他们听说衣司格迭勒图去了毛都庙时，马上让学生洛布生道尔吉引路直奔毛都庙而去。

原来，此时苏联和蒙古早已对日宣战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时，已进入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境内，这部分骑兵部队是奉命专门来捉拿日本特务衣司格迭勒图的。

蒙古骑兵部队来到毛都庙后，首先布置部队

包围了庙宇，然后，打发洛布生道尔吉进庙去察看衣司格迭勒图的动静。当洛布生道尔吉进庙时，衣司格迭勒图正在和一个胖喇嘛坐着谈话，见洛布生道尔吉走进房中，便厉声地问：“你干什么来了”！并把他斥骂了一顿。当时，洛布生道尔吉什么也没说，立即走到庙外，将情况报告给蒙古骑兵部队说：“衣司格迭勒图正在庙里”。

蒙古骑兵部队在了解情况后，马上派人进入庙里，在胖喇嘛的房中，将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衣司格迭勒图擒获。然后，把他倒剪两手，使之骑在无鞍的马背上，带回了他的家中。及至进入衣司格迭勒图的家门后，蒙古骑兵部队负责人，正式宣布逮捕了外号衣司格迭勒图的日本特务仁沁。

蒙古骑兵部队在逮捕衣司格迭勒图后，对其他人的人身、财产一点没动，任何人都没有受到惊扰和损失。只有与衣司格迭勒图同居的那个喀尔喀人，即男青年丹巴永日布，他似乎与蒙古骑兵部队相识，在他们一阵热烈握手之后，丹巴永日布就随同蒙古部队一块走了。

在蒙古骑兵部队逮捕衣司格迭勒图的时候，四子王旗图克木庙呼毕勒罕喇嘛还住他家里。部队负责人向呼毕勒罕喇嘛说：“我们的大部队，已经住到图克木庙上，请您速回自己的拉卜楞（住处），越快越好”。呼毕勒罕喇嘛说：“我马上回去，但我用轿行，恐怕没有你们骑兵快”。部队负责人回答说：“请快上轿，我们在庙里等你”。说完，集合部队，押着骑在无鞍背上的衣司格迭勒图，向图克木庙方向急驰而去。

呼毕勒罕喇嘛带上徒弟和学生塞音吉雅等缓缓而行，及至回庙时，看见寺庙周围全是蒙古的骑兵部队。部队中的军官，看见呼毕勒罕喇嘛来了，大家上前把他迎接到拉卜楞去，轮流和他谈话，一直谈到深夜。

在蒙古骑兵部队刚到图克木庙时，当时，庙里还住着三名日本特务。部队进来后，首先抓住了两个坏蛋，一名漏网逃跑，一直追到牧民家中才将这个特务抓住，与衣司格迭勒图关押在一起。

次日清晨，蒙古骑兵部队由图克木庙出发，

向四子王旗方面前进，那些被逮捕的日本特务和衣司格迭勒图，统统被蒙古骑兵部队带走。对此，乌拉特中旗各族人民，无不额手称庆，拍手称快，赞扬蒙古部队为乌拉特大草原上的人民除了一大害。

（乌拉特后旗政协供稿）

# 陕坝中美合作所概况

张启高整理

中美合作所的全称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亦称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也有人直呼其为：中美训练班的，其简称是：中美所。

中美合作所是美、蒋在抗日战争后期，合作进行特务工作的产物。

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政府迁到重庆。军统电讯处在研译日本空军电讯密码方面，掌握了一些规律。对于日本空军每次袭击重庆之前，军统便把日机出动情况和可能轰炸的目标，预先通知重庆防空司令部。每次预测有相当的准确性，这就引起了英国驻重庆特务们的重视。英国方面便想把军统的这一套东西剽窃过去，而军统也想与英国合作，企图偷学到它所没有的一些东西，于是一九四一年便在重庆建立了中英合作所。但是由于双方都没有真正合作的愿望，这种貌合神

离的合作很快告吹了。于是军统头子戴笠，便寻求与美国合作的途径。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军统电讯处侦译到日本空军有在太平洋方面进行轰炸的准备情况，戴笠为了逞能于美国，便把这一侦译结果和盘告知了美国一些有关部门，请他们注意。当时，美国的一些将军们得知此事，捧腹大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当时的美日关系还比较和谐。结果不出所料，日本空军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在美国全无防范的情况下，空袭珍珠港成功。

珍珠港被袭事件发生后，美国派海军中校梅乐斯和戴笠商谈合作事宜，戴在蒋介石许诺后，决定和美国成立中美合作所。

一九四二年夏天，梅乐斯率领美国特务110余人，赴重庆进行合作的筹备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间，中美合作所成立，合同在重庆磁器口正式签订。合同指出：“主要任务是交换研究日本海陆、空军在中国的活动和部署情况”，“交换双方认为有必要的其它方面的情况”。

合同签订后，美国特务人员源源而来。合作所除主任、付主任外，中美双方各设参谋长、主

任秘书，还各设一个总办公室，下设秘书、联络、文书、译电等小组。业务性单位有：军事作战组、情报组、心理作战组，气象组、行动组、交通运输组、医务组，另外还有经理、会计、总务和汽车总队等。

合同生效后，于一九四三年首先在安徽歙县开办了第一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接着在湖南的南岳，陕西的西安，绥远的陕坝，贵州的息峰，江西的修水，浙江的瑞安、港口，安徽的临泉，福建的建瓯、漳州等地，连续开办了十多个这种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调训了四、五万人组成忠救军、别动军、行动总队，爆破总队、破坏总队等。训练主要项目是，武器使用、情报、爆破、游击、侦察等。训练完毕，按人发给卡宾枪、汤姆生枪、U、D机枪和各式手枪。

一九四四年秋，补充签订了第二次合同，一九四五年签订了第三次合同。第三次合同规定：

“由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中美所应即宣告结束，美方人员陆续回国”。梅乐斯指出：“由于中美特工人员的密切合作，取得抗战胜利的许多有利条件，造成不可磨灭的巨大成绩。这一成



功的合作虽然暂时结束，恐怕不远的将来，美国还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中国”战胜另一个更为厉害的敌人”。戴笠对梅乐斯的这一提议，感到极大的兴趣，并连连称谢。

抗日战争结束，美特撤离期间，戴笠要求美国方面以中美所的名义在上海和北平两地，建立中美特种警察训练班。正在筹建过程中，戴笠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乘飞机在南京失事而死去。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后，中美特种警察训练班停建。

中美合作所于一九四三年四月间成立，到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撤消，其间共存在两年多的时间。

陕坝的中美合作所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一九四三年八月，戴笠命令当时的第八战区挺进纵队指挥官高荣，去重庆接收组建陕坝（第四）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事宜。高荣与戴笠在重庆进行了多次商谈后，决定由戴笠（中将）任主任，高荣（少将）任付主任（后易职为乔家才）。高荣于同年冬季返回陕坝，同来的有林云、叶景林、黄云凯、陈沉刚、刘毅祥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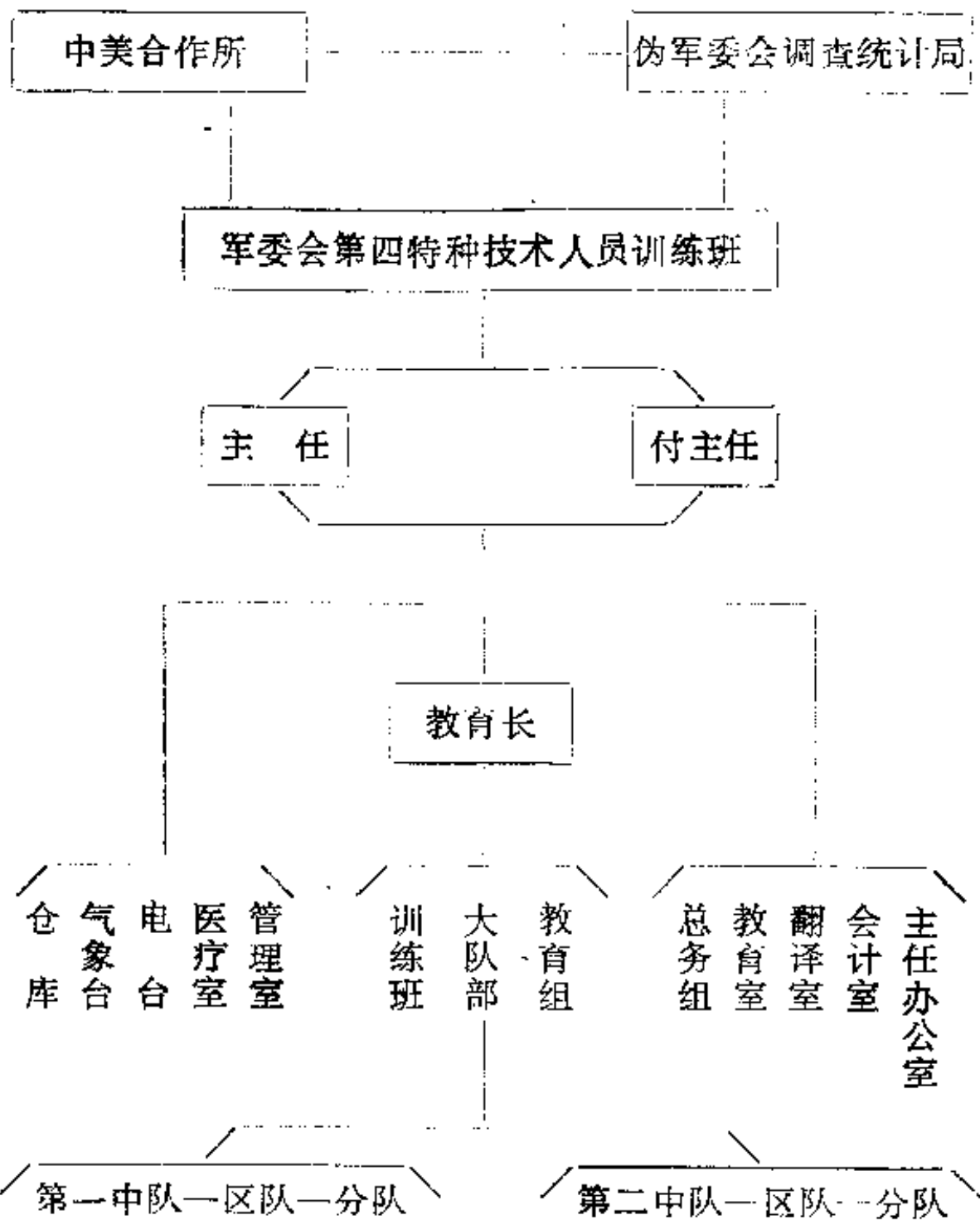
到达兰州时，又调了学生贺鸿儒、曹一鸣、侯士彪、王得章、高炳文、马侠、李得存等人，还有重庆班毕业的梁承业、林某等。

这些人在重庆出发，满载武器弹药、器材等约十来辆卡车的物资，沿兰州、宁夏至吴忠堡一线向陕坝进发，到达吴忠堡时，正值黄河流凌，不能通过，直到黄河封冻坚实后，高荣等一行才抵达陕坝。

一九四四年一月，在陕坝大顺城（现光荣公社团结大队四队）天主堂处，组建了陕坝的中美合作所。当时的大顺城，除天主堂、中美合作所外，还有两处小学，一处是男校；一处是女校。

陕坝（第四）中美合作所组织系统如下：

陕坝中美所教育长先后由饶铁珊、刘仁奎、黄康永担任。下设十三个班、组、台、部、室、库等，其他工作人员，以戴笠历年在重庆，贵州等地一手训练出的特务及美帝海军间谍为骨干组成。教育组长由林云任，教育队长由毕雪亚（美国人）任，政训组长由赵思武、赵宪卿任；气象台长由艾司摩尔（美国人）任；总务组长先后由王世耀、胡麦影、苗仲侍、赵忠武任；会计先后



由裴中原、贾荫武、刘辑武任；电台台长、仓库主任由美国人任。翻译共三人，符春云为中校翻译，聂琮为少校翻译；潘然为上尉翻译。译电员由陈煜哲、秦志廉任；中队长先后由叶景林、贺洪化、王得章、王志民等任。白云亭任少尉武术教官。

陕坝中美所成立以后，共训练学员五期，九百余人。第一期训练学员六十人，大部为绥西地区的青年学生；第二、三期共训练学员二百七十人，由绥远省抗敌民众自卫队选拔；第四期训练学员二百八十人，由第八战区付司令长官部选送；第五期训练学员三百人，由伪“缉私署”指挥的“宁夏税警团”选送。每期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左右。

陕坝中美所第一期毕业学员大部留用。其中有当教育分队长的。有当美特助教或气象观察助手的等。第二期学员统编为平绥铁路破坏纵队。归军统局直接指挥。一九四四年冬，戴笠和梅乐斯来陕坝视察。经和傅作义协商，平绥铁路破坏纵队改编为别动军绥远第一支队，开赴大青山。由鄂友三（傅的第五纵队司令）任支队长，另派

美特指挥官三人参加部队指挥。这支队伍的军费、人事由军统局负责；服装、粮食由傅部供给；枪械弹药的补充由中美所负责。第三期以后的学员大部编入别动军绥远第一支队，一九四六年春季，在包头编为交通警察第十六纵队第三大队，后改编为交通警察第十三纵队。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陕坝中美所的美蒋特务，大部调回重庆和西安；有一部分调北平组建特别警察训练班；还有一部分留五原办事处。

陕坝中美所训练内容是：灌输反动教育，实施情报战术，爆破武器使用和装卸、射击、擒拿、野外战斗等。主要教育目标是：培养和提高学员的特务工作技能，以便实现军统下达的任务。

训练科目、内容、时间安排、由美国特工人员提出后，军统特务再拟制精神训练内容，制订训练方式和时间进度表等，然后下达执行。

精神训练有：时事分析，党义常识，总理遗教，总裁言行，政治常识，精神讲话等。

特别课训练有：内情业务、情报学、行动术

等。

教官配备分两部分，政训课由军统特务担任，业务技术课（包括医务）由美特担任。双方教职特务共约十余人。

训练采用军事强制方式进行。学员成绩考核或淘汰，均操在美特手中，军统特务无权干预。每个学生发给何种武器，概由美特分配，军统特务均不得参加意见。军统教职人员。在业务训练时，均与学员一样受美特管训。

陕坝中美所除有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外，还有一台大发电机。日本投降后，这台电机迁五原办事处用。五原办事处改为绥远调查室后，这部电机调来陕坝。傅作义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后，绥远调查室撤销，人员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绥远站。此时，这部电机也就一同调往绥远。

陕坝中美所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撤销，共存在一年另十个月的时间。

（杭后政协供稿）

# 陕坝中美合作所美蒋 特务罪行记略

王兴亚

陕坝中美合作所从一九四四年元月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撤销，其间不到两年的时间，然而美蒋特务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他们横冲直撞，野蛮行车，酗酒闹事，欧打人民，流氓成性，奸淫妇女，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一九四五年七月间，美特吉普车由大顺城到陕坝，路过一村，有四五个小孩在路上玩耍。他们鸣了一声喇叭，不顾孩子躲开没有，就从小孩们当中开过，当即把一小儿腿压断，疾驰跳跑。小儿送往医院，两腿被锯掉。其母曾多次到长官部告状要求查办肇事者，然而长官部却敷衍塞责，使凶手逍遥法外。

又有一次美特汽车开到天主教堂前广和益药房门前，见路东侧走着一个年轻妇女，穿着花旗

袍。这个开车的家伙，把车放得很慢，故意不停地鸣喇叭，妇女向东躲，车就往东开，妇女向西躲，车就向西开，终将这个妇女撞倒，掉在道旁一滩泥水中。妇女面红耳赤，开口大骂；美特相视大笑而逃。这些美特在陕坝住了两年之久，驱车肇事，受轻伤的就有百余人，受重伤的也有二十多人，还有受重伤送医院而死亡的。

美特到处酗酒闹事，残害人民。一九四五年六月，美特三人在信德饭店饮酒，其中二人中途驾车去西沙梁。留下这个人，边饮边骂，把饭桌踢翻。店伙上前劝阻，却被这人用茶杯打在眼下，约有二寸长的破口，当即血流如注，这还不算，又用脚踢其伤口，致使该店伙昏迷过去。又有一次两美特酒后互骂，继而动武，由饭店打到街上，当时有一妇女走过，他们两个跑到妇女跟前，动手动脚，并挟持搂抱。观众义愤填膺，群起而攻打，两醉鬼抱头鼠窜。

美蒋特务道德败坏骄奢淫逸更是臭名远扬。中美训练班有一美教官诱迫长官部某某之妻通奸，某某气愤不过，于一九四四年除夕之夜将其妻抢杀。事后想干掉这个美特未遂。还有一个人



称“羊毛驴”的大夫更是肆无忌惮。他凭借医术到处招摇撞骗，行奸作恶。凡让他看病的妇女，不分老少，他都要想方设法进行侮辱。地主李仁甫得重病求医，“羊毛驴”大夫明目张胆地提出要一女人玩。李家为了治病，把另一地主的姑母诱去送给美医官被侮。这些美特调戏妇女，拦路强奸更是屡见不鲜，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国民党特务也是一丘之貉。陕坝中美训练班付主任，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骨干分子高荣流氓成性。他以恫吓、威胁、利诱等手段将第一期学员刘××之妻奸污，无所顾忌，路人皆知。刘某闻后，再三窥测，事实确凿。在一星期日，私带手枪，跑回家中二话没说，将其妻枪杀，事后他想自杀，受伤未遂。

（五原县政协供稿）

# 中美合作所霸占大顺 城天主教堂

樊永业口述 朱永丰整理

一九四四年元月，美军官兵已来到陕坝大顺城，陕坝中美合作所人员的住房尚未备妥，只盖下几间茅屋。由于冬季施工，屋里烧火，屋顶流水，美军官兵舒适成性，难以居住，叫苦连天，纷纷向重庆美国大使馆发函反映，迫使中美合作所的领导解决住宿问题。

中美合作所付主任高荣一向荒淫无度，对于工作漫不经心，及至问题迫在眉睫，即强行霸占教堂房舍，让中美合作所人员居住。

六月二十日，高荣领着美军队长毕雪亚，教育长饶铁珊来到了大顺城天主教堂佯称参观，当时我任本堂神甫，便领着他们在教堂内男、女校尽情观看。次日，突然数辆大卡车满载物资开进教堂，毕雪亚、饶铁珊同车而来，只不见高

荣。随后，他们将物资卸入教堂，强行占用。看到这种情景，我义愤难容，当着饶、毕等人的面破口大骂高荣是，“土匪的后裔”，“官土匪”，“欺男霸女”，“强占民房”。饶、毕见事不妙，便同我交涉，我怒气未消，不屑一顾。后来翻译给我说，大意是：我们谋求早日打败日本，使中国国土安宁，所以才来中国，帮助你们训练队伍。房子问题，高荣对我们说，他已和你们讲妥，让我们今天来住。我这才明白，高荣是要的两面派手法，利用美国人，强占教堂。我坚决不答应。从早上一直吵到中午，问题仍未解决。我只好乘车到陕坝，同高荣谈判。我只答应给他们借用一间房屋，再多不行。如还想多占，要向三盛公天主教堂请示。高置之不理。

我从高荣处出来，就去见区长神甫周其智，同他商谈美兵霸占教堂一事。决定先找张厉生。（张当时任晋察绥边区总司令，系上将）我在张面前表示要向国民党中央告高荣。张对我说：高荣是戴笠的门徒，驻陕坝的特务人员，你是不会告倒他的。我闻言观色，觉得张拿他也无可奈何。我大失所望，便寒喧片刻悻悻而归。

我回到大顺城，美兵早已占了男校以及我的厨房，逼得我无处做饭。次日又强迫我腾出凉房，把粮食搬入女校。对这种强权霸道的行为，我实难忍受，当时适逢春节，孙仲贤神甫来我处作客，（孙是罗马乌尔巴大学毕业，通英语）对我说：这些美兵是特殊兵种，咱们是惹不起的，不能硬碰，也不能同居一院。以后教民念经可移到别处。我虽然认为孙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我仍不愿顺从服输，硬着头皮又顶了几天，元月三十一日只好离开大顺城。从此大顺城天主教堂全部房屋让美兵侵占。后来才得知高荣果真写信给三盛公天主教堂，请求让出大顺城的整个天主教堂，作为中美合作所的住房，但未见到三盛公教堂的答复。直至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中美合作所撤销，美兵最后一批回国，教堂才给腾出，我才回到了大顺城天主教堂，开始了正常的宗教生活。

（磴口县政协供稿）

# 我在“绥远省战时青年训练团”的日子里

柴如璧

一九四二年下学期，我在绥远省米仓县三道桥“国立绥远中学”高中部三年级读书，打算放寒假后与同乡王铭璋等回陕西府谷探望父母。提前到陕坝绥远保安机关办理了申请“通行证”的手续。约在四三年元月中旬。期末考试毕，我将书籍行李寄放给留校同学，立即离了校。当天上午走得较晚，就到现杭后旗南渠公社长胜大队表兄杨来拴家中过了一宿。第二天清晨，向陕坝进发。忽然从后面赶来一个女同学，她叫祁林英。面带恐惧神色，气喘吁吁地低声向我说：“昨天晚上国民党军警武装包围学校，逮捕了十来个同学，听说搜查了你的寝室，准备逮捕你。你快跑吧！你快跑吧！”我对她表示了谢意，没有多说

话，告别她，我独自坐下沉默了半晌：“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怕什么？又跑什么？再回校找校长表白吧。”于是我准备了书面材料，又快步返回校部。校长潘秀仁正在洗脸，我说明来意并递与书面材料，潘听了我的口头陈述并把材料过目后，面带颇为慈祥的笑容，对我说：“你学习得很好，可是有人反映你的思想不正确，我写封信，你带上去陕北省党部和他们谈一下，如果问题不太大，请他们放你回家吧！”他当即提起毛笔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大意是：此人年轻有为，如问题不太大，可让他回家。

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持潘的信到了陕北绥远省省党部（现陕北城内毛织厂靠南一些的地方）。接触到的第一个人是程又新（原名程昆山，莎县人）。程身着黄军装，腰插小手枪。我把潘秀仁的信递给程，程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然后盯住我恶狠狠地高声说：“你就是柴如壁！好！你企图负罪潜逃，简直是梦想！你的一切犯罪活动，我们早已了如指掌；你回家的“通行证”我们早已扣住了，你的日记、笔记在我们手中。如不趁早坦白交待，下场是不会好的……”。

“我没有什么可坦白交代的”。我说完两人默默相对无言。过了几分钟，程就高喊“来人！”很快来了一个人把我武装解送南渠长永长胡李圪旦的所谓“国民党绥远省战时青年训练团”。（下称“战青团”或“团”）。

“战青团”的大门向南开着，大门口设着武装岗哨，团的院周筑着高墙，正面是一排矮土平房，院子有三亩多大，高洼不平。院有星星点点的几个人，大都是长胡子，穿着破棉衣、破皮衣。我进了屋子，看到头晚被捕的那几个绥中同学：马信龙、赵新民、鲁尚贤、石雷、周恃天、王铭璋、唐承江、孙生荣等。我进门他们开始都低着头，似乎用回避的眼光扫了我一下，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只是在想：“我们这些念书的青年学生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不是共产党，可他们也不曾说过什么“共产”话呀！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们未来的命运又将会是怎样的？……”通过吃饭，我才知道那里的所谓“学员”有四十多人。团负责人——总干事“樊毓泗”（字洙亭，山西定襄人），向我宣布了团的纪律，并嘱咐我老实交代早日返校。

我们在武装监视下，带着干粮去离团十余里的地方打烧柴，这样的劳动大约过了两周，开始训练了。听一些容易接近官方的老学员说：“现在已是第四期”。但修业年限，谁也说不清。有人揣测说：“可能是流水作业”。四十几人分别编在四个组内，我们的组长是“韩兆麟”，满口山西定襄话。（是樊总干事的同乡）我看到他俩谈话时，靠得很紧。我们一天上三、四节课，由各位教官按课表讲授。后来听说给我们上课的“教官”，是从四面八方逮回来的一些“共党嫌疑分子”如：郝瑞徽、王黎生、王恕之等。讲授内容是：《总理遗教》（包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心理建设》）等。《总裁言行》（包括蒋介石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理论”。还有以《抗战与文化》杂志的文章为主的《奸党批判》，如托派叶青写的《谁是摩擦专家？》张铁君的有关“民生主义”论文等……。隔几天，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张庆恩、科长王国璋等来团训话一次。下课的课余时间，在院内劳动：铲院子、打土坯、粉刷墙壁等。间或也外出



打点柴禾。唯一的运动是打棒子，有几个蒙古学员对“打棒子”很感兴趣，对于我们那些惯于球类活动的书生来说，却是索然无味！

每晚照例要开小组讨论会，这是绝大多数学员的愁肠事。讨论会的中心要旨是：“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三民主义马列化、马列主义中国化不适合国情”，“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才是天经地义，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无疑的真理”。小组长三令五申，一催再促，总是互相推让，争后恐先。不得已，组长只好“点将”。我们没有课本，也没有参考资料，点到谁名下，谁就只好把用鸡翎管修成的笔尖在红绿粗糙的标语纸的笔记本上写下的笔记，结结巴巴煞费气力地念一段，个别文盲把一些知识分子的话，丢三落四地背几句。

我们的伙食是一日两餐，每餐二三两粮，一般都是清水面条和米汤泡米饭，不记得有什么付食，只有一点别有滋味的腌蔓菁菜。百分之百的学员黄皮裹骨、精神萎靡不振。大约是阳历四月底，我们都还穿着破旧肮脏的皮衣、棉衣，据说国民党为“爱护青年”，把国军从日本军手中夺

回来的“战利品”——粗黄老布衬衫（半袖）裤叉给我们每人恩赐了一套。人们穿上印出肉皮，虽然不为结实、美观，但比皮衣、棉衣要轻快得多了，汗水流量也显然下降了。当时，大多数年轻人都长起小胡子，再穿上那身短服，彼此悄悄开玩笑说：“我们都是被俘的日本皇军了”。

晚上，新的苦恼又开始了：好些人少铺无盖，有的甚至铺盖全无。我就是只有一领青羊皮白茬半身旧皮袄，它白天晚上是我的贴身伴侣；特别是更深夜半后，向上揪冻脚，向下揪寒胸，确是“度夜如年”辗转不安。有一个近四十岁的白神官，他兼营卜相，国民党从他衣兜里搜出几个算卦铜钱。从东胜按“共匪探子”把他解送“战青团”。此人老家也在陕西府谷，到团后一直只有一身夹衣，每晚也不知是想家，还是冤屈，也还是冷不堪耐，但彻夜呻吟嗟叹，惹得人们对她既可怜又可恨。

最可怕不是饥、寒、劳、训；而是“突然审讯”。绥中同学首批受审的是马信龙、汤承江、石雷。解到陕坝“宣训团”，审了半个月。我看到他们回来时，都是骨瘦如柴，胡须满面。我偷

偷地问马信龙：“去那里干些什么？”他把周围一扫视，然后带着惊恐神色窃窃低语：“坐板凳、灌辣椒水。”没过几天陕坝又来人，总干事提我，我预感到兆子不佳，急忙夹皮袄，果然把我解到“宣训团”。这个团就在现旧大医院房后面的地方，并排两间房。东面一间是禁闭犯人的，西面一间是刑讯室。外边仅有一个临时灶台，也没有院墙，周围的农民都有院子，他们和“宣训团”虽然是毗邻而居，总是老死不相往来。团长陈元夫，四十多岁，挑高大个，听口音好象是托县人。

去了“宣训团”，审讯官仍然是那个满脸横肉杀气凌人的程又新。程挺起胸膛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我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党派我曾去延安作地下工作。我一去那里，就把我的一枝手枪扔在桌子上，要共产党相信我，他们果然相信了我，还让我到‘抗大’学习”。你很年轻，应该“迷途知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你将会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何去何从，你快明智地选择吧！我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懂的马列主义，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你揭发吧。”程勃

然大怒，眼睛比先前睁得更大，放开喉咙高喊：

“你不是共产党？你和韩是今是“老同志”，你是八路军桃力民驻陕坝办事处处长。你在这里，和社会上的周北岸、刘映元、崔载之等以及绥中教师王绍周、王绥云等经常联系，去贺二圪旦开过密会。远在四一年绥中罢课闹风潮，包围绥远省政府，你就是代表之一。以后到梅令庙，学校粮食困难，吃豌豆面墩墩，你出墙报鼓动同学，反对校局。这难道都不是铁的事实吗？”他这一番话，有些是事实，但与共产党无关，至少我个人是出于正义，没有接受过共产党的指示，甚至我连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结识过。有些根本不是事实，如什么“办事处处长”。尤其是其中提到的周北岸、刘映元等，我和他们未曾会过一面，纯属虚构伪造，咋唬吓唬之举。之后，我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程就先让我站砖墩，下来又用手猛击额部，然后就捆吊鞭打，如此大约度过三、四个苦难的“审讯夜”，又加重地吊打我，我仍然无事可招，无罪可供。惹得程暴跳如雷，用毛巾蒙住我的双眼，去贺二圪旦捉回贺二（地主）、田荣祖（医生兼教师）严刑拷打，合审三人，贺

与田始终不承认我们有组织关系，只承认是同乡关系。把火柱、炭铲烧在做饭的火炉里，准备烫我，我默默想：“我不是共产党员，让国民党拷打死，谁追认我是烈士呢？……”于是我承认了我是共产党，田贺二人一直不承认，那天以后再未见他们。贺二解放后死的。田荣祖听说现在在新华北面可能是五星公社种地兼行医。

从我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那天起，程又新又逼我写书面自首材料，可是他揭发的那些所谓“罪证”，一则由于我没有干过，听了记不住。再则经严刑我昏头胀脑思路紊乱，无法写下去。最后终于由程又新从头至尾给我提词，我原封不动地照写下来。程经过几夜苦战终于获得了他预期的胜利战果，趾高气扬地握着书面材料，可能是去他的主子那里要功去啦！

在“宣训团”。我大约被刑讯禁闭了约八九天。和我一起交叉受审的有一个长得很标致的南方青年，姓陈，被打得双腿流血，头发蓬散，面如土色，他闭着眼睛，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话，后来也没有见他去“战青团”。另有一个本地人，年逾花甲的李老汉，庄稼人，也被捆吊殴

打得腰腿直痛，躺下不会翻身，据他自己在深夜悄悄地对他说，他的儿子是个共产党员。早已跑到延安啦。国民党要他交代儿子的组织活动情况，交出儿子隐藏的密秘文件，他一无所知、一无所有，只好跟着儿子白受罪。老汉来“宣训团”，也没有铺盖，我和他把皮袄盖上，虽然我俩初次会面，不知怎的好象亲如父子了。还有一个暂时被审的青年人，他叫“王敏之”，湖北黄冈县人。据他说，原在米仓代营处工作，因把公田地财主手中收回来，分发给穷老百姓，人家就把他当成“共产分子”捉拿归案。在“宣训团”，他有空就和老炊事员山东人老筱下象棋，王是象棋高手，杀得筱满头大汗，屡战屡败。王敏之后来来到“战青团”，以后出来到“合作事业管理处”工作，一直跟我很好。我爱他多才多艺，善良正直，不畏权势。大约在五二年春请假回家了，我至今想念不已。在“宣训团”，我们七八个紧紧得挤在那个“禁闭室”，虽然大家都没铺盖行李，但要翻身却非易事！白天很平静，大家都靠墙半躺着“反省”。我在无意中发现蒙着一层薄尘的墙上，有些隐约模糊的铅笔字迹，我好奇地走到

跟前一看，原来写着：“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害人几时休！坐之何之？死了算了”。还有在国民党的正式标语上填写小字的，如：“忠党爱国”一条标语的“党”字上边添了“共产”二字。在该团也还是一日两餐，不过老是烧糊粘粥，菜是水煮白菜根子。问炊事员老菽“为什么给我们吃这样的饭菜？菽长叹一声：“唉，不由我。”

交了“自首书”，把我又解回“战青团”，回团不久，我身患重病，昏昏迷迷十几天。稍省人事时，才从志愿伺候我的鲁尚贤（现在包头一中教语文）和王敏之的口中得知我病重时，团中一个学员朱琳，（后任教官，是我在榆林初中的同学）再三向团总干事请求批准。朱亲自出钱，请外边的中医给我服了几剂中药才救下我的命。我还不能下地，听说有些学员去陕坝国民党部参加了“四·一二”清党运动纪念活动，并说他们已在《绥远奋斗日报》上登载了“脱离奸党启事”。据鲁尚贤说，还添了我的姓名，但我始终没有见过那张报纸。到我刚能行动时，总干事让我去管理图书阅览室（取名“中山室”），大约

有一间大的房子，有一个长泥台子，台上摆着约十余种书刊，阅览者颇为寥寥。后来，又办了不定期的墙报，报名初叫《大道》。后来改名为《觉今》，上级命令有文化的都写稿子，经审查后方能发表。文章内容几乎是千篇一律：歌颂国民党，辱骂共产党，重点放在学员们表示“弃旧图新，改恶改善”的态度方面。

凡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节日，无一不纪念庆祝，但规模最大、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第三国际崩溃”的大庆祝活动。曾于团院墙上用白泥浆写出大字标语，还有小幅红绿纸标语贴满院墙内外，寝室、厨房清扫了一次，院前整理打扫得焕然一新。“首长”来了，集合开会，鞭炮轰鸣！国民党省党部的头头们，大概是按官位次序，统统讲了话。讲话的人一提到“委员长”，听讲者必须“咋”的一声“立正”，以示敬意。那天，天气很热，立正的次数也最多。当官员不可支时，学员们更是苦不堪言了。

去“战青团”的绥中同学，最早返校的是王铭璋（现沙海公社退休教师）。赵新民（现前旗苏独龙退休教师）和周恃天（不明下落）其后陆



续离团。大约是四三年八月，新来的总干事辛级三（山西河曲人，当时是省党部委员）传绥中同学石雷（临河人，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文革期间去世）和我二人，还有外来的谭觉民、屠由竣、徐涛、王宏雄等一行，解往陕坝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由祁觉民（据说现在台湾）领导我们填写“自首分子登记表”，接着举行宣誓仪式，言大意是：从前误入歧途，今后要痛改前非。忠于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完成总理未竟的国民革命事业。祁要求以后发现嫌疑分子，立即写书面检举材料，直寄“陕坝信箱16号”以资立功赎罪。

宣誓毕。又将我们护送到省党部书记长张庆恩家中。（现跃进公社跃进一队处）张对我们分别作了面谈。跟我谈话时，张说：“你的学识很好，年龄较大些，可以服务啦！”我立即回答：

“我背井离乡，撇父母、舍妻子，不远千里而来，不是为升官、发财、找工作，而是为了读书深造，如果书记长认为我没有问题，就请你放我回校复学吧！服务需要真才实学。”张勃然大怒：“你的思想还不正确，来人呀！”一个带手

枪的小个南方口音人，将我又送回那个审讯“地狱”“宣训团”。鲁尚贤也在那里，我和鲁二人天天扣坏子并让监视被审讯的人，而且保证不能有逃跑者。鲁尚贤可以上街买菜，我是画地为牢，不准越出院子范围。当院内无人时，我和鲁悄悄地向西邻李金山（现裱糊社退休老人）的老母亲和南邻马映光的夫人要几次烂腌菜。而且得知马映光（五二年在内蒙“中苏友协”工作）也在“西安集中营”“劳改”。

在“宣训团”的一个多月内，祁觉民来团和我谈了三次话。前两次仍要我工作，我坚决不干，最后一次，他具体提出要我去“陕坝忠孝街中心学校”（现在的陕坝北马路小学）当教员，我考虑到：一方面绥中开学已一月多了，国民党不让复学恐怕不好复。另一方面去小学教书仍然可以抽出时间复习高中功课，我答应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我到了学校。我脱下囚衣换上学生服，于十月十一日登上该校五年级乙班讲台，现在杭一中的教导主任王忠，就是我在该班当导师（班主任）时的学生。

（杭后政协供稿）

# 傅作义搞的“救民先锋队”纪实

徐秀泉

“救民先锋队”是傅作义就任“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后，改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时训练的一批准准备接替几个县的行政人员。因为我直接参加这项工作，所以知道的比较真实，但因事隔多年，回忆起来，难免有些遗漏。仅就记忆所及，叙述如下，以供参考。

## 一、“救民先锋队”的来历

1947年秋，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傅就任后，将总部设在北平（现在的北京）。为了便于控制，同时改组了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内定楚溪春为省政府主席，于纯斋

(当时的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为民政厅长,王志彬(前国民党陕坝市政处处长)为财政厅长。当时河北省大部分地方均已解放,国民党所能统治的地区仅有十几个县。这十几个县的行政人员还是前任主席孙连仲任命的,不属于傅作义的嫡系。傅作义为了便于行使权力,命令于纯斋选拔一部分嫡系干部接替几个主要县的工作。于纯斋便在原绥远、察哈尔两省的干部中选了一部分人,同时又招收一部分从解放区逃出的人,以及失业的学生准备接替几个县的工作。这些人在去河北以前,需要作短时期的整训,就便预作职务安排。这些人在整训期间,就定名为“救民先锋队”。

## 二、“救民先锋队”的组织

“救民先锋队”设在国民党察哈尔军政干部训练团(简称察干团)内。总队部由于纯斋任主任,王志彬副之。我以民政厅主任秘书身份担任办公室主任兼秘书。下设秘书一人,总务组长一人,总务组内设事务员一人,伙食管理一人,医

生一人，文书一人。这些人除医生外，都是从察哈尔省民政厅工作人员中临时调用。总部下设四个大队，第一队队长张毓楷，第二队队长苗瑞凤，第三队队长童文斗，第四队队长田发生。（都是将来的县长）。每队分四至五个小队不等。（小队长付队长都是将来的区长或县府科长）。每小队队员七、八人。总共全部约一百五、六十人。

### 三、“救民先锋队”的训练内容

“救民先锋队”是改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后准备安排在几个主要县的工作人员，而这些县都是与解放区接界的，故其训练目的完全是对抗解放区的，既有政治内容，也有军事内容，还有国民党的一套反动思想内容以及造谣宣传方法等。其政治内容是如何组织地方政权，推行保甲制度，对农民提出“扶助贫农，保护中农，限制富农”的口号，对工商业提出“保护合法利益，反对囤积居奇”的口号，其实都是些虚伪而不切实际的空话。在军事方面向队员进行一些军事训

练，组织地方武装，也提出进行游击战争，向解放区骚扰。在其他方面，主要向队员灌输国民党的反动思想，教给队员一些搞特务活动的方法以及提供给队员造谣诬蔑共产党的材料。

训练的方法：每周上大课三至四次，其余以大队或小队为单位进行讨论。政治方面的讲课人除于纯斋、王志彬外，再临时邀请察哈尔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军事方面讲课的人系临时邀请驻在张家口的傅作义部队的高级军官。其他方面的讲课人是临时邀请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的人员，有一次还邀请了国民党调统室的董某（名字记不清了）专门讲过有关特务工作的课。除此之外，也出过几次军事体操，还举办过几次文娱活动。

#### 四、“救民先锋队”的人员分派

“救民先锋队”训练，从47年11月份开始到48年2月初结束，共计训练了两个多月。48年春节过后，便由各大队长带领开往北平。此时于纯斋已在北平就任了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职务，我也调到该民政厅担任了主任秘书。救民先

锋队到达北平之后，略事休整，便分赴各县到职。计：张毓楷任涿县县长；童文斗任武清县县长；苗瑞凤任通县县长；田发生任昌平县县长。其他队员均由各该县长分别带领到各县安排。救民先锋队结束以后，我又在张家口呆了一段时间，办理民政厅交代手续（察省民政厅长由周钧接任，我和周钧关系很好，所以交代很顺利）。交代完毕，我就去北平到职了。

# 旧社会匪患无宁日

## ——解放前五十年间绥远地区匪祸见闻

刘锦魁 原著

张世杰 改写

现在内蒙西部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巴彦淖尔盟（除磴口县），原来都是属于前绥远省所管辖的行政区域，自清末至解放前的五十年间，绥远地区经过满清王朝封建势力的统治和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及日寇入侵，致使各族人民饱受压迫、奴役的痛苦。

五十年来，绥远地区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官吏的贪污受贿，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以及凶年灾荒不断发生，在这种天灾人祸的情况下，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不逞之徒，则相聚为匪。他们打家劫舍，奸淫抢掠，横行霸道，毒害



人民。土匪的滋生蔓延，像胡须剃而复长，似蜂蚁赶而又来，官府对之也无可如何。

旧社会，官兵与土匪本为孪生兄弟，他们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因为官兵大都是收编前的土匪，而土匪又常常是哗变前的官兵，这就形成了官兵来源于土匪，而土匪又是原来的官兵。这样循环往复，令人兵匪不分，真假难辨，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畸形社会。

关于五十年来绥远地区的兵灾、匪祸为害情况，现仅就记忆所及，分录如下：

**一、马家军的哗变。**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岁在庚子，这年秋天，八国联军在攻陷了一些华北重镇后，侵入了北京，从此，义和团运动遂告失败。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西狩，此时，原召入京师保卫北京的甘（甘肃）军董福祥所属的马福寿、马福祥（马鸿逵之父）部，借口扈驾，率部向西溃退。

这部份队伍在撤退途中哗变。在他们经过的柴沟堡、阳高、天镇、大同、丰镇、张皋等地方，杀人、伤人，不计其数；奸淫抢掠、横行无阻，其为害地区，涉及各个县城的郊区百里之

外，其横行时间，从庚子年的八月，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为害人民长达八个月之久。

**二、假意允婚，赵巨子杀张占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在现在的乌兰察布盟一带出现了张占奎等五名土匪。他们马快枪利，慍悍异常，但在数年的抢劫生涯中，不断地与居住在现察右前旗公沟双脑包村和恒义隆村的赵老三、赵巨子叔侄二人为难，处处找他们的麻烦。

张占奎也曾攻打过赵老三的家。但由于赵家深沟高垒，昼夜防守，始终没有攻入。尽管如此，张匪打算伤害赵家之心却未因此而作罢。一天夜里他将一颗人头悄悄地放到赵老三家的大门口，想借人命案件来陷害赵老三。后来赵老三据实将情况报告给丰镇县政府，并上下进行了打点，才算作罢。

赵巨子有女年十九岁。一天，张占奎进入双脑包村赵巨子家，强逼赵巨子将闺女许配给他为妻。在张占奎的武力威胁下，赵巨子不敢不答应，于是定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中秋节后的次日（即八月十六日），午时成婚。

赵巨子并不甘心于招匪为婿，在张占奎匪徒

走后，将此事秘密商之于友人孙占彪。孙当时授意：“假意应允，伺机杀之”。赵巨子非常同意这个办法，立即与家中教读的常先生和密友高连生商量和布署了杀张的方法与步骤。为了防备泄密，三人曾在神前结盟宣誓，以示同心同德。

八月十六日吉期已到，张占奎等五匪徒亲来赵家迎亲。是日，赵巨子家设佳肴美酒以款待“佳宾”，并准备鸦片烟土供他们过瘾。在匪徒们酒醉饭饱，过足烟瘾之后，张占奎立逼赵巨子送女上马，以便回去洞房花烛。

此时，五匪中有二匪酒醉酣睡，另二匪去街上饮马，只有张匪一人在催促新人起程。这正是天赐良机。赵巨子等三人，乘张匪不备，从其背后以利刃刺入腹中，张匪立毙。然后，又分别杀了正在酣睡的二匪。不想在街上饮马的邱秃子、薛犬二匪徒听到了动静。他们闻讯大惊，立即乘马狂奔而逃。

**三、为争房，土匪死于劣绅手。**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在集宁县城北三十里处的色力疙图山村，出现了土匪头目赵有禄。赵匪一开始曾纠集土匪五人抢劫过凉城县脑包窰村胡金荣所

开设的当铺（以质物借贷为业）。不久，就发展成为百余人的大股土匪，这年为辛亥年。在辛亥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当地农民许登弟号召起义，响应革命。赵匪乘势假借革命名义，攻克丰镇县城，进行了大掠夺，以后，又在绥东地区骚扰多时。

一九一三年，赵有禄被山西省大同镇守使收降，赐名为赵承忠，字立诚，希望他忠诚报国。可是不久，在绥远省收服芦占奎匪部后，赵有禄便带上部下三百余人，脱离山西部队回来投入到芦占奎匪部内。后来他随同芦占奎由东胜县转入榆林。在榆林他结识了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因此，他便在榆林居住下来。

赵有禄在为匪期间，所抢掠的金银财宝，都悄悄地寄存在集宁县的朋友张全手中，此事唯有张全的小老婆知道。其后，赵有禄虽然投降官兵，身为军官，但他寄存的东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没敢讨要，因为抢劫之物，终系非法所得。他怕在讨要时惹出是非来。

及至一九二〇年，赵有禄当了绥远省政府参议，这时，他官大了，地位高了，对于一些事也

无所顾忌了，因此，他明目张胆地向张家讨取过去寄存的财物。那时张全已死，张的小老婆承认此事，不过原物已交不出，张妾准备把他们在集宁县桥西通顺街东头路南的房院一所付给赵有禄，用以抵偿。

恰在此时，张妾改嫁，男方系她的姘夫张三亏。因此，这所房屋也随之成为张三亏的家产。张三亏原为集宁县的大地主，他和当时兴和县的大官僚地主王玺一样，交通官府，勾结土匪，称为地方上的一霸。他家养有家兵护院。每遇土匪危急时，一入其门，便无人敢来追问。因此，土匪们把张三亏视为保护伞，对其财产分毫不敢打劫。有时土匪绑票，都由张三亏居间赎票，从中获得好处。

赵有禄为人颞预糊涂，利欲熏心，不识利害。对于张三亏据房不交一事，颇有怨言，并且信口雌黄，扬言对于张三亏的这种行动，一定设法予以报复。这话传入了张三亏耳内，他对此非常愤怒，决心不除灭赵有禄，誓不为人！

一九二九年，绥远省政府解除了王英等人的职务，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这给赵有禄的震

动很大，他自感前途不妙，祸将及身，于是，来了一个不辞而别，悄悄地返回了榆林。由此，他和张三亏争房之事，遂作罢论。

一九三六年，赵有禄年过花甲。过去他虽然当过土匪，干过坏事，但却已改邪归正。时过境迁，人们也就忘却了这些事。他此时在家安享清福，丰衣足食的当上老太爷了。这年正月，他因思念胞兄赵有子，在事前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忽然由榆林返回集宁他胞兄家中。

在赵有禄到家后三日，张三亏以赵有禄私通红军，并为红军工作为罪名，向集宁驻军告了密。集宁驻军闻报，立即逮捕了赵有禄，并在张三亏的大力活动下，将赵有禄执行了枪决。

后来，据赵有子谈，在赵有禄被捕后。他曾以赵有禄的名义致电榆林方面的当权者，请出面予以营救。但以后发现，这封电报稿，被张三亏串通驻军扣留未发，致使赵有禄遭受死亡。

**四、横行在绥远省全境的匪首卢占魁。**卢占魁是丰镇县隆盛庄七道沟村人。他曾为小摊贩，在隆盛庄马桥街摆摊营业。辛亥革命，许登第起义攻打丰镇县城，路经隆盛庄时，他随同起义队伍

打过丰镇县。从此以后，他弃商为匪，一年之间，他就聚集了一千多名匪徒，并在民间搜集了无数枪枝。

卢占魁为人阴险狡猾，有驾御匪众的能力。他佯装浑厚，摆出一付与人无取，与世无争的样子，不讲究穿戴，不与匪徒争财物，用这种小恩小惠，假仁假义的方法拉拢匪众，致使一些匪徒被他所蒙蔽，都来投奔他、依附他、拥护他。另外，他还和当地地主豪绅暗通声气，互相支援。

一九一三年，卢占魁纠集其他股匪，曾围攻过包头。以后，绥远都统张名曾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招抚了卢占魁匪部为官兵，并授给卢占魁以统领的名义，令其驻防在五原县乌加河北、乌兰脑包一带。土匪虽被收编了，但绥远都统拿不出粮饷来供应他们，这样一来，却给卢占魁造成了发财的机会。当时，芦匪以就地筹饷的名义，在防地内大种特种鸦片烟，当地政府对之不敢过问，只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卢占魁原是以当土匪起家的。现在他虽然名为官兵，但仍在不断地吸收匪徒以扩大势力。不久，他的防地由乌加河扩展到狼山一带。东西长

达百里之远。在他的防地里兵匪不分，亲如一家，乃至在外地作案犯罪立脚不住的土匪，也从千里、百里外来投奔他，他一一接收，并给以妥善安置。在绥远地区来说，他竟然成了土匪们的一顶保护伞。

卢占魁盘据后套数年之久。由于他祸国殃民，罪孽深重，一九一六年绥远都统蔡成勋，根据当地人民的告发，决定对卢匪进行围剿。当时出动了绥远省的全部兵力，前堵后截，给卢匪部以致命性的打击。最后，卢匪溃退到清水河县、和林县等地苟延残喘了一个时期。

一九一七年农历十月间，卢占魁东山再起，率部突然来到集宁县双脑包、大河湾村。土匪来临，人人自危，附近居民四出逃生，只有公沟区议员陈英，他不仅不躲避，反而依仗他的家丁，武力准备与土匪决一雌雄。

陈英系当地富户，为人个性倔强，遇事不知进退。从前，住在集宁县附近霸王河的毛煞楞，曾抢过陈家的马匹，事后，便逃入卢匪部队中躲避，陈英强令毛煞楞的家属变产赔偿了马价。对此，毛煞楞恨之入骨。



十月初三日，卢占魁率领万余人的大股土匪，由大河湾村奔向东北二十里处的大六号村。万马奔腾，黄尘蔽日，匪势的气焰，十分嚣张。这时，毛煞楞带领匪徒三十余人跟在大股匪部之后，当他们行至公沟区时，毛煞楞命令所部匪徒向陈家发起进攻，自午至晚，双方枪声不断，但未能攻入陈家。

后来毛煞楞顿生毒念，强迫村人堆积柴草于陈英门前，然后点火毁门而入。匪徒们在进入陈家后，毛煞楞为了报复赔马之恨，杀了陈英家的七口人，以泄其愤。陈英的幼孙陈德，时年两岁，尚在怀抱，幸被其乳母谎称是她的亲生子，才侥幸得免。

陈英家距公沟区才八里之远，在陈英家被匪围攻时，区团兵坐视不救，令人惊异。后来得知其原因是：公沟区政，向由劣绅张三亏所把持。陈英当选为区议员后，常常过问区政，意存染指。以致遭到张三亏的忌恨，思欲除之，以减少政敌。张为人阴险，喜怒不形于色，在陈英自吹愿与土匪见高低之时，张三亏不仅不加拦阻，反而从旁怂恿，以助长陈英骄傲自大的情绪；及至

土匪围攻陈英时，他袖手旁观，不派兵救援，终于使陈英惨遭灭门之祸。

这次除陈英家被灭门外，广大老百姓也被害惨重。农民们所有的牲畜、衣物、毡被、粮草都被抢掠罄尽，随之又放了一把大火，直烧得十室九空，在抢掠中，匪徒们杀人、伤人和掳人数以百计，凡衣冠整齐者，无论老幼悉被掳去。如后来在一九二五年当过国民军师长的苏雨生，这次也是被绑票者之一，由于大兵尾追，匪徒日夜狂奔，以致绝大多数人没有来得及回赎就死去了。在匪势猖獗、气焰熏天，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当时，一些农村青年不得不投入卢部为匪。

据被掳去的人回来说：卢占魁匪部是由五十余股土匪组成的。其中以萨县、武川、固阳等土匪居多数。来绥东绑票、烧杀、抢掠的多系绥西股匪。平时能和卢占魁接近的多为绥东的匪首，如：赵有禄、张喜生、老四辈、卢高民等人，其他匪首则始终见不到卢匪之面。他们名为卢占魁匪部，实际上并没有主从关系，所抢财物，各归各有。各股土匪貌合神离，有利则合，无利则

散，来去自由，不受卢匪的约束。尤其是在有政府兵追击时，他们就分头流窜，各自逃生；及至追兵一停，他们又合为一体，进行掠夺。现在官兵跟踪追击。匪徒们已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正是肃清卢匪的大好时机，云云。

当时，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四个县归察哈尔省管辖。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委派镇守使乔建才为剿匪司令进行追剿。乔建才带所属六路统领将卢匪追出商都、兴和、丰镇等察哈尔省境外。然后又由山西省接续追剿。山西部队将卢匪逐出于阳高、天镇、大同、左云、偏关之外，卢匪又窜入清水河县。他在攻清水河县城不克之后，转而攻进了和林县城。入城后，他纵匪大掠，并放火烧杀。之后，他率匪部奔向准格尔旗、东胜县。在他到达陕北的三原时。被陕军收服，任命卢占魁为陕军第六路统领。他在陕军内干了一个时期，又率部进入四川。在四川，他的部众被川军收编，然后缴械遣散。

卢占魁由四川回到家乡察哈尔后，乡人对他恨之入骨，但也无可奈何。这时卢占魁依然精神抖擞，威风凛凛，一点也没有显露出倒霉失势的样

子，他还在窥测时机，企图东山再起。

一九二四年，吴佩孚与段祺瑞、徐树铮作战，卢占魁暗中鼓动吴佩孚所属的丰镇县游击第二营稽查员胡羽子、栗景和哗变，以响应徐树铮。一九二二年，吴佩孚和张作霖作战。卢占魁趁机投入奉军，给奉军效劳。后在察哈尔奉军都统张景惠去职时，张作霖命令卢占魁组织力量扰乱察哈尔后方。

卢受命后，策动兴和县人何全孝（又名何三），丰镇县人白高旦、李清鸪等人，纠集匪徒五百余人侵入了兴和县城，在县城盘据达十日之久。曾委任当地大官僚地主王玺，充当兴和县长。当时正值直奉军阀混战之际，地方上没有驻军，以致土匪横行无阻。

原来张作霖指使卢占魁扰乱察哈尔后方，乃是一张空头支票。他对卢占魁所招收的匪兵既无物资上的援助，又无编制上的安排，致使这些土匪假借官兵之名，进行土匪之实，在察哈尔地区内为非作歹，无法无天。

当时，奉天（今沈阳）的报纸对卢占魁的行踪，曾大事渲染，并尽力为之鼓吹。但不久卢占

魁已穷途潦倒，失意落魄，蹲居在奉天城内小北关的旅店中。尽管他处境不佳，可是嘴巴还硬，依然大吹大擂，炫耀自己，哄得他那些旧部下何全孝、富台子、张喜生、老四辈等人都来奉天，投奔卢占魁作寓公，以冀攀龙附凤。

在奉天期间，卢占魁与察绥的一些匪首还不断书信往来，以通声气。在信内他们完全使用暗语。如土匪多少？能否收服？他们则写作皮子多少？好买与否来联络。卢占魁在收发信件时，使用张润德皮坊的假名来蒙蔽人们。

当初，张作霖利用卢占魁招收土匪，扰乱察绥后方，意在培养和壮大奉军势力，而卢占魁甘心为张作霖效劳卖命，其意也在乘机建军，扩军，为独树一帜打基础。同床异梦，最后终于出现了分裂。

一九二二年冬，卢占魁去长白山招收了枪马齐全的土匪三百余人，归后，张作霖举行宴会为之祝贺。在酒席筵前，张作霖当众宣布这次卢占魁所招收的匪众编补在阚朝玺的骑兵部队里。对此，卢占魁非常气愤，立即拂袖而去。对于卢占魁的举动，张作霖开口骂了一句：“妈拉巴

子。”在场人员闻之无不大惊失色。

一九二三年夏天，张作霖对卢占魁下了毒手。他一方面命令卢占魁去长白山招抚土匪。另一方面密令阙朝玺率部到长白山对卢占魁一行加以围剿。在强大的兵力包围下，不仅卢占魁丧了命，就连投奔卢占魁来东北准备为官作宦的察绥匪徒们，也被一网打尽，同时毙命。

事后，张作霖曾在察绥两省境内张贴布告，大书特书：“祸害察绥两省十余年的卢占魁，今已伏诛！”。察绥人民见到告示后，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

**五、为害人民，作恶多端的游击营长武万义。**在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时，武万义原是丰镇县公沟区长（当时丰镇尚未设县）。辛亥革命起事，农民许登第起义攻打丰镇时，武万义率部哗变，在抢劫了公沟的商家后，便跟随许登第起义军进入了丰镇。

一九一四年，绥远地区土匪猖獗，丰镇县成立了两营游击队用以自卫，当时地方人士认为武万义做事勇敢，而且还有些军事经验，因此，一致推选他为第一营营长。武万义当了营长之后，

曾带领百十多人的营兵，在剿匪作战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

后来，军队里逐渐淘汰了旧兵，补充进来的全是招收的土匪，在军队的质量起了变化时，武万义的作风也随之转变成为土匪作风。如匪首楚三被他窝藏在军营内，当县政府向他索要楚匪时，他竟答复：“楚三已被我们正法了。”用以搪塞县政府。刘鸿儒因与魏有恒争地，一怒之下打死了魏的儿子。事后刘鸿儒逃入武万义的营中，魏有恒对之无可如何。另外，在剿匪中，凡土匪住过之家，武万义都诬其通匪，严刑拷打，以搜刮财物。有一次，一个士兵正在贾红北曹不罕家强奸妇女，被曹不罕之子打死，此事触怒了武万义，他竟将曹子用极刑处死，以泄其愤。

武万义为害人民，惹起群情愤怒。当地百姓以武万义依仗兵权，敲诈勒索，包庇匪类，纵兵殃民为理由告到了察哈尔都统公署。尽管告状的人越来越多，状纸越来越厚，但丰镇县县长黄朴，贪图武万义的贿赂，始终置之不理。一九二〇年黄朴去职，都统公署军法处才以武万义滥用军权，利匪害民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

在武万义服刑期间，土匪何金孝围攻县城，当时城内无人统兵抵抗。当地人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请求释放武万义御敌，使之戴罪立功。武万义被释后，率领一营游击队出城迎战。击散了何金孝股匪。由此立了功，恢复了营长的职务。

武万义在重新复职后，其作威作福的程度，更甚于从前。如他霸占了王祥的土地，把王祥活活气死。他还霸占了满洲人文奎及阿哥世袭兴和县班定营陶卜窑的地租。每当他派兵丁下乡催要地租时，这些兵丁扰害人民，甚似虎狼。他们不仅在交租的时间上刻不容缓，而且还要农民备烟（鸦片烟）、备酒、杀鸡、宰羊来招待他们。

一九二六年，国民军张之江被委任为察哈尔督办，武万义投在张的手下当骑兵团长。可是国民军在察哈尔地区并没站稳脚步，不久，即行溃退。在国民军溃退中，武万义不仅没有跟着走，反而趁势收缴了国民军许多枪枝，然后，又投到晋绥军中当了骑兵旅长。

武万义当了骑兵旅长后，他便大开招兵收匪之门，大量地收容和招抚了散兵、游勇与土匪。如：刚在三个月前抢劫过陶林县城的匪首张大双



喜，也在武万义部队中当了团长。当时，武万义的部队驻防在集宁地区，由于晋绥军方面不供应给他们军饷、粮食，所以他的部队以游食民间，要粮、要草，拉伕服役。扰害人民，苦不可言。

武万义共有妻妾四人，她们分住在四个农庄中。这四个女人都包领荒地（现在察右后旗中特拉及九台等地大块荒地），放垦给农民耕种，她们不劳而获，坐吃地租。在她们的农庄中，都养有大群牲畜，如马、骡、驼、牛、羊等大小牲畜，不计其数。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武万义秘密派遣他的军法官向驻在绥远的石友三送信。行至中途。被驻在集宁地区的奉军旅长董怀德查获。董立即将武万义逮捕，并以勾结国民军、谋害奉军罪处死。广大民众，在听说杀了凶神武万义后，异口同声地说，这才是为地方上除了一大害。

**六、以抢劫致富的绥东土匪张大双喜。**一九二六年夏天，家住在丰镇县东北大山麻池卜子村的惯匪张大双喜（诨名大老汉），他纠集白玉、薛弼等匪徒五百余人攻打陶林县城，在打死守城警士十余人后，这股土匪攻进了城里。他们在县

城盘踞数日，并大肆抢劫掠夺后，又返回了集宁县。在集宁县城附近，遇到了迎击他们的骑兵团长武万义，双方立即展开了战斗。当天，只听到炮声隆隆，枪声哒哒，似乎在进行着一场恶战，但激战终日，不闻死伤一人。从此人们才明白兵匪之间有默契，所谓剿匪，不过是演戏给人看而已。

当张匪率部骚扰在集宁、陶林两县地区时，正值夏季农民耕耘之际，由于土匪的抢掠烧杀，农民四散逃生，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显露出一片土地荒芜，四无人烟的凄凉景象。

尽管农村凋敝，民不聊生，但这却成全了张匪家业的兴旺发达，使之成为巨富。原来张大双喜将所抢掠的财物，不断地运回家乡麻地卜子村，并用这些钱财作资本，开设了油坊、碾坊、制酒厂、杂货铺、车马店等各种行业，真是生意兴隆，财发万金。甚至他还将抢夺来的马匹公然放在他家院内饲养，马主也不敢来向他追问。

不久，武万义收编了张大双喜匪部，并委任他为团长。但在武万义被奉军处死后，张大双喜又率部哗变，重新当了土匪。一九二七年时，

因土匪之间闹矛盾，张匪为他匪击毙。

**七、糟害东胜县数年之久的格计老五。**格计老五是察哈尔右翼前旗（正黄旗）七苏木人，一九一七年，他由绥东随同卢占魁西窜，率领土匪三百多人，盘踞东胜县地区达数年之久。曾烧毁过东胜县公署（以后的东胜县署，是一九三〇年重建的）。

当时东胜县无驻军，县长畏匪心怯，不敢来东胜居住，经常驻在包头办公，靠领取县政府的经费和收纳捐税过活。至于东胜县政府的木牌则挂在县城以南三十里沙梁间陶油坊一家村。所谓办公者，不过是几个员工向民间要捐征税，敲诈勒索而已。一九三〇年，王文泉当东胜县长时，才开始常驻县城，东胜县无防匪设备，匪来时，群众多逃向附近的炭窑洞内以避之。

一九二六年，格计老五被武万义招抚。委为营长之职，及至武万义死，格计老五移居在察右后旗三股水，以养马为业。他所养的三百多匹马，绝大多数是他抢来的，解放后，格计老五怕人民群众清算他的罪行，自缢身死。

**八、五十四匪徒的抢劫、勒索。**土匪五十四

（不详其姓），原是河北省张北县七甲人。在一九一一年以前，他就和弟弟二疙霎、文奎子、五疙霎等六七人，流窜在兴和县北部抢劫。及至一九一二年，五十四居然抢了九股泉阎寿同之妻为妻，并公然在九股泉合兴公村安家立业。

五十四匪徒善于拉拢交际，与当地的豪绅地主关系密切，因而，在豪绅地主的保护下，军队不易剿除他们。直到一九二三年，五十四等一伙匪徒，才被彻底肃清。

五十四等匪徒，他们掠夺人民的方法有两种，除持枪骑马外出抢劫外，还稳坐家中向人民逼索财物。这就是：匪徒们写出字条送给某人。并限定时间让其送来财物、牲畜、粮食，逾期不交，后果自负。凡接到字条者，无不遵限交付财物，不敢有半点差错。在五十四匪徒们的淫威下，受害者还不敢告发，深怕受到他们的打击报复。

这些坏蛋，他们明系匪徒，尽做坏事，还喜欢装作士绅，招摇过市，以炫耀自己。如一九一四年九股泉庙会，该匪首的老婆，乘两骡轿车来庙上观剧。两匹骡子头戴红缨，颈系铜铃；老

婆们也服装时髦，装饰新鲜；而匪徒们则挎抢带炮，耀武扬威。这时，庙会游人相率躲避，唯恐匪徒们挑刺找碴，招致杀身大祸。

有时，他们还给人们追索人质，借以索取报酬。如：一九一四年，著名恶匪魏大傻子（河北人，曾当过营长），绑去九股泉喇嘛孔督村崔彦虾之弟与郝五子二人，勒令两家出银元二千块回赎，崔郝两家曾经央求五十四等帮助解救，并许事成后予以重谢。五十四等匪徒，当即跟踪追击，终于夺回了人质，得到了报酬。

### 九、被人称为传统匪、世袭匪的卢氏一家。

在兴和县南区大滩村树林深处，有姓卢的一家居住在那里。卢家族大人多，世代以抢劫为生。他们的口头语是：“生而为强盗，做鬼也不冤。”

“宁我欺负人，不能受人欺。”“年轻不刁人，到老后悔迟。”“王八水蛋（骂人语），有钱的就是好汉。”“丈夫不怕死，死后早托生。”

“不能抢夺人，一辈子长受穷。”“与其死于病，无声无息：不如死于匪，落得英名千古。”

基于这种论调，从一九〇九年，到解放时的四十年中间，卢氏一家常年在兴和、丰镇、商都

等地区横行抢劫，杀人越货，其手段的残忍，办法毒辣，实在令人难以尽述，其中危害人民最为凶恶的，要算卢文明、卢文亮、芦小辫和卢蒙蒙等人。他们不仅为匪，有时还用抢来的钱财买官。如卢文明在抢得兴和县农民周补应的孙媳为妻后，不仅没有受到惩处，而且还居然当了武万义部的游击队副官，卢高亮也由土匪一变而为公沟区公所的警察巡官。

当地居民称卢家为传统匪、世袭匪，对他们无不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唯恐受其祸害。计四十年中间，在卢氏家族中，祖孙、父子、叔伯、兄弟、子侄相率为匪者，比比皆是。其中被军队割去的人头竟达三十余颗之多。但从不畏死的卢氏家族，此扑彼起，相继为匪，毫无畏惧之心。

**十、剽悍凶狠的马匪四喇嘛。**悍匪四喇嘛系察哈尔右翼前旗九苏木人，他善于骑马，精于打枪，自从清末为匪以来，经常是出没无常，行踪不定。尤其是在遇到军队围剿的时候，他轻骑远颺，日奔一、二百里，窜入乌盟四子王旗或锡盟苏尼特旗躲避，致使军队不易剿除。

四喇嘛性情凶恶，行为暴戾，对人民杀伤烧拷、奸淫抢掠，已成为家常便饭。在他们为非作歹时，人们跪恳宽饶，匪等竟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无丝毫恻隐之心。

一九一二年，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与喀喇沁右翼旗王爷贡桑诺尔布（民初曾任蒙藏院总裁）联合东蒙古王公制造蒙古独立，当时军队北调，绥远地区防务空虚，土匪乘势而起，并迅速蔓延。对此，阎锡山用剿抚兼施的办法，来平息匪患，当时他委派集宁县公沟大地主张二亏负责办理这件事，结果是招抚无效果，在剿的方面，由于人地两生，也没有取得进展。

正在这剿抚两难的时候，恰好出来一个孙占彪，他自愿充当向导，常带领军队剿匪。孙原为公沟区议员，年近五十，为人刚愎自用，并喜欢出风头。他本是雇工起家，现时家道丰润，很想取得一官半职，以光大门楣。孙的举动，惹得张二亏心中十分不快。但为了迎合孙占彪的心理，并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张二亏在镇守使陈某面前竭力举荐孙议员，终于被委派为军队的向导。

孙占彪充当向导后，骑马带枪，洋洋得意的

夸耀于乡里、家人之前，不啻平步青云，直升九天了。而剿匪的军队，在孙占彪向导的带领下，一开始便取得了成绩。如他带领军队曾搜剿过四喇嘛之家，也曾捉拿过四喇嘛匪伙中的土匪数人。这时，孙占彪成绩虽然是有了，但也因此深深地得罪下了匪首四喇嘛。

一九一三年秋，孙占彪只身去商都县办事，中途被四喇嘛匪部所获。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四喇嘛准备以极刑处死孙占彪。当时，居住在附近的数百名蒙汉人民，再三央求四喇嘛免孙一死，愿意备重金予以回赎。对此，四喇嘛置若罔闻，他命令匪徒们首先剁去孙的手足，然后又割下孙的人头。在孙占彪惨遭杀害后，匪徒们又把他的尸体抛于商都县南边四台坊的盐海之中。

**十一、军阀混战后，滋生出来的土匪群。**在国民军西退时，很多人夺得了散兵游勇的枪枝武器，相率为匪。顿时土匪多得像牛毛，数不胜数。其中最为出名的有苏美龙、董发、范连、刘占镞、夏四、郝喜红、贾锁子、崔万子、小老石、纪三格、初德胜等匪首，他们有数百人的大股匪帮，也有数十人的小股土匪。当时，虽然官



兵也在剿匪，但此伏彼起，不易肃清。如：奉军骑兵旅长窦某，在剿匪期间，曾用马驮铡刀，以铡匪首，血迹淋淋，令人毛骨悚然，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了匪势的猖獗。土匪的害民、扰民，依然如故。

在阎蒋混战期间，集宁县城没有正式军队驻防，仅有一百多人的团警在守城。县城附近有郝喜红的匪部在骚扰，时刻威胁着县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县长杨道一自感兵力单薄。不足御敌；向上求援，也无结果。在此束手无策之际，他接受了当地人士的建议，暗引匪首郝喜红进城晤谈。

在杨、郝会面后，杨道一首先表示，老百姓的饥寒冻馁和你们的栖身绿林，这是因为我德之不修，能力不足引起的。说起来，我问心有愧，罪不容辞。我希望你们帮助维持地方秩序，我报请省政府收编你们。今后如百姓不得安居乐业的话，我将引咎辞职。”

杨县长的这番举动，像一剂镇静药，一时曾收到过土匪敛迹的效果。但为时不久，杨县长调任包头，郝喜红从此无所顾忌，又率部大干特

干，集宁县的人民，又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在抗日战争时期，郝喜红又投降了日本人，充伪骑四师师长，后又当了司令。他为虎作伥，残害人民的手段，更百倍于从前。后来，郝匪与其他匪徒发生矛盾，在一次火拼中丧生。

这些土匪中，以苏美龙的人数为最多，扰害地方的时间也最长。苏匪所部共有匪徒数百人，盘踞在集宁、陶林、灰腾梁一带长达三十多年，他们杀人之夫，夺人之妻，抢掠财物，绑票勒索、罪恶滔天，实难尽述。

**十二、兵匪勾结，狼狐为奸。**为了防御匪害，集宁县公沟设立了区团，其费用是由地方田赋附加税款项下开支的。区团在名义上，设立团兵，保护人民。实际则是，在当地地主豪绅张二亏的把持下，区团已成为他的家兵，供他个人的役使，

区团设立后，公沟附近的农民，因避匪患，有四、五十户人家迁来公沟居住，希冀区团的保护。并且为了获得区团的欢心，以得到切实的保障，在农户阎老三、刘拴魁的倡议下，每户人家每月另出银元一至二元，送交区团，用作补助区

团团兵的薪饷。

半年后，一天晚上土匪来抢阎老三、阎老三为人小心谨慎，平时就留意于防匪的准备工作，及至土匪来到他家时，他严塞门窗以拒之。尽管土匪鸣枪攻击，但始终没攻进来。他家距区团不远，在土匪攻击时，团兵坐视不救，大家很以为奇。事后才知道，土匪是区团勾引来的，目的是在土匪绑票后，区团和土匪瓜分财物。

再有，距区团八华里处的张龙通沟村，住有农民王殿相。王系雇农起家，家道小康，在八月间的一个晚上，土匪闯入王殿相家，并鸣枪百余发以示威。王殿相的儿子飞奔区团，请求救护，但区团不理，任匪抢劫，结果王殿相竟死于土匪手中。

**十三、拦劫火车的土匪和城市里的土匪肆意横行。**在京包路上，有一次一列由西向东开行的火车，当经过福生庄时，被五百余骑匪所拦劫。土匪们气势汹汹，恶声怒吼，遍搜乘客之身。此时，乘客们只有俯首贴耳，任其搜身、搜索整整进行了三个钟头，凡衣履整齐者，都被脱去衣服，由匪徒们一并席卷而去，至于被脱去衣服的乘客。

不分男女都赤身露体踉伏在火车厢内，有的披被单，围手巾以遮身，有的裸体妇女只有怀抱小孩啼哭而已。

在城市，小股土匪也到处横行。当时凡夜间在包头下火车的乘客，必须在南门外集中后，守军才开城门放人进入，等人进去后，守军立即关门，以防不测。至于上车的旅客，在去车站途中，经常被土匪拦劫。

在归绥市也同样如此，一年冬天，我在夜间由归绥车站去新城，迎面来了几个人，他们向我喝问口令，等我站定后，这些人对我进行搜身，并夺去我的行装包裹，其中有一人要把我绑在树上打算冻死我以灭口。幸被其他人止住。并说：

“在此冰天雪地的深夜里，捆冻死他干什么！？”说毕，他们匆匆逃去，我也捡了一条命。

**十四、拦劫汽车及行人。**从包头到五原间的汽车，在哈拉汗补隆和三顶帐房一带。经常遭受土匪的拦截。这些匪徒隐伏在汽车路两旁的草林中，汽车一到，搞突然袭击。多年来，他们打死的乘客，所得的财物，很难加以统计。后来，人人都视这条公路为危途，除公务人员因工作需要

不得往来外，一般客商都不敢走这条路。

当时汽车的质量恶劣，时常坏在途中，不能行动。而公路两旁村落无几，四无人烟。每遇到这种情况，乘客除在肉体上遭受冻饿之苦外，在精神上更怕土匪来抢劫，财物受损失，坐立不安，惶恐万状。

由包头至东胜这条路上，土匪拦路抢劫也时有所闻。在包头黄河南岸一带，因农民避匪他去，村落无人，耕地荒芜，芦草森森，正好给土匪出没造成机会。土匪们隐伏在芦草之中，伺机抢人，有时还杀人。一次，东胜县警察局警士周美德，赴包头公干，就在此处被土匪周昌旺等捉获，惨遭杀害。

**十五、王英等匪部的流窜骚扰。**一九三〇年，土匪马大牛、杨猴小、康存良率众匪数千人，由集宁流窜到绥西一带抢劫。当时，五原县调各区长回城防御土匪，那知三区和一区的区兵们通匪，在回城途中，他们打死了三区区长寿立宽、一区区长张某。后来，土匪攻打隆兴长，由于守门的士兵坚守阵地，匪未攻入，商民得以无恙。

同年十一月间，王英率领杨猴小、康存良等

数千名土匪，窜入集宁县的赉红区，并在那里盘踞了十余日，在盘踞期间，他们除抢掠财物，烧毁房屋外，还杀人、伤人、掳人无数。接着他们又流窜到商都、兴和地区骚扰，后被军队追击西逃。王英在赉红区盘踞时，曾认过一个同宗。当时，人称王英匪部为“黑马队”。实际他们弄错了，黑马队的师长是郭凤山，团长是李根车，他们都在包头驻防，没有当过土匪。

在王英率领杨猴小、康存良等匪众逃到临河县地区后，他们便开始向群众征收田赋杂捐，俨然以地方政府自居。妄图盘踞绥西地区，搞独立阴谋。嗣后晋军师长王靖国、赵承绶联名致函王英，内言：“喆臣（王英之字）兄：大好时机，汝已错过：咎由自取，夫复何言。兹限汝速缴武器，率部投降、否则，大兵围剿，绝不留情。勿谓言之不预也，”这封信从字面上看，是促其投降；但骨子里则暗示王英远离临河，双方互不侵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王英匪部又两次窜扰集宁、商都、兴和等地区，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上述兵灾、匪祸的情况，它并不是当时的全部情况，只是我本人的亲身见闻，属于一小部分。但从这一小部分的情况来看，解放前五十年间，绥远地区的各族人民，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所受的熬煎、痛苦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幸庆解放，人民如出水火而登著衽席之上。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消灭了匪祸，发展了生产，提高了生活，引导全国人民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为了使人们能够深刻而具体地了解绥远地区各族人民在旧社会身受的灾难，并进而弄清兵匪扰民、害民的真相，在这篇文章中，我努力刻画出当时社会的大体轮廓。作为历史素材，供人参考，我想这对搜集近代史料的人们，也许能提供一点参考。

# 忆述白马连进套剿匪的经过

李财口述、刘培荣整理

## (一)

白马连原属乌盟路北支队，支队长为杨青山（后任内蒙独立二师付师长），我任该部二连连长。一九五〇年元月成立河套军分区时，将这个支队番号撤销，把二连（白马连）、三连（红马连）划归河套军分区领导。我连和三连在过春节之际，奉命来到河套，驻扎在陕坝西沙壕。从此我们又踏上了新的战斗征途。

当时的后套地区，已经得到了解放，但从四面八方窜到此间的土匪，还进行着各种破坏活动，情况相当复杂，社会秩序很不安定。这年七月间，还发生过张疤子匪部偷袭米仓县四区区公所，区长田贵生、助理员武建民以及区小队的宁良定、霍二官均惨遭杀害的事件。



我连到达陕坝时，河套军分区已经成立。司令员杨维垣是参加绥远“九一九”起义的人员，付司令员张福来、参谋长刘生开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久经考验的八路军老干部。政治委员沈新发是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我连骑兵编制为四个排，一百二十人，战斗力较强，战士百分之六十是抗日战争时入伍的，百分之四十是解放战争时参加的，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战斗素养。三月间，我连奉军分区命令清剿匪特护卫农村生产和开展政权建设。其活动范围，东至哈拉忽图，西至太阳庙，并在乌加河南北两侧巡逻。出发前，我们进行了战斗动员，对人员、马匹、武器装备作了一番检查充实。战士们精神抖擞地跨上战马去执行任务。当时扰害狼山、临河、米仓县境内，流窜在乌加河南北山湾一带的股匪，计有张疤子、李在、王如义、张德彦、魏银照等共约五百多人。参加绥远起义的张璞部队，驻扎在陕坝附近和狼山县的永安堡（现狼山乡）以及百川堡（现新华乡）一带。由于该师哗变了一个特务营，更给剿匪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

在剿匪肃特战斗中，我和指导员赵先云分了工。我着重抓军事战斗，指导员抓政治和群众工作，我们根据上级交付的任务，机动灵活地去搜剿股匪。采取的战术是：隐蔽行踪，声东击西，叫敌人弄不清我连的动向，并根据匪情，随时变换打法。力求与当地政府取得密切联系，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拥政爱民，官兵一致，从而发挥了军民团结的强大威力。尤其注意严明纪律，做好群众工作，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全体指战员必须遵守的准则。在剿匪过程中，我连每到一地，首先向群众宣传政策，揭露匪特造谣惑众的阴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逐渐改变了群众过去对我们的错误认识，因而在搜剿土匪时，能够得到人民的协助，群众及时向我们提供敌情，主动给我们带路，寻找线索，这样就能使我们在剿匪过程中，心明眼亮，少走弯路。我连每通过或进驻一个村子，即先下马，以示礼貌，到了宿营地严密封锁消息，以防泄露军机，当离开的时候，不但把所住的房舍院落打扫干净，而且还要挑满水缸，借用的东西如数归还，损坏了照价赔偿，吃了谁家的米面、草料都一一开具手续让老

乡们就近向当地粮库领取，临行时还要征求群众意见，这样就日益博得了山湾人民的信任。

## (二)

关于白马连搜剿土匪的几次战斗，因时隔多年，又加我记忆力衰退，可能谈不详细，愿将回忆起来的一些事实，简要地叙述如下：

一九五〇年五月间，正在锄小麦时，我连侦察到在红山口(现后旗青山镇)集聚着几百土匪，他们立旗号，抢钱粮，招兵买马，并打算扎寨安营。我连乘匪徒立足未稳之际，直扑匪窝，进行了神速的奇袭，一举打死打伤了匪徒六十余人，张疤子等股匪徒为避开白马连的锋锐，慌忙向阴山后逃走。我连只牺牲了一个班长，这次初战告捷，大显神威，振奋了民心士气，打击了匪特的反动气焰，为以后的克敌制胜奠定了基础。

七月上旬，据我连侦察兵报称，李在股匪徒约一百多人，在哈拉忽图抢掠财物，作恶多端，骚扰得老百姓鸡犬不宁。我连获讯后，及时作了进剿的部署，于后半夜，已把李在股匪徒包

围在哈拉忽图村，敌我双方展开激战，不到一个钟头，天已破晓，战斗结束。打死匪兵十人，活捉了十人，其余的匪徒跑掉了，我连人马无伤亡。事后，总结这场战斗，所以没有达到全歼李匪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对当地地形不够熟悉，隘路要口配备堵击兵力较少，致使匪特乘隙溜走。李在也漏网跑掉。

七月中旬，我连在辛寡妇圪旦子湾，突然发现匪兵五十余人，正在北山坡上下湾里活动。我立即命令各排散开，分头对当面之匪，开枪射击，匪兵在我猛烈射击下，张惶失措，抱头逃窜。我连跟踪追击，看到山坡上山湾里有横躺竖卧的死尸，有的濒于死亡还在作最后挣扎。此次匪徒被我当场击毙者，约有十人。

七月底在牛场湾附近的大树湾村（现杭后旗沙海乡新红村）搜索行进中，我用望远镜观察地势及匪兵动态，发现有一小股土匪正顺着山沟进山，我正要部署对匪围歼之际，由于过早地暴露了目标，匪徒急忙奔逃入山。

为了尽快肃清匪伙，河套军分区于七月间从大同调来一个独立营。除留下一个连驻陕坝维特

治安外，其余各连及红马连于八月初开到乌加河牛场湾一带追剿土匪。这时红、白马连配合独立营部队在军分区刘参谋长统一指挥下，对各股土匪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搜剿。我记得有一次在米仓县西距三道桥有二十几里的地方，把张疤子、王如义、张德彦等股匪徒都围困到海子东的几个沙圪旦和芦草丛里，我们互相配合，奋勇冲击，将四百多匪徒打得东奔西逃，死伤惨重，击毙二十多人，活捉十人，获得骑马八十余匹。而突围之匪众，因身穿便衣和当地老乡无异，把枪一扔，就不易辨认出究竟是匪是民，以致逃跑者不少。

牛场湾重创股匪后，白马连和红马连奉令进驻阿贵庙，以捷足先登之势，堵击从宁夏窜来意图窃据该庙之匪。这次阻击中，歼灭性地打击了企图东窜之宁夏股匪，当时听说阿贵庙里有蒋介石派的特务分子并携有电台。我连进庙后，经一再搜查，只见几个小喇嘛，并没发现电台。

我们在阿贵庙住了三天，由于补给困难，调到义太魁附近。两天后，参谋长带红马连回陕坝请命，我连仍在牛场湾、太阳庙之间，执行巡逻

及搜剿匪特的任务。

八月间我带了三个排共九十人，由一个通事（通事就是懂得蒙古语，熟悉山湾情况的人）作向导，事先探知一股土匪正盘据在牛场湾东的一个小村子里，有的在抽大烟、吸料面，有的忙着拌馅和面包饺子，准备要大吃大喝一顿。我乘此机会，带领全连人马，向村里的匪兵发动了进攻。只打得匪兵，昏头转向，苦于奔命。除少数逃脱者外，共打死打伤四十余人。

八月下旬，接获老乡报告，在红山口暖水房不远的小村子里，有十几名下山寻找食物的匪徒正在大吃大喝，于是我带了一个班，以果敢的行动，将匪徒们堵在屋里。我提着冲锋枪进去，随带的战士也把枪口对准了匪徒。我大声喊道：

“不许动，交枪不杀，把枪扔出来！”他们吓得个个目瞪口呆，只好乖乖地把枪交出来，全部就擒。不一会儿，指导员也带了些人马赶来，指导员目睹匪徒们无一人逃掉，就问我：“这些人该怎么办？”我说：“他们害得老百姓不能安生，你审问以后，解回军分区处理吧”。

随之我连又向铁匠圪旦搜索前进。在行进

中，我们又和李在的匪伙遭遇，李在因几经我连追剿打击，已成惊弓之鸟，所以一看到白马连就一个劲地往深山峡谷里奔逃。我连进驻到哈拉忽图宿营，并派出侦察班搜集情报，伺机再去捕捉这些害人虫。

九月初，我连开到分子地，准备向北山湾一带搜剿土匪，一天晚九时许，据报十二红圪旦有一家娶媳妇的被一些匪徒抢劫一空，闻讯后。白马连立即出发，到达该村时，已是半夜十二点，土匪已跑得无影无踪。此后，我连又向北到辛寡妇圪旦驻防，以便随时注视匪徒动向，在此期间，我连了解到张疤子股匪在山上已困了几天，人吃马喂都成了问题，势必要下山来到乌加河南抢夺粮食财物。对此，我指示各班排严阵以待，等到张疤子等匪徒过河之后，就以猛烈的火力狠狠地打击敌人。我风趣地和指导员说：“下来三十、五十，还不是咱手下的鬼”。我连趁夜间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挺进到义太魁与大树湾中间的一个村落里，土匪们毫无察觉。果然不出所料，匪徒们真的“送货上门”来了。就在他们正待入村之际，我一声令下，展开了对匪的冲杀，一下

子就收拾了张匪兵三十多人，还缴获几匹骑马。

当时在牛场湾一带和白马连并肩进剿土匪的部队，还有独立营和红马连以及从阴山前后由东向西追剿匪徒的蒙骑四师也进入狼山地区，李在股匪就是在我红、白马连与友军的配合围剿下被消灭的。匪首李在和他身边的两个匪徒虽然漏网，穿过黄河潜入伊盟的沙窝里，但没有几天就被扣捕归案，解回陕坝。五一年镇反时将他送到狼山，依法执行枪决。王如义在我政策感召下，最后也缴械投降了。张疤子在大围剿中，亦俯首就擒，难逃法网。

在太阳庙的大围剿是剿匪的最后一次战斗，因为从东到西的各个股匪在我穷追猛剿下都驱赶到太阳庙周围。西有解放宁夏的杨得志司令员所属剿匪部队堵击，东有我蒙骑四师跟踪追剿，再加上河套军分区对肃清匪患工作的通盘部署，采取了扫灭残匪的具体措施，所以经过几个月的围剿以后，使出没在牛场湾前后的股匪张疤子、王如义、张德彦等匪徒已落在大围剿圈中。一日我连奉令从辛寡妇圪旦出发，往太阳庙海子东米仓县以西地区挺进，配合友军清剿龟缩到那里的几



百残匪。当我连到达指定地点以后，当即与匪徒接火围剿，战士们个个勇往直前，打成交手仗，通过两个回合的冲杀以后，打得匪伙人仰马翻，尸体遍野。在这次歼匪战斗中，俘虏匪徒五十余人，打死打伤者不详。在清理战场时获得骑马一百余匹，我的骑马中弹死亡，随即从战俘的马群中挑了一匹卷花豆青色马，骑上追歼残匪，战斗结束以后，将所获之马匹，全数送军分区，没有几天，这些马都让老乡们各自认领回去，只有我所骑的那匹马，一直无人来认领。

太阳庙的大围歼战后，我连即奉令调回陕坝冬训，并肩负着陕坝镇治安任务。

### (三)

总之，窜扰后套地区的大小股匪，连同从固阳、武川被追剿过来的匪徒在内，共约二千之众，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持续搜剿以及太阳庙的大会歼战，到五〇年十月底，终于全部、干净、彻底地肃清了，从此河套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

白马连在河套剿匪的过程中，出过力，流过汗，老乡们赞扬说：“这才是真正的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为民除害”。就连张疤子在领受了挨打的教训后，也说：“白马连的行动，真叫人难以捉摸，实在没法应付。”沿山湾一带的老乡们给白马连编了一些赞扬的顺口溜：“白马连进套横扫匪寇，勇士们个个大显身手，来无影，去无踪，善出奇兵，只打得土匪们无处藏身。”“白马连英雄汉，百姓见了笑开颜，感谢人民子弟兵，为民除害勇当先。白马连英雄汉，就象天兵下了凡，土匪一听吓破胆，狼嚎鬼哭叫连天。白马连英雄汉，帮助咱百姓把身翻，威震河套八百里，保卫人民的红江山。”

（临河政协供稿）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作者 =

页数 = 2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